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所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重思治理術與日常生活實踐：以樂生/新莊對立語境

為例

Rethinking Governmentality and  
Everyday Practices: The Boundry Work between  
Lo-Sheng Sanatorium and Hsin-Chuang City

姚耀婷

Yao-Ting Yao

指導教授：黃宗儀 博士

Advisor: Tsung-Yi, Huang, Ph.D.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June, 2010

## 謝辭

混沌而荒謬的研究生生活，終於要劃下句點，無法停止，也不該停留。曰混沌，乃始於一種公共知識分子的懵懂；荒謬，則是醉守於實踐中卻無法坦然面對的自己以及各種該盡的責任。但，卻在其中逐漸看懂邊緣者的糾結與眼淚，長出各種政治判斷的能力。

在每個盾塞的檻，感謝那些陪我一起面對的人們。最想感謝的是黃宗儀老師，溫柔的包容，敏銳的分析，若我身上開始有一種魯迅式的強韌，我想是從你身上長出來的。感謝阿肥、李尚仁兩位老師對論文的建議，讓文章有了更為豐富的觀點。感謝其宏、小八、尚書、小虹、詩雲、俊佳、育源、欣倩、鵬宇、育民在求學過程的陪伴、激盪與砥礪。感謝我摯愛的樂生的夥伴，我們在相互譁恨、扶持與鬥爭中長大，十年後的我們，願不愧對歷史。最後以詩互勉：

你說，每座山上都有老虎，哪裡有老虎不吃人的道理。

我說，希望就在你我手中，哪裡有行動，哪裡就有自由。

你說，改變時在太過渺小，小到這世代的我們，看也看不到。

我說，改變是條漫漫長路，需要一代代堅忍打拼傳承。

於浩歌熱舞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

於一雙雙的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

## 摘要

情感在西方知識脈絡中，被視為理性的對立與威脅，長久來在知識生產過程中遭到排除。過去被抨擊猶如「情感的貧瘠地帶，僅受理性的準則管理，並依據政治、經濟、技術邏輯劃界 (Bondi, Davisson, and Smith, 2005: 1)」的地理學，受人本主義與女性主義對知識生產的批判，形成一股情感轉向(emotional turn)，開啟了空間學門對於情感議題的探討，其認識論與方法論提供了新的角度，幫助我們重新理解物質與非物質交織而成的城市空間。

本文以樂生保存運動作為案例研究，關注樂生保存/新莊發展的對立語境之形構，從樂生(院民)與迴龍(居民)的劃界(boundary)歷史系譜中，指出不同階段國家和都市治理術 (governmentality)，如何通過不同的政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ies)與治理技術(governmental technologies)，在日常生活與威權體制間連結精細的權力毛細網絡，形塑不同群體之認同政治。其次，再透過日常生活跨界(transgression)實踐(practices)系譜，指出不同治理術在引動、共振之中，產生新一波的治理術，又如何於權衡循環與消解之中，產生權力的裂縫(disjunctions)，讓另類運動與新主體的形塑成為可能。

本文以迴龍地區為田野區域，以參與觀察、深度訪談與文本分析，作為主要研究方法。深度訪談分析中，援引 William Connolly 與 Judith Butler 情感地理(geography of affect)分析工具，指出象徵、規訓與戰略(tactics)之間的交互運作，通過標示受訪者之內在記錄 (visceral of registers)，揭露每個論述、主體之展演，以及新生成(new becoming)的可能。迴龍作為新莊、桃園、樹林行政交界地帶，其破碎而分割的都市邊陲特質，在新一波都市再發展趨勢下，成為發展與

欲望運作的極致戰場；樂生療養院，作為國家現代性與公衛淨化治理下所產生的隔離空間，是日據時期生物政治(bio-politics)運作的極致表現，所產生的餘毒在2002年開始的樂生保存運動中，與無用的恐懼(年老病體、不事生產的學生)、發展的欲望(desire for development)共振，成為生產性消滅的主要力量。而保存運動又是如何在治理縫隙中形塑跨越界線(cross-boundary)的共有主體(communal subjectivity)，來達成反抗的實踐。



中文關鍵字：情感地理、治理術、樂生保存運動

##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Lo-Sheng Sanatorium preservation movement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disjuncture between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and urbanites' everyday life so as to tease out some implicit logic and ideology of urban governance. Established in 1930s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Lo-Sheng sanatorium, located in Huei-Lung area, Hsin-Chuang City, Taipei County, is an institution of life-long imprisonment and compulsory quarantine for leprosy patients. The physical distance of this institution, and associated psychological boundaries therewith, are well-maintained until 1994, when the mega urban development plans of Hsin Chuang City demanded demolition of Lo-She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MRT line in its place. This urban project gives rise to severe struggles between agents of the neo-liberal governance that prioritize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nts of Lo-Sheng sanatorium preservation movement that aim to speak for the residents of Lo-Sheng.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we attempt to theorize the tug-of-war with a critical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We will analyze how governmentality in the neo-liberal context works by mobilizing both a desire for development (MRT and mega-urban projects) and a fear of the useless (the sanatorium and the diseased, aged bodies) so as to create an impression of "social consensus" of the locals opposing the preservation of Lo-sheng. Here how media and local politicians appropriate the bio-political rhetoric of governing the diseased population to justify the developmental

project will be closely examined.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seeks to bring to light how the neo-liberal governance destroys the vibrant informal economy of between the locals and the sanatorium occupants. Theorizing Lo-sheng Sanatorium preservation movement, we hope to pinpoint problems with the strategies and rhetoric of urban governmentality and its impact on local people' s everyday life.



Keywords : geography of affect , governmentality, Lo-Sheng Sanatorium Preservation Movement

## 目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i
目錄.....	v
<b>第一章 緒論.....</b>	<b>1</b>
第一節 研究緣起.....	1
第二節 從自身經驗出發—樂生／新莊的對立語境.....	3
<b>第二章 文獻回顧.....</b>	<b>7</b>
第一節 情感地理學研究進程.....	7
第二節 排除的地理學.....	13
第三節 治理與治理術.....	17
第四節 發展與欲望.....	26
<b>第三章 研究設計.....</b>	<b>33</b>
第一節 研究發問.....	33
第二節 研究方法.....	34
第三節 田野簡介.....	40
<b>第四章 國家漢生病治理.....</b>	<b>41</b>
第一節 風土馴化：臺灣監控網絡的設立 (1985-).....	42
第二節 樂生療養院與國家癩病治理.....	48
第三節 小結.....	65
<b>第五章 城市治理術：發展的狂想曲.....</b>	<b>67</b>
第一節 邊陲城市的歷史身分.....	67
第二節 1994 年捷運機廠選址.....	77

第三節 小結.....	93
<b>第六章 治理術與日常生活實踐.....</b>	<b>94</b>
第一節 日常生活的劃界與跨界.....	94
第二節 城市治理下的主體.....	114
第三節 樂生保存運動的社區工作.....	123
第四節 小結.....	130
<b>第七章 結論.....</b>	<b>131</b>
第一節 理論化與重思命題.....	131
第二節 研究反省與限制.....	135
<b>引用文獻.....</b>	<b>137</b>



## 圖目錄

圖 2-3-2-1 治理過程.....	23
圖 2-3-2-2 治理技術.....	24
圖 3-3-1 研究區圖.....	40
圖 4-1-2-1 臺灣總督府衛生行政體系.....	47
圖 4-2-2-1 世界癩分布地圖.....	55
圖 4-2-2-2 左 挪威於隔離法勵行後癩患者減少表	
右 臺灣各州別癩分布圖.....	59
圖 5-1-2-1 臺北縣發展潛力與其他城市形象連結示意.....	71
圖 5-1-2-3 新莊副都心未來地景.....	77
圖 5-3-1 台北縣政府《兼顧情理法 創造三贏》廣告.....	91
圖 7-1 新莊企業城市治理與樂生運動.....	133

## 表目錄

表 3-2-1 受訪者名單.....	36
表 4-2-1-1 1919 年宮原敦癩病人數調查表.....	51
表 4-2-1-2 日本各都市癩患人數比較.....	52
表 4-2-1-3 日本本島與在台日人女性癩患比.....	52
表 4-2-1-4 癩病類型比較.....	53
表 4-2-1-5 癩患職業統計.....	54

## 附 件

附件一 臺灣省癩瘋病預防規則.....	143
附件二 臺灣省癩病(癩瘋)防治規則.....	144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在知識生產脈絡中，情感長久來被認為是理性的對立分類 (emotion/rationality)，始自希臘哲人 Plato 的形上學理論，世界被二分為理性與情感、文化與自然、公眾與個人。17 世紀理性主義時期，Descartes 更將情感等同於非理性 (irrationality / rationality)，並轉化女性特質、「歇斯底里」(hysterical) 的身體、危險的慾望等意義 (significance) 為意指 (signification)，透過符號連結的過程進一步闡述「理性較情感更為可靠」，並暗示著情感被視為理性 (reason) 的威脅，需加以控制。

回顧地理學發展進程，過去曾被批評猶如「情感的貧瘠地帶，僅受理性的準則管理，並依據政治、經濟、技術邏輯做定奪 (Bondi, Davisson, and Smith, 2005:1)」，始自 1960 年代深受新古典經濟假設影響，將個人假想為經濟理性的自主行動者，將地理現象概括化為空間上的點、線、面，歸納放諸四海皆準的法則，將地理學形塑成為空間科學。直到 21 世紀初期受人本主義與女性主義影響，地理學開始嘗試概念化情感，促使情感地理學 (emotional geography) 的浮現。承襲於人本主義，批判實證主義者將空間視為絕對、將人視為一具具沒有意識的軀體，並主張以「地方」的概念取代空間，強調人類的主體性 (subjectivity)，探討個人如何感受與經驗地方，地方又是如何被賦與各種情感<sup>1</sup>。承襲女性主義，主張人與環境間的疆界無法明確地分割，情感瀰漫於社會與物質環境以及個人的

---

<sup>1</sup> 其中最著名的學者當屬於段義孚(Yi Fu Tuan)，他的代表作《地方之愛》(Topophilia, 1974)。地方之愛指的是人類對於物質環境的情感依戀。段義孚認為，透過人類的感知經驗、視覺與記憶能使空間被賦予意義，成為地方。「家」是他一個重要的議題，他認為家是地方的典範，家的符碼能夠適切地幫助我們理解人們的情感依附。

主觀經驗之中；在認識論上，Haraway (1988) 提出情境知識 (situated knowledge) 的概念，認為知識具有部分性(partial)、座落性(located) 與體現性(embodied) 等特質，研究者須將論點放置在個人、社會、地理的脈絡中檢視。以發展研究為例，主流發展知識普遍被認為具有普世的、去政治、科學化的特質，Ferguson (1990)指認發展為一種情境知識，是在特定的歷史、社會、論述情境中被生產，目標為促使權力得以運作，同時抹除了人民的情感、在地知識與另類發展的可能<sup>2</sup>。

然而，理性至上的遺毒並未隨著時間的演進而消解，直至今日仍能在世界各個角落輕易發現它的存在。將場景拉至台北縣新莊，你可以在新莊機廠規劃過程中看出端倪。1992年2月14日，新莊市未來建設發展的計畫報告書出爐，建議「將新莊捷運列入六年國建，以因應工業區與城鄉移民帶來對聯外道路的需求」<sup>3</sup>，1994年4月21日「為方便取得新莊捷運機廠用地，捷運局規劃將捷運線延伸至迴龍，將機廠設置於省立樂生療養院」<sup>4</sup>，1995年1月捷運新莊線環境影響報告書出爐，針對新莊機廠位址之環境現況及影響調查，以土地利用、空氣品質與噪音振動、生態環境、物理環境等因子做評估，其中「人」是人口、戶數，環境是「動植物種類調查」，家是「建物結構」，彼此被分割為獨立變相。在工程理性規劃下，政府在新莊地圖上畫上了捷運(線)，以解決新莊市大眾交通基礎設施之需求；為講求時間、經濟效能，將捷運機廠位址放置於公有地，以求降低補償徵地與徵收成本，以規劃報告書做為決策評量，卻隻字未提在地居民(樂生院民與

<sup>2</sup> Ferguson 於 1990 年出版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研究賴索托(Lesotho)農村大型開發計畫機制，由世界銀行組織(World Bank)與加拿大跨國發展機構(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CIDA)所支助。在文獻回顧中進一步介紹。

<sup>3</sup> [1992年2月14日，中國時報，萬仁奎]

<sup>4</sup> [1994年4月21日，中央日報，馬溫妮]

迴龍<sup>5</sup>居民) 之看法、日常生活經驗以及對於土地的感情，規劃過程更是排除少數群體的需求<sup>6</sup>，因而拆遷之社會正當性遭質疑，並於 2004 年起引發社會各界對於捷運新莊線與樂生療養院存廢之探討。

## 第二節 從自身經驗出發—新莊／樂生的對立語境

將研究視野擺放於新莊地區，乃源於自身在社會實踐中的困境。如果人生是一條不斷向前奔流長河，那麼人的記憶或許是其中所乘載的懸浮微粒，而河岸兩旁的沉積物，則是在某個時間點最深刻的影像碎片：

跟你說啦，你問我們這邊的人樂生有保留的價值嗎，百分之百的人會跟你說沒有，還古蹟勒。……樂生在這裡，讓我們這個地方汙名化很久了，我們這邊的房價都漲不起來。(2006 年 8 月，迴龍社區發展協會會長)

你是新莊人嗎？都是你們這群外地來的學生在亂！害我們捷運一直不通車！(2007 年 7 月，迴龍居民)

大三那年開始接觸樂生療養院保存議題，目睹疾病所造成的差異(difference)及社會對「異類」(others) 的歧視，且政府政策操弄對微觀個人生命所造成的撕裂感到痛心。進入樂生社會實踐場域的初期，由於政策已抵定且已交由台北市政府捷運局辦理，因此在運動策略上直接越過新莊地方尺度，訴諸具決策能力的中

---

<sup>5</sup> 在地人稱樂生療養院所在地區為迴龍地區，橫跨新莊、樹林、桃園縣龜山鄉交界。迴龍未有實質行政區劃定，一般北以新莊丹鳳街、南以樹林三福街、東以新莊中山路、西以桃園龍校街為範圍。

<sup>6</sup> 諸如樂生院方代表參與捷運公聽會時欲表達意見卻被趕出，其他關於樂生院民於捷運選址過程中被排除之經驗，請參閱鍾聖雄 (2007) 樂生願—台灣漢生病患的家園保衛戰，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深度報導碩士論文。

中央政府（總統、行政院）與地方政府（台北縣政府、桃園縣政府）。2006年，開始與幾位朋友著手在新莊幾個公園舉辦「樂生厝邊市集」、「樂生兒童營」等活動，希望將議題帶帶樂生的鄰居—新莊居民，但活動往往遭逢許多的困境。

長久以來，支持樂生保留者被劃歸為「由少數樂生院院民與外來學生」組成的「樂生派」，而期盼捷運如期通車者被劃歸為「由40萬新莊市民」組成的「捷運派」。2007年3月24日，由新莊地方民代、村里長、縣議員、立委等地方派系組成「爭取捷運早日通車聯盟」，以白布條的形式將對立的邏輯展現在空間上，新莊中正路兩旁掛滿了「捷運停擺，新莊沒未來」、「新莊人不容忍捷運不通」、「通通通！新莊捷運要通」、「反對捷運拖拖拖」等抗議布條，聯盟並於同年3月31日發起「拚捷運、求生存」大遊行，號召近萬人上街遊行，高喊著「拚捷運、求生存」、「4月16拆樂生」等口號。但倘若僅以上述之語境，即「樂生不拆，捷運就不通，新莊就不能發展」<sup>7</sup>，來理解樂生與新莊之關係，或如樂生派所言遊行的群眾是「地方樁腳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動員出來的」<sup>8</sup>「背後有砂石利益」，事實上兩種論述都過於片面而簡化。兩種說法都過於片面而簡化，未能呈現新莊市民與樂生關係的複雜性。為什麼新莊/樂生的關係是以零合遊戲的邏輯呈現？回顧相關新聞資料<sup>9</sup>，兩者的對立並非始於捷運興建，早在1990年即有相關報導：

《樂生療養院芳鄰眼中釘 佔據迴龍黃金地段 鄉親拜託快搬家》

台灣省立樂生療養院，位處龜山鄉迴龍地區精華地段，當地居民認為

隨著社會環境變遷，療養院設在該地已經不太適用，且佔地廣達七十

<sup>7</sup> 曾任八年新莊市市長、現任台北縣議員黃林玲玲於2007年4月1號之自由時報投書新莊三重要捷運通車。

<sup>8</sup> 台灣人權促進會法務主任魏培軒於2007年4月1號之自由時報投書可笑的拚捷運大遊行。

<sup>9</sup> 台灣新聞智慧網。

多公頃，嚴重阻礙地方繁榮與發展。……居住當地的民眾，對與安置大量痲瘋病患的療養院為鄰，頗難平衡，感盼療養院早日遷移到其它適合地點。[1990年07月13日，中國時報]

(地方)抗議好久摟!好幾年前就一直在說希望樂生搬到其他地方，有講過要搬到花蓮玉里，但後來是醫護人員的家都在附近，所以後來沒搬。(老陳，2008)

「樂生影響地方發展」的論述是如何形構、強化與維持？從上述報導與訪談中，得知疾病也與發展相關，那我們如何反思疾病、捷運、情感、空間等等在形塑論述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回到學術生產中檢視，以「樂生」或「痲瘋病」為關鍵字的碩士論文有十四本之多，但點出新莊與樂生關係的論文，卻僅有呂方妮(2008:6)《以閒逛者之眼論樂生療養院的集體記憶空間》一文。文章指出對立的語境，乃因「樂生療養院的『空間』在發展與保存上互相拉扯，空間成了兵家必爭之地，……空間在保存與發展的基礎上扮演極重要的地位。」然而作者雖指認對立的論述源自於觀看者(viewer)角度的不同，我認為在書寫上卻有兩點缺失：一方面作者藉由媒體分析形構對於捷運的想像，作為對立的一方—資本主義發展導向的空間論述，這樣的處理方式仍陷落於二元的分類，而新莊民眾卻仍無聲且面目模糊。另一方面僅透過樂生院民的訪談建構院民日常生活空間，而自院民生命經驗所描繪的內容，無異於其他以建構院民主體生命經驗出發之論文(王怡乃，2005；林玉燕，2006；陳歆怡，2006；潘佩君，2006；駱俊嘉，2006；鐘聖雄，2006)，無法看見「空間」在過程(process)中的扮演的角色。我認為，在台灣逐步走向新自由主義發展趨勢脈絡下，欲了解樂生與新莊的關係，必須將

「樂生院」重新鑲嵌於「城市」，才能看見空間在權力鬥爭中的運籌帷幄。

將現象拉回地理學脈絡。對於分類的研究，Bondi, Davidson and Smith (2005: 8) 認為：「探索情感的關係性 (relationality of emotion) 提供給我們一條應許之道，透過它，我們可以進一步的理解差異、排除與壓迫的動態地理學。」那麼什麼是情感的關係性？情感地理學又給與我們什麼樣的另類觀點，來檢視樂生與新莊的二分。



##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主要分成四大部分，首先爬梳情感地理學研究進程，企圖從中汲取新的認識論與方法論養分。接著焦於情感地理學中精神分析取徑，探討排除的地理學(geographies of exclusion)，將焦點放在疾病(disease)、劃界、跨越(transgression)。第三部分則將尺度拉到都市，藉由治理、治理術相關文獻的探討，在治理方面關注於企業城市主義文獻，希冀對於今日城市運作策略有所理解。最後一部分則自 Escobar、Ferguson、de Vires 等文章探討發展與論述、欲望之間的關係。

### 第一節 情感地理學研究進程

地理學者過去曾關注情感與體現的實踐，特別是人本主義地理學者與女性主義地理學者 (Bondi, 2005)。這段系譜近來透過情感地理學 (emotional geography) (Boni and Davidson, 2004; Davidson and Milligan, 2004; Davidson et al.) 與情感的地理 (geographies of affect)(McCormack,2003; Thrift,2004) 重訪學術界。本小結首先將爬梳情感地理學之系譜，接著書寫情感地理學 (emotional geography)與情感的地理(geographies of affect)取徑上的異同與所關注的研究議題。

#### 一、人本主義地理學：強調主體情感經驗

最早將情感納入地理學領域思考者，為 1970 年代人本主義地理學者。人本主義地理學的出現，是對前一時期實證主義地理學之批判。實證理論在本體論上假設人類行為具經濟理性特質，在方法論上研究者將現象概括為點線面，制定放

諸四海皆準(不只是在南加州或法國都可適用)的法則，形塑所謂的空間科學。

如 Arturo Escobar (2001) 所言：

自柏拉圖以降，西方哲學 (往往得神學和物理學之助)將空間奉為絕對、無限與普遍的，卻將地方限定於特殊、有限、在地及受限的領域 (Escobar, 2001: 143)。

人本主義學者反對實證主義者將空間視為絕對、將人視為一具具沒有意識的軀體，他們以「地方」的概念取代空間，研究人類如何感受、經驗地方以及人與地方間的依戀 (attachment)，試圖理解深植於地方的各種愛(love)、恨(hate)、歡喜(pleasure)、驕傲(pride)、悲痛(grief)、發怒(rage)、罪過(guilt)、痛悔(remorse)(Parr,2005)。在方法論上強調研究者親身參與研究，而非抽離觀察，強調人類主體性而非客觀性 (Peet,1998:36-7)。

其中最著名的學者當屬於段義孚(Yi Fu Tuan)，他的代表作《地方之愛》(Topophilia,1974) 對人文地理學史影響極大，尤其影響了地方概念的發展 (Cresswell,2004)。地方之愛的意思是人類對地方的愛，更廣泛的說是全體人類對於物質環境的情感依戀。段義孚認為，透過人類的感知經驗、視覺與記憶能使空間被賦予意義，成為地方。「家」是他一個重要的議題，他認為家是地方的典範，家的符碼能夠適切地幫助我們理解人們的情感依附。

但人本主義地理學被批評雖然處理了人與地方的情感，卻沒有注意到場所(location)、年齡、階級、種族的差異，仍舊以男子氣概之規範建構情感 (Rose,1992)。以段義孚對家的主張為例，女性主義地理學者 Gillian Rose 認為段沒有考慮性別的差異。對許多女性而言，家經常是苦工、虐待和乏人照料的地方。段義孚的主張是一種男性氣概的家/地方觀 (Rose, 1993: 53)。

事實上並非所有人本主義的作品皆忽視了差異的重要性。Rowles(1987)對於年齡、個人與社會環境之觀察較為縝密。他訪談一位年長的婦女(Maria)，由於身體功能受損以及社會網絡的縮減使她空間經驗受到限制，情緒也受到影響。透過多重訪談(multiple interview)他獲得關於那位女性對於逐漸縮減世界之主觀看法，他發現她的情感與社會空間的關係不僅止於消極面向(因年齡而縮減)。相反地，Maria 和她家環境中的物體(像是老照片、時鐘)、和她的花園等都充滿了極積正向的記憶。她的自我認同來自於生命地理學，打造了屬於她的情感的環境，敘述了她對地理學的想像。Maria 因此與她的世界保持積極地情感關係。對他們而言，地理經驗是由生活的空間(lived space)所構成，具有時間感、意義與空間本質(Rowles,1987b:183)。Rowles 的理論並非 1970 人本主義論述的典型，但這類的作品在情感轉向的今天較為常見。

## 二、女性主義地理學：解構理性/情感、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

如前所述，在過去地理學思想中，存在著陽剛氣質/理性/心理/客觀與陰柔氣質/情緒性/身體/主觀之二元對立。女性主義地理學者認為西方學術生產是由異性戀、白人、非殘疾男性所支配，他們認為主體情緒被陽剛學術生產系統所忽視。女性主義地理學者自從 1990 年開始，致力於將情感放在研究中心，嘗試描繪情感、女性身體，具象化音樂、生產、懷孕、疾病所伴隨而來的感覺。

在認識論上，Donna Haraway (1991) 批判科學知識生產的過程，只認為惟有透過分離(detached)、非體現(disembodied) 的方法，所獲得的才是真理，因而總是不願意將所提出的論點放置在個人、社會、地理的脈絡中檢視。她提出情況知識 (situated knowledge) 的概念，認為知識可以是部分的(partial)、座

落的(located)與體現的(embodied)，也就是說，將個人與地方放置於知識生產的過程。一如 (Parr, 2005:478) 所言，知識總來自於某人(someone)、某處(somewhere)。

在方法論上，女性主義地理學者主張在研究中直接引用受訪者之訪談內容，給予邊緣主體發聲的機會。女性主義反對客觀化人類情感，它強調給與邊緣主體發聲的機會，因此常會在文章中逐字地引用深度訪談內容。另一方面認為情況知識的生產，需要一個反身性(reflectivity)的過程。所謂得反身性(reflectivity)，是指一種「自我意識的分析性細查」(England,1994: 82)，強調研究者必須不斷反省研究者的位置以及知識是如何被生產，反身性思考各種流竄於研究者、受訪者與地方的情緒(像是互動的焦慮、猜疑)，書寫於研究中。過去認為研究者必須中立客觀，但越來越多人提倡「情感書寫」(Emotional writing)——以個人的、關係的觀點書寫地理知識。研究者必須不斷反省研究者的位置以及知識生產是如何被生產，反身性思考各種流竄於研究者、受訪者與地方的情緒(像是互動的焦慮、猜疑)，是如何影響研究。

以 Rebecca Widdowfield (2000:200) *The place of emotions in academic research* 對公共住宅的研究為例，她強調理解研究者自身情感的重要性。當她訪問實體與社會環境都有如“荒蕪地景”(desolate landscape)時：

來到了 LDNs 區(最不被人接受的鄰里 less desirable neighbourhoods)我對於社會不公義與不平等感到憤怒，我對於那些人不斷處在貧苦循環中，我卻沒有解決的辦法感到沮喪。(Widdowfield,2000: 204)

在學術上，學者理應不該將自己的感受加入研究中。但 Widdowfield 認為透

過她沮喪的情緒，幫助她體察受訪者被房地產剝削的事實。同時，她從他的受訪者身上察覺「正向的感受」(positive feelings)以及對社區強烈的地方感，衝擊了她原先負面的感受，且隨著她更熟悉她所研究的環境，她的心情也不斷改變。透過這個過程讓她體悟到「以局外人觀點跟據自己對地方的情感對地方做詮釋，相當危險(未真實了解受訪者的感受)」(2000:205)。她認為(2000:205)：「將情感寫入研究中，能幫助我們理解自己的研究。」

### 三、情感地理學(emotional geography)與情感的地理(geographies of affect)

情感轉向後，可將地理學的情感研究分為兩門理論：一是由 Liz Bondi 與 Joyce Davidson 所領導的情感地理學 (emotional geography)研究，強調情感(emotion)會改變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影響我們對時間與空間的感知，人的情感與空間感本質成為循環(circular)的關係 (Davidson and Milligan,2004)。二是由 Nigel Thrift 與 John-David Dewsbury 為首之地理學的情感 (geography of affect)，強調空間的動態性與速度，主張日常生活是由人類與非人類所構成之交互網絡，受情感影響(Being affected)與由情感影響(affecting)(他人)同時發生在交會(encounter)的瞬間。

情感地理學(emotional geography) 承襲了女性主義地理學批判知識政治的傳統(Parr, 2005:473)，更為強調情感的體現性(embodiment)與關係性(relation)。體現(embodiment)的概念意指自我與身體是不可二分的，這部份的文獻多從身體界線與逾越(transgression)或情感身體地方的辯證切入。前者像是 Segrott 與 Doel (2004)對於強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患者空間實踐的研究，構成強迫症的元素為心裡的妄想(obsessions)與行為上

的強迫(compulsion)，兩者源自於對汙穢物的恐懼，恐懼形構了心理與社會的邊界，使得患者發展出獨特的空間次序，以遠離汙穢。後者像是 John Urry (2005) 關注遊客的地方消費，他從遊客與居民體現的經驗出發，探討情感如何被整編進入地方的想像與描繪。

由上述概念可知，體現於個人的情感，被理解為由心理—社會—物質界線 (boundary) 所形構。各種受到他人、音樂、藝術、文獻、景觀感動的經驗，是一種外在因子穿越界線，衝擊著內在的經驗，這顯示了身體界線具有可滲透性與流動性的特質，也顯示了情感如何建構、維持與干擾著身體地內在與外在。Bondi, Davidson 與 Smith (2005:7) 認為這樣的關係，揭示了情感在本質上具有關係性 (relational)。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將情感看做是一種關係性的網絡，一如 David Sibley (1995) 結合社會人類學與精神分析切入，認為排除的地理學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源自於對我群與他者關係的定義，這種關係性的宣示連帶一種不平等與壓迫的關係。

情感的地理學 (geographies of affect) 則源自於對人文地理學文化轉向的批判，認為新文化地理學<sup>10</sup> 過於看重再現 (representation) 與詮釋 (interpretation)，許多無法被詮釋的物質 (像是情感) 卻被忽略。對此，地理學家 Nigel Thrift 提出非再現性理論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並主張以情感的地理學 (geographies of affect) 替代情感地理學 (emotional geography) 的研究。Emotion 與 affect 在中文翻譯中皆被稱為「情感」，但語意大不相同。Emotion 強調個人主體經驗，是一種能被量化的情感的強度，經過認知系統處理後，進入

---

<sup>10</sup>Cosgrove 和 Jackson 於 1987 年，在倫敦大學 (UCL) 的社會地理研究社群 (Social Geography Study Group) 會議中，發表「文化地理的新方向 (New direction in cultural geography)」一文，清楚地為「新」文化地理命名 (Cosgrove and Jackson, 1987)，並且引發一連串新、舊文化地理的學術論辯。

論述的分類場域，最後以語義符號表達(Massumi1,2002:28)。而 affect 則是尚未經過認知系統處原始身體情感 (affect)，在經認知系統處理後成為可論述的感覺即為 emotion (Massumi1,2002:30)。一般而言，emotion 與記憶(memory)、依戀(attachment)有關，affect 則與身體實踐(practices)有關。

非再現性理論(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強調世界的移動性(mobile)，主張以實踐的理論 (theories of practice) 理解世界，透過「不間斷地速寫(sketch)」紀錄行為的改變，理解這個動態的世界 (Thrift, 2000:556)。在方法論上，一方面我們可以透過身體感覺的速寫紀錄，像是 Ben Anderson (2006)，藉由身體得側寫試圖了解音樂的物質性如何透過情感影響與受情感影響而改變了日常生活規律與節奏。另一種方法是透過參與在情感實踐中，探索微笑、行動與手勢所代表的意義。以 Derek McCormack (2003)研究舞蹈治療(Dance Music Therapy,DMT)為例，觀察人類情感、身體、治療空間之地理學與實踐的交互作用，如何在意識(awareness)、思考、感覺與關係中產生轉變 (2003:490-1)。

## 第二節 排除的地理學(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如前所述，過去在處理排除時，多從都市資源分配面向像是住宅問題切入<sup>11</sup>。這類的作品，雖然同樣提及不平結構可能造成情感上的壓迫，但研究者並未深入分析情感如何鞏固壓迫。不同於以往，David Sibley(1995)結合社會人類學與精神分析理論，關注符號、儀式、傳說與社會排除之間的關係。以下將以他最具代表性的書 *The Geography of Exclusion* 做為主要的論述軸線。在空

---

<sup>11</sup> 一如許多 David Harvey 的文章，可視為以階級為基礎之排除的地理學研究。他的文章「階級、結構與居住差異」(Class, Structure, and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處理了排除與住宅市場間的關係(選自都市經驗(Urban Experience)，1989, 109-124 都市經驗)。

間排除語納入的過程中，誰決定地方的使用？又是誰被排除？Sibley 認為他者 (other) 只是一種社會分類，但對於他者的感受、一種從在於社會關係中的喜悅 (desire) 與做噁 (disgust) 之矛盾情感，需要從從自我 (the self) 的建構談起。

Sibley 引用 Freud 的客體關係理論 (object-relations theory)<sup>12</sup> 來推演他的論點。客體關係理論主張成人情感行為與早期心理衝突有關，嬰兒與孩童時期的發展會影響成人時期的社會與空間關係。他提到西方社會中，多數人孩童時期經驗一個乾淨、安全、溫暖的環境，透過父母以及其他社會化的成人禁止嬰兒舔食身體殘餘物的教導，嬰兒開始學習內在(純淨的)自我與外在(汙穢的)自我間之界線，學習何為客體(object)、學習遠離骯髒的事物。Klein (1960) 更進一步指出，嬰兒透過內射作用(introjection)<sup>13</sup> 與投射作用(projection)<sup>14</sup> 學習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內射作用指的是嬰兒將所看到成人與客體間的關係，內在化為自己個性一部分的過程；投射作用指的是在與外界互動的過程中，嬰兒將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外界。Sibley 認為透過內射與投射的交互作用，我們在幼年期學習到何謂自我(the“Self”)、何謂他者 (the“Others”)(7)，醜陋、骯髒或不完美之自我與他者之分類，最終將內化，根植於無意識中。所學到的淨化觀會影響成人生活對人與地方的界線。對於自我與身體被污染的恐懼，使我們將「可能引發污染的地方或人」視為骯髒不潔。對於汙染與骯髒所產生的恐懼與焦慮感是促成群體社會及空間疏離的原因。

除了 Sibley，不少理論家認為，藉由身體汙穢物所標誌的界線，是現代西方

<sup>12</sup> 轉引自 Michael Smith(1980) *The City and Social Theory*, Basil Blackwell, Oxford 57-58.

<sup>13</sup> 內射作用：個人接受他人的價值觀與行為標準的過程。一如孩童將父母的觀點內射成為自我價值觀。

<sup>14</sup> 投射作用：將個人內在世界投射到外在主體。一如嬰兒舔食糞便受父母處罰而感到難過，就會將難過的情緒投射到糞便。

文化的特徵(8)。最為著名的有人類學家例如 Mary Douglas (1966) 所著 *Purity and Danger*，她認為認為汙物(dirt)象徵著失序("matter out of place")，汙物的存有暗示了一個具次序的系統存在著，汙物則象徵著對於這個系統衝擊。因此妓女、罪犯、外國移民如同汙物，因為他們體現了傳統的道德與經濟體系中的爭議，一如外國移民帶來異質文化，挑戰社會同等單一系統神話。此外 Constance (1988:178) 也指出，主體對混雜與融合的恐懼 (the fear of mixing and merging)，進而遠離汙穢，維持自我的純淨，防禦內在身體的疆界，可被視為對抗身體殘餘 (糞便、壞死的皮膚、汗水等等) 之無止盡的戰爭—乾淨與骯髒、次序與失序、我群與他者，種種區隔帶來了焦慮不安，因為如此的防禦沒有完成的一天 (198-207)。

另有諸多學者探討區隔他者的常見方式。一是透過各種語言的隱喻概括化他者(the generalized other)。概括化他者的概念可以 George Herbert Mead 為代表。他指出透過一系列人與物體的文化再現過程，自我會藉由抹除他者人性的部分來確立自我的社會位置 (人/非人)。在種族主義論述中，動物代表越界，對於純淨的事物與社會群體產生威脅。像從下水道出來的老鼠，可能散布疾病，就被用來比喻少數群體所造成的威脅，像是猶太人與吉普賽人，他們因此被視為壞的物體。換言之，動物化或去人性化少數群體，是一種邏輯上的迫害(10)。

另一種手段則是透過刻板印象體現於身體。首先，刻板印象來自於“我們對於害怕與景仰的事物之想像”。Gilman 指出刻板印象化(stereotyping)與建構自我之間的關係：「自我與世界接分裂成好與壞的客體，其中壞的自我，指的是自我害怕與焦慮失去控制。好與壞的刻板印象，源自於維持自我界線，保護自己免

於踰越，刻板印象是一種瞬間處理的心理機制，用以克服焦慮」(15)。一如 Homi Bhabha 所言，刻板印象是一種單一化的過程，是一種固定形式的再現，否定了差異的可能性。「他者」擾亂了觀察者的世界觀，但刻板印象能幫助他們移到另一個場景，異於日常生活世界，因為較少甚至沒有與他者的互動經驗，刻板想像不易被挑戰。(18)

而刻板印象會體現於身體，並且常使用語言與視覺意象表達著他們身體的不完美。一如 Iris Young 所言：「當優勢文化定義一些群體為不同，為他者，這些群體的成員被禁錮於他們的身體，優勢論述藉由一些身體特徵定義他們，將他們的身體建構成醜陋、汙穢、淫猥、骯髒與病態。」(126)

最後一種常見的方式是透過空間與他者的交互投射進行排除。首先地方被看做是物質與意識型態的集合。一如 Cresswell (1996)指出，在詞彙「萬事各得其所」("A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its place")或「各司其職」("know your place")中，place 並非單指空間，同時涉及了一種何謂「適當」的預設。某物或某人屬於那個地方而非此地。誰的地方在哪，端看與其與他者間的關係，一如秘書不該坐在老闆的位置，這之中並不一定有規定或法則，然而依照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預期在某些空間中應有某種行為。這樣的預設通常符合社會階層頂端之利益，是一種意識形態。

也就是說地方扮演著維繫權力關係的角色。所有的意識形態反映了一種位置指涉誰被納入與誰被排除。舉例來說，國族主義便是一種納入的意識形態，定義著誰是國家的成員。一如 Foucault 對於權力的觀察，社會控制並非只由上而下透過國家機器施行，主張體察權力的微觀形式，權力存在於日常生活的邏輯之中，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運作，是一種優勢個人或團體對於其他個人與團體的控

制。權力關係同時會體現於身體，透過監視、知識等方式使身體受到規訓：「殖民著"社會生活，在各種尺度中豎立著常規(norm)與越軌(deviant)間的界線。(83)」

其次，對透過各種符碼、傳說、想像所建構的想像地理學進行排除。想像地理學(imaginative geography)討論，源自於愛德華薩依德歐洲眼中的「東方」(“Orient”)，他認為這樣的區隔源自於「藉由誇大化近者與遠者之距離與差異，幫助心智強化自我。」(Said, 1978:55, cited from Kay, 2005:223)。Sibly 認為想像地理學的歷史，鑄造少數、一群“不完美”的人，並羅列了他者，他們對社會優勢團體而言是受汙染的身體、是魔鬼，因而產生威脅，因此在空間上分布於邊陲。在建構想像地理時，同時發生在人與地方上，反映了感受到威脅的人們將自己遠離受玷汙的人們與地方。因此這樣的價值表達在地圖上，將他者驅逐遠離優勢的多數(49-59)。

### 第三節 治理與治理術

#### 一、都市治理與企業城市主義

情感地理學與排除地理學從微觀層次進行人與空間之探討，其中我們透過Foucault的權力理論體察權力的微觀運作，政府僅為權力運作網絡其中一行動者，然而在進入經驗探討前，仍須對於城市運作有所理解。廣義的談論「都市治理 (urban governance)」，是存在於國家、區域與城市政府與市場之間的調節關係，在治理過程引起作用的，除了不同尺度的政府以外，就是不同的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s)與市民團體。在過往的都市政治相關理論發展中，以經驗性理論來看，傾向於對不同的政治作用力量之間如何進行、推導出政治決策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作出闡釋，如成長機器理論 (growth machine theory)、政權理論 (regime theory) 與企業城市理論(entrepreneurial cities theory)。成長機器理論由 Logan 與Molotch (1987) 提出，他們認為城市便如同一成長機器 (growth machine)，趨動者為都市中的地主階級，他們將之命名為「食租者」(rentiers)—強調地主以地租 (rent) 獲取為營。食租者階級結合政客、地方金融機構、在地媒體、企業資本家與大學等，組成成長聯盟 (growth-coalition)，此聯盟以促進地方經濟的成長為首要目標。政權理論則由Stone (1989) 提出，以政權聯盟取代成長聯盟，強調各行動者間由一種非正式的夥伴關係組成，沒有群體佔據絕對的優勢地位，個別組織必須突破自身所能掌握的有限資源，與其他群體結盟進而形成政權。

企業城市理論則強調城市本身轉變為一實體，以企業論述(discourse)行銷企業形象(images)以執行企業策略(strategy) (Jessop and Sum, 2000: 2289)。過去我們將城市視為「企業行為發生的地點」，而今由於跨國經濟活動、逐漸增加生產與投資地理移動性、跨國企業逐漸增加的權力，在都市階層尺度中增加了不確定性因此城市為了在無法預測的全球經濟競爭之中生存，自身轉變為「企業實體」。Harvey (1989) 則提到美國企業主義的興起一般認為與 1973 年經濟衰退有關，去工業化造成結構性失業、在國家與地方尺度上造成財政緊縮，在新保守主義者疾呼私有化的浪潮下，地方政府開始採取企業主義作為策略，以在都市競爭的運作機制 (mechanisms) 中存活。學者將這種治理方式稱為都市企業主義(urban entrepreneurialism)，城市成為都市經濟遊戲中的風險接收者與主動的競賽者。都市企業主義的角色包括了傳統上被歸為私部門的特徵，包括風險接收 (risk-taking)、創造力 (inventiveness)、自力更生(self-reliance)、利潤導向 (profit

motivation)、行銷 (promotion)。(Duckworth, Simmons and McNulty, 1986: 4-5)

Hall 與 Hubbard (1998) 認為都市企業主義能透過兩個特徵定義：促使地方經濟發展成長的政策為優先、結盟組織與機制上從都市管理(urban government) 轉移到都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

#### 1. 促使地方經濟發展成長的政策為優先。

異於都市政府的角色以福利服務的供給為主要目的，Graham (1995) 提到企業城市政策本質上為成長取向，包含創造工作、擴張地方稅基、促進小型企業成長、(最重要的) 吸引新投資型式。其政策目標為提升城市相較於其他城市之相對競爭力，尤其在競爭相同投資形式。

Harvey(1989)認為競爭可分成四種，各自有不同的考量，但將四項競爭放置在一起時，能為近來都市系統不均衡發展提供線索：首先是勞動力的國際分工競爭，意味著必須創造貨物與服務的生產優勢。像是公私部門合夥創造能強化經濟發展的物質與社會基礎建設；或像投資於訓練技術性勞動力，因合適的勞動力素質是新經濟發展的磁鐵，能吸引跨國投資。第二種競爭是藉由消費的空間區隔，改善競爭位置，也就是說為了與其他城市競爭成為對消費者而言較熱門的地方，城市逐漸關注生活品質，並透過縉紳化、文化革新 (innovation)、都市實質環境的提升 (包括後現代風格的建築與都市規劃)、能吸引消費者的場所之設置 (像是運動場、創新與消費中心、小艇碼頭、異國風情的餐廳的設置)，來提升競爭力。其三為金融資訊管理的競爭，包括財金、管理、資訊的控制與決策，因後工業城市建立在以金融、資訊、知識服務等產業活動，因此能使交易時間與成本降到最

低者越有競爭力，這需要特殊而昂貴的基礎設施之提供。最後為中央政府資源配置的競爭，在美國的脈絡中，儘管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補貼預算縮減，但在像是國防、教育與健康預算上仍充足，因此都市統治能利用重分配機制作為都市生存的策略。

城市形象改造是其一施政目標，城市治理者常試提供新的認同給予先前的工業城市，以連接全球經濟的需求，以讓地方獲得新的經濟角色 (Short et al, 1993)，地方政府分配逐漸增加預算用於，行銷城市，透過小冊子、明信片等文化產品，來傳達一種吸引人的、友善的、具有活力的城市形象。此外，大型開發計畫也是其中的手段，特別是 1980 年代的美國城市，大規模城市的物質再發展成為增強城市形象過程中的核心舞臺 (Graham, 1995; Hubbard, 1995)。

## 2. 從都市管理(urban government) 到都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

Hall 與 Hubbard (1998) 衍伸 Saunders (1981,1986) 的國家雙元論概念 (dual theory of the state) 來解釋企業城市政策由福利與社會政策(福利、服務與集體消費的供給)移轉到採取推動與鼓勵地方發展與經濟成長的政策的过程。Saunders 假設國家在生產的資本主義方式中扮演雙元的角色—首先必須確認足夠的生產(例如資本積累)，其次維持足夠的消費層次(例如勞工的再生產與社會需求)。Saunders 以英國為例，認為這些工作必須更細緻的將其分成國家與地方層級政府檢視：在國家與區域層次的施政目標，主要以生產投資政策以支持經濟獨佔部門的資本積累為主，而地方層級則是以管理社會消費以回應人口壓力為主要目標。因此當中央政府在治理角色上不斷退位，地方政府只能肩負起維持資本積累的重責大任。但 Hall 與 Hubbard 指出，都市管理主義與企業主義並非二元概念，城市治理者不可否認地相較於以往花費更多在地方經濟政策上，並鮮少在教

育與福利服務上支出，但並非全然放棄管理性政策。

除了上述特徵，Jessop 與 Sum (2000) 將理論脈絡拉回到東亞地區，以香港數位港計畫為例，探討在地都市如何主動開創地方差異，以獲取資本的空間鑲嵌，成為這種企業型都市急欲實踐的策略，提出「全球都市化」(glurbanisation) 的概念：城市或區域如同企業廠商般運作，不同的行動者自我組成一有意義的整體，致力於進行地方為基礎之策略行銷。「全球都市化」與「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 或者「全球化」(globalization) 的最大差異，在於後兩者的主要行動者皆是大企業，它們透過國際分工擷取利潤，而「全球都市化」則強調都會區域與城市作為首要行動者，如何透過創造地方差異、重新組織時間與空間，增強自身的競爭力。

在這類文獻中，除了探討企業主義城市成因、採行策略外，同時關注企業城市策略運作後所帶來之不均等議題。Judd and Parkinson (1990) 借用葛蘭西文化與政治霸權的概念，示範菁英政權如何因為看似有能力代表多數都市人民的利益，而成功地策動民眾的支持。偏好某些利益的結果，往往忽視了社會平等議題，加劇了城市中社會與領土的分離。Harvey (1989: 16) 指出：「在成功計劃面具底下是嚴重的社會與經濟問題。……關注奇觀與形象而非經濟與社會問題的物質層次，長期下來將被驗證為有害。」一些團體在決策過程中往往遭到排除，這些團體往往被定義為他者（在種族、性別、性取向上）。這類文獻，分析被排除的團體被定義為他者的種族、性別、性取向，爭辯企業城市政策的有效性對於調節城市與改善市民生活條件受到政治人物與政策制定者空洞詞藻所支配 (Leitner and Garner, 1993)。

台灣於 60 年代末整編進入世界生產體系，在這一波國家競賽中，由於台灣平均工資較其他國家低廉、教育普及、靈活生產方式(家庭承包、違章工廠)，使其成為經濟黑馬，並於 70 年代被視為亞洲四小龍，與香港、新加坡、南韓齊名。然而在 80 年代初期，對外面臨新經濟體如中國大陸、越南等國家競爭，國內廠商移往他國；對內面臨中央預算緊縮，以城市為發展主體的聲音逐漸浮現，做為台灣首要城市之台北也開始採取新的都市治理模式。然而我們要問的是，台北的企業城市主義之浮現於何種脈絡？然而有別於以英、美經驗所勾勒之企業城市主義理論框架，或以香港經驗所提出的全球都市化特徵，台北的企業城市主義特性為何？特別做為台灣二級城市的臺北縣（準直轄市）又是使用什麼樣的策略以讓自身運行猶如企業？

## 二、治理、治理術與從屬性

Foucault 將治理 (government)<sup>15</sup> 定義為行為的導引 (conduct of conduct)。從英文語意檢視治理之意義，若 *conduct* 做為動詞，具有引導(lead)、命令(direct)、管理(guide)的意思；而 *conduct oneself* 則有倫理、道德的意涵，在某情境下(例如在工作環境該有的表現)自我管理自我行為使之合宜的。*conduct* 做為名詞，則指的是集體行為(our behaviors)、行動 (our actions)、舉止(our comportment)，總帶有評估的、規範的意義，例如他們假設一系列標準與規範，使得現實行為能被判定。這假設了人的行為可以被理性的管理與控制，並且有一群行動者的存在，以確保管理得以發生，像是老師或是專業的組織。

<sup>15</sup> 臺灣談傅柯治理術的文獻，多將 government 翻譯成治理；而在企業城市治理文獻脈絡中，government 則具有管控的意味，因此翻譯為管理，因此本小段與上一段的翻譯有所差異。而在文章分析中，我主要採取治理(government)的翻譯，強調本文探討傅柯治理術。

治理是種認定問題(problematizing)的過程，由學者、政府提出治理計畫，計畫宣稱某種知識領域或問題，例如健康知識、貧窮問題。Miller and Rose (2008) 認為透過分析相互交織的治理技術 (governmental technologies)與政治理念(political rationalities) ，我們能開始了解多元而精細的網絡—連結個人、團體、組織與權威體制 (55)。政治理性是一個不斷改變的論述場域，是多種威權運作權力時的道德調控，指導的理想與原則，像是自由、正義、均等、多樣的責任、公民權，具有認識論的特質，並以獨特的慣用語所形塑。治理是種認定問題(problematizing)的活動，治理以致力描繪的問題，提出統治者的責任。治理的歷史可以被問題化的歷史重新書寫，政客、知識分子、哲學家、醫師估量著與現實相左的真實。治理的形構，牽扯著不斷定義治理的困難與失敗，因而擁抱了治理的計畫(programmes of government)。計畫是一個設計領域，由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政府報告...所提出，致力於安裝不同的地方與關係。政治理性與治理計畫之間的關係並非決定，而是具有轉譯(translation)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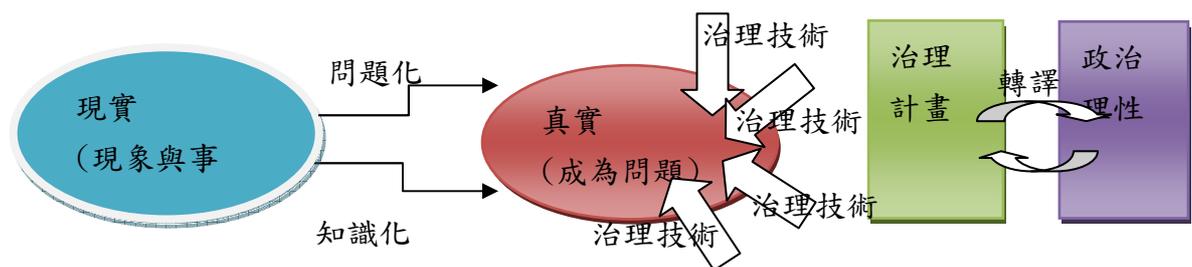


圖 2-3-2-1 治理過程

治理技術則藉由複雜的計畫、計算、技術、機器、記錄與程序，權威能具

體化(embodiment)，例如社會科學、專家制度、法律規章，治理依賴著科學的語言、計算的技術、考試的過程、標準化的訓練系統、專業分化主義與詞彙的創立、建築設計與建築形式來指認問題，並給予問題解決之承諾。此外治理是策略、技術與程序的領域，透過治理，不同的作用力量致力於提出可操作的計畫；透過治理，建立許多權威和個人與團體之間的連結 (Miller and Rose, 2008:63)。這樣異質性的機制(mechanism)，我們稱之為治理技術(technologies of government)。透過這些技術，政治理性與治理計畫得以部署。我們需要研究威權企圖治理所使用之多樣的世俗機制(mechanism)，例如標記、計算的技術；考試的過程；標準化的訓練系統、專業分化主義與詞彙的創立、建築設計與建築形式。



圖 2-3-2-2 治理技術

在國家尺度上討論權力，Foucault 反對傳統國家機器或國家霸權理論的命題，將國家視為猛獸(monstre froid)。他認為這是一種荒謬的簡化，國家不

具有本質的組成與功能，因此重要的命題並非「社會的國家支配」，而是探討國家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zation)(Foucault,1979:20)。換句話說，問題不在於以「國家的權力」來談治理，而是查明國家是(如何)以什麼樣的治理活動形塑：政治人物與當局之間與其他權威的關係、什麼樣的經費、力量、個人、知識或合法性是被利用，藉由什麼裝置與技術，這些不同的戰術能被運用。

Mitchell Dean 認為治理術(Governmentality，或譯作治理性)可拆解區辨為政府的多重政權(regimes of government)、特別的心智技藝(the particular mentality art)、以及自現代初期歐洲所浮現的管理(Dean, 1999:2)。上述三種作用中，心智技藝(或譯作「心性作用」)是國家理性與國家道德，用以順遂地黏接不同個體間對於政府治理的服從，而治理的政治形式向上/下均有其不同方式以實踐這種特殊的心智技藝，向上是以君主教育(pedagogical)作用確保其治理形式的延續性，向下則以「治安(police)」鞏固人民受治理的延續性。治理術(governmentality)則扮演著隱而不顯卻又極為重要的接合劑，將治理-受治關係轉化為一種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vity)。它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反映出某些個體意識，而是灌注入不同的受治者們某種知識體、信念與看法。因此，這些新的都市社會秩序重整，依賴於一系列關於規訓(discipline)、懲罰(punishment)與安全(security)的繁複組合。

以上是傅柯治理與治理術的核心概念。回到地理學命題，空間與權力之間的關聯為何？空間僅是權力運作的表體(surfaces)或容器(container)？抑或以什麼樣的姿態參與在傅柯的權力配置中？傅柯(1986a,252)認為，空間，是任何共有生活(communal life)的基礎；空間，是權力運作的基礎。對於都市社會研

究裡的社會秩序，他指出，治理的理性與技藝，即在於開闢出一條觀看都市秩序關係建構的方式，透過空間的治理手段，而非直接向冒犯者/違規者施以規訓或懲戒，即可達到治理他人與使其自制之功效(Foucault,1979; Merry, 2001)。

在傅柯脈絡中，無論是都市或國家治理，都必須有一系列治理術，才能讓權威體系與日常生活連結，權力才得以運作。那麼我們該如何從情感地理學中觀察到權力治理過程？以下本文援引 William Connolly 與 Judith Butler 對於情感地理(geography of affect)的解讀。William Connolly 與 Judith Butler 強調象徵、規訓與戰略(tactics)之間的交互運作，William Connolly 提出「存有的記錄」(registers of being)(1999: 148)，透過象徵與戰爭策略或訓練之間的相互作用，通過標示受訪者之內在記錄 (visceral of registers)，探討情感回應、本質反應、體現行為，他們以從屬性 (subjection) 的概念能幫助我們看見主體被形塑與形塑自身，透過治理術的論述與實踐。Butler 認為，權力是被主體所假設，也就是說假設(過程)成為主體生成的指導原則，存有與生成 (being and becoming) 間生產的張力，來自於從屬性做為活躍得過程，總是持續進行而從未完成。因此 Butler 建議，論述與從屬性之展演中連續的頓點 (gut)，能提供新生成的可能。

#### 第四節 發展與欲望

都市治理文獻幫助我們理解全球化時代城市的運作策略為何。然而回到經驗研究，在筆者進行訪談時，新莊市民回應、情緒常反映對於發展的焦慮 (詳細內容請見第六章)。如情感地理學所揭示，情緒反應了一組組社會關係，那麼對於發展深切的渴望又是從何而來？暗示著什麼樣的權力關係？近二十年來，一群學家開始認為發展是種情境知識 (situated knowledge) (Haraway, 1988; Dixon

and Jones, 1998), 這個取徑挑戰了主流的發展知識—發展是普世的、去政治的、科學的, 這知識是在特定的歷史、社會、論述情境中被生產, 在此同時權力得以運作, 並且抹除其他知識與另類發展的實踐。Escobar (1995: 9) 認為發展論述創造獨特的機制來製造知識、運作權力, 以駕馭第三世界。而地理學家也在這場發展理論論戰中, 加入了空間的面向: Lawson認為(2007: 27): 「空間很重要, 發展的歷史、社會、政治過程, 受地方 (place) 或由領土 (territories)、疆界 (borders) 與尺度 (scales) 主動地建構著。在這個脈絡下, 地理學挑戰了既有的發展理論, 並認為發展並非物件 (thing), 發展是一系列由地方、社會團體、文化、生產領域與消費所構成的關係, 具獨特歷史性。然後發展地理學探討議題層面廣泛, 因此本小節僅探討其中處理關於「發展渴望」之相關文獻, 聚焦在Escobar (1995)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與Ferguson (1990)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二書與Don't compromise your desire for development! *A Lacanian/Deleuzian rethinking of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一文做探討。前二者以傅柯對知識、權力、治理術探討, 後者從拉岡對於主體匱乏做探討。

Escobar (1995) 應用傅柯的概念, 他認為發展之所以得以運作, 是透過「貧窮的發明」(invention of poverty) 執行, 而將他者再現為貧窮、原始、需要幫助, 是建立權力關係網絡的一部分, 這個過程中, 以一種病態學的形式進行形象再生產, 再生產他者做為一被發展知識所建構的主體。因此, 規訓的權力是由分層 (classification) 與分類 (categorization) (例如使用指標與經濟模型等技術), 或生命權力 (bio-power), 給予治理 (或治理術) 正當性, 藉此阻礙發展的作用得以被指認與分析。也就是說, 治理術是關於社會領域問題化 (problematization), 讓它能

應用新的治理技術，能灌輸發展關於問題與解答。在這觀點之下，問題化是一個過程，透過治理(治理術)正當性的生產，藉此合法化的政權被建構，社會成為發展機器所凝視的客體。社會被建構為干預的空間，藉此發展主體被形塑為發展技術的目標物。

Ferguson 於 1990 年出版研究賴索托(Lesotho)一農村大型開發計畫機制探討，由世界銀行組織(World Bank)與加拿大跨國發展機構(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CIDA)所支助，這個計畫最終是失敗了，但失敗(failure)並未引發針對農村發展事件的認同、規劃與成果之形塑原則與概念化過程進行重新評估。相反地，引發更多具野心的計畫以及更多更精細的規劃技術。發展計畫不斷的被引發，卻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敗，但無論發生多少次相同的情形，似乎總有人已準備好再試一次其他的計畫。

Ferguson 認為發展干預很難為第三世界人們的生活，帶來社會與經濟轉變。在大部分的案例中，生產結構並未轉型，技術並未移轉，在許多旋風式的計畫與專家與官僚們的現身，在地民眾最終仍維持他們的生活，猶如一切未曾發生。在課程與計畫之中，隱藏的意圖，無法被解釋或簡化為目的、欲望或參與行動者的算計。此外，發展的干預將發展政治本質轉化為神聖的(專業)知識客體，藉由 arsenal of toolkits 完成。因此發展的機器，製造出(論述)實踐的真實世界，與現實中主體的掙扎與渴望分離。並非停止機器的擴張，失敗(failure)成為機器再生產的馬達。他引用 Foucault 對於監獄制度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推衍。Foucault 認為若以監獄(prison)失敗來理解，是問錯問題：「然而人們或許應該反過來考慮問題，監獄的失敗提供了什麼東西?這些形形色色的不斷受到批評的現象有什麼作用?這些現象包括維持過失犯罪請像，鼓勵累犯、把偶爾的違法者改造成為習

慣性的過失者，建立一種封閉得過失犯罪環境 (273-274)。」我們必須看見伴隨失誤而來的政治效應為何。如去政治化與官僚政治的滲透，因而保留某種治理術與支配的形式。工具效應與「新技術」的重新發明，促使發展機器有效的成為支配工具。Ferguson 從傅柯取徑借用「治理術」做為一種權力，透過控制技術的製造與佈署，這些發展計畫所伴隨之副作用(side effects)，應被看做是工具效應(instrumental effects)。

Ferguson 使用反政治機器 (anti-politics machine) 命名這個發展機制。科學小說中常出現反重力機器(anti-gravity machine)一詞，強調機器能透過開關的轉換，中止重力的效能。而 Ferguson 所指之反政治機器則是中止政治透過更精密的政治操作。使用各種發展機制(development apparatus)—包括制度機制、概念機制(conceptual apparatus)。世界銀行報告書中指出，賴索托乃「原始農業經濟」「未經現代經濟發展觸碰之處女地」(34)，詳細條列自然資源與災害，最後歸結惟有道路、基礎建設、教育，引介並強化貨幣經濟，才能轉變原始的傳統以物易物經濟。其次，透過農業改良、鄉村發展計畫、技術的輸入，能使其農業得以發展。第三，必須建立國家經濟，支持國家經濟計畫與國家、部門為基礎之經濟方案。第四，經濟與社會必須在中立、單一、有效率的國家治理之控制中，發展組織所生產的各種文本，標示、定義、分類各種客體，以證明發展的合法性。這些發展論述本身有著關於現代化資本主義模式的想像，並藉由歪曲地方文化來孤立在地原始經濟，國家在這些論述中，成為一去政治的工具，給與社會服務、農業投入品與趨動經濟成長(65)。

Ferguson 區辨了發展干擾的兩種制度性結果：去政治化、官僚—機構的穿

透。而 de Vries 加上第三項－發展欲望的召喚 (generation) 與舒緩 (banalisation)，處理發展是如何觸發的美夢與幻想。de Vries 指出，秘魯高原地區之安地斯山村民對於「發展」的圖像：要有大有小的公共設施、高速公路與農業道路、灌溉系統、水壩、學校。而當 de Vries 詢問村民們是如何定義發展？村民回答：「有推廣人員到我們的村莊告訴我們為了增加產出，我們應該使用哪一種肥料。」de Vries 認為我們不該將這些民眾視為無知，對於發展所帶來的風險毫不知情。在他的田野資料中，村民們對於發展對於日常生活可能帶來的危險(如環境汙染)與重大影響相當清楚，但他們仍然堅守著政客與國家給與他們之仍未實現的承諾：那些他們從未建造的道路、從未建立的學校、從未給予的工作機會。那些只出現在夢中的承諾。

de Vries 的核心發問為「為什麼第三世界的人們在不斷經歷失敗，卻仍渴望發展」？de Vries 認為過去無論是基進政治經濟取徑學者、傅柯取徑學者或是反身現代性取徑學者，僅處理發展的現實層面(actuality of development)，以及發展如何干擾人民的生活。

de Vries 運用 Lacanian 精神分析取徑對慾望的探討，來探討發展欲望的產生原因。Lacanian 認為人是有匱乏 (lack) 的主體，而欲望即透過他者的客體 (small objects of the other, 也就是"objets petits a") 所趨動，以安地斯山脈的居民為例，他們的客體即為發展的承諾：橋梁、道路、灌溉渠道、學校建築。de Vries 將這種由客體所召喚之欲望的辯證稱為雙軌的慾望的招喚與紓解的辯證 (the generation and banalisation of hope)。主體藉由他不是什麼來定義他自己，於是「主體所匱乏」('lack in the subject')，轉型成為「匱乏的主體」('subject of lack') 並創造出欲望的主體，持續地搜尋著 what is in development more than itself，

換句話說，搜尋著發展的承諾。於是物體招喚起欲望，但在紓解欲望的過程中，另一物體又喚起欲望，於是發展的欲望就在從一個物體到另一個物體的過程，掩飾它本質的不可能。發展的欲望隱藏了他的不可能，透露一種烏托邦的美夢。因此發展的承諾建構了不斷渴望的主體(desiring subject)，不斷渴望發展的主體回應了發展機器中的缺乏。失敗成功地生產出發展的欲望、發展的承諾之不可行，生產出主體，逃避權力的控制。發展的干預總是創造新的「不足」(lack)，以激發新的欲望。

## 第五節 小結

情感地理學讓我們看見個人獨特的情感地理，是由物質、歷史、人的情感、記憶、想像與傳說交織所形成，它是一種有機的關係，不斷相互辯證成為城市居民所認知的真實，情感本身是關係性的網絡。而排除地理學則揭示二元對立論述背後複雜人與人、人與地方之權力劃界技術；都市企業主義則讓我們理解當今城市發展策略，而 Escobar、Ferguson、de Vires 的文章則讓我們更進一步看見「發展」為人為建構與發明，透過各種機制進行發展主體的生產，且藉由欲望的召喚與紓解發展機器得以不斷運行。這四個領域乍看下互無關連，但文獻閱讀與田野資料的蒐集，無法期待是一種線性的歷史過程，在我的論文中它們呈現一種迴路(circuit)的過程，在交互辯證中不斷書寫、抹除又重新閱讀、重新書寫。當我進入田野後，我發現豐富的田野幫助我寫下一個個屬於新莊(居民)與樂生(院民)的故事，卻也逐漸發現倘若不將視野拉大到整個城市，這些故事將無法回答我所關注的對立。微觀層次所得到的資料，看到的是一個個的矛盾，是對立的基礎，但若沒有整個城市對於發展的期盼，這個基礎將了無意義。城市為何渴望發展？

用什麼樣的方式促成發展？這些疑問促使我開始閱讀都市治理以及後發展主義等相關文獻。筆者認為情感地理學所交織之關係網絡，乃城市生活之紋理，隨著外界擾動而改變形貌。而疾病、都市治理乃擾動要素，透過各種機制運作進行劃界，在人的身上產生不同情緒。

回到對立語境的生產脈絡與方式。搜尋相關新聞資料後發現，早在民國83年十月十九號新莊市雙鳳里居民因為不滿地方發展長期受限，且捷運局大量徵收民地，揚言樂生院不搬遷，絕不同意捷運局在迴龍舍機廠，並聯合附近九個村里進行抗爭，引起樂生院院民強烈反彈（行政院衛生署樂生療養院調查研究，2005:190）。而在訪談的過程，確實也發現兩者的對立並非近幾年才形成。

大家都覺得怪怪的，但大家都很同情他。怪怪的是因為怕傳染。以前政府也是希望他搬，也有找地，但是醫生不要，因為他(醫生)搬去那邊不方便。政府想把他搬到別人比較不會反對的地方。(C，迴龍居民)

於是我們要問，論述的對立是如何形構、強化與維持？我們如何反思疾病、捷運、情感、空間等等在形塑論述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物質的空間與各種空間的隱喻又如何被建構與參與運作？又如何體現(embodied)於新莊市民與樂生院民間的關係與互動？不同性別、階級、年齡又是否有所差異？筆者試圖在本文中探究這些重要問題。

### 第三章 研究設計

#### 第一節 研究發問

寬容的忽必烈阿，我怎麼樣描述齊拉 (Zaira)，那座高壘環嶼之城，都徒勞無功。我可以告訴您，那裏有多少台階，……那理的拱廊有多彎曲，還有覆蓋屋頂的鋅版是什麼模樣；但是……告訴您這些等於什麼也沒說。組成這座城市的，不是這些東西，而是空間的度量與過去的事件之間的關係：街燈柱的高度，以及掉在上面的篡位者晃動的雙腳與地面的距離；從燈柱拉向對街欄杆的長線，以及裝飾皇后婚禮遊行路線的花綵；欄杆的長度，以及天光乍現時，翻過欄杆一躍而下的情夫；排水溝的傾斜度，以及行走其間的貓潛入那個窗戶時的縱身一躍；突然從岬角後方出現的砲艇射程，以及炸毀排水溝的那顆炸彈；魚網的破洞，以及坐在碼頭上修補漁網的三個老人，他們正第一百次砲艇與篡位者的故事，有人說篡位者是皇后的私生子，尚在強褓就被遺棄在碼頭那邊。

當來自記憶的浪潮湧入，城市就像海綿一樣將它吸收，然後膨大。對今日齊拉的描述，必須包含齊拉的一切過往，但是，這座城市不會訴說它的過往，而是像手紋一樣包容著過去，寫在街角，在窗戶的柵欄，在階梯的扶手，在避雷針的天線，在旗桿上，每個小地方，都一一銘記了刻痕、缺口和捲曲的邊緣。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

引文出自筆者最喜歡的作者之一，魔幻寫實小說家卡爾維諾的作品，主角是曾經在歷史上長征大江南北戮力沙場的忽必烈，與小說虛構的角色馬可波羅人物，兩者的相遇，象徵著虛構與史實的交織。文字帶領讀者進入層層疊疊的歷史地層，以記憶為軸線，以不同的速度將其串連。閱讀的過程，讀者可以看見空間

場景不斷的循環輪轉、看見不同的關係相遇又縱身擦過。

城市，不單是理性規畫的空間，城市是由物質、歷史、人的情感、記憶、想像與傳說交織所形成，事實上這就是個人獨特的情感地理，它是一種有機的關係，不斷互映與辯證成為城市居民所看見的真實，是德勒茲所談到地下根莖，雨果所談的有機城市。第二章的文獻回顧試圖呈現想像、情感與權力間的層層交疊的，筆者認為在討論新莊/樂生的都市衝突時，必須看見物質與非物質之間權衡運作的關係。

仔細來說，本文旨在建立多層次論述，透過情感與記憶的書寫，幫助我們釐清種種衝突的背後其實隱含了複雜的原因。幾個核心問題如下：

1. 從找尋新莊（居民）與樂生（院民）有哪些互動的蛛絲馬跡中，探討不同情感生產於何種情境、暗示了何種社會、政治、文化關係。這樣的關係是透過何種機制（語彙、想像、空間）進行界線的形構、強化與維持？本文將特別關注物質空間與各種空間的隱喻如何被建構並參與運作。
2. 做為台灣二級城市的臺北縣（準直轄市），企業城市主義特性為何？透過哪些行銷手法、開發計畫來達成經濟發展？新莊捷運在新莊發展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新莊市民如何想像發展？樂生與發展之間的關係為何？
3. 「樂生會影響地方發展」的論述是如何形構、強化與維持？疾病、捷運、情感、空間在形塑論述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 第二節 研究方法

在認識論上，採取Haraway (1991) 的情況知識 (situated knowledge) 的概

念，認為知識可以是部分的 (partial)、座落的 (located) 與體現的 (embodied)，也就是說，將個人與地方放置於知識生產的過程。一如Parr (2005: 478) 所言：「知識總源於某人(someone)、某處 (somewhere)。」在方法論上，採取女性主義地理學者在研究中直接引用受訪者之訪談內容的方式，給予邊緣主體發聲的機會，同時透過反身性 (reflectivity) 的過程，進行一種「自我意識的分析性細查」(England,1994: 82)，不斷反省研究者的位置以及知識是如何被生產。此外透過「情感書寫」(Emotional writing)，書寫各種流竄於研究者、受訪者與地方的情緒 (像是互動的焦慮、猜疑)，如Widdowfield (2000:205) 所言：「將情感寫入研究中，能幫助我們理解自己的研究。」運用綜合性研究方法進行，首先透過文本的歷史性分析，理解痲瘋病汙名化的過程；接著佐以民族誌研究中的田野參與式觀察；最後針對不同屬性之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的方式，企圖建構受訪者獨特的情感地理學與地方想像。

## 一、深度訪談對象選擇

### 1. 迴龍居民的訪談

在先遣研究 (pilot study)，邀請對方繪出認知地圖與印象中小時候的迴龍。第一張圖可包括地名、從家到工作/求學地點路線與沿途景象、平常用餐的地點、夜市、買菜/消夜的地方、做運動的地點、買衣服的地點、購買日用品的地點以及其他認為迴龍重要或有趣的地方。在第二張圖完成後，詢問對方認為兩張圖最大的差異為何。透過受訪者自己詮釋繪圖的過程，讓受訪者說出自己的經驗，也能幫助我更認識迴龍，並且理解空間對於受訪者的意涵。質化研究強調訪談者與受訪者之主體，關注人們在特定情境中的經驗與解釋，並且將訪談結過放入社會歷史情境脈絡中解釋，目的在於追求社會事實建構過程。在訪談對象的選擇上，

為增加受訪對象的多源性，以突顯新莊/樂生多元論述，因此初步以筆者透過參與式觀察對迴龍得到的初步認識，將居民依背景脈絡的不同化約成幾個分類：迴龍在地大姓（褚、潘、陳、林、江）、樂生院職員、60年代後搬居於此之城鄉移民、癲瘋村（出院的樂生院民與其後代所構成的社區）居民、地方里長與村長、宗教界負責人（包括迴龍寺住持、三和教會牧師）。

## 2. 樂生院民

## 3. 學生

表3-2-1受訪者名單

姓名	身分	日期
小張	居民、女性	20090205
王牧師	三和教會牧師	20090208
江清萬	迴龍村村長	20090328
吳媽媽	社區學校家長	20090326
阿刀	居民、樂生院民第二代	20090317
林奶奶	居民	20090505
林先生	居民	20080517、 20090505
林大哥	居民	20080423
胡小帥	三多國小老師	20080911
施媽媽	居民	20090205
陳先生	居民	20090327
褚先生	居民	20080426

褚小姐	居民	20090205
義正	居民	20080911
文章伯	院民、樂生歌王，現住 新生舍	20090317
老陳	院民、院內經營生意， 現住澤生舍	20080321
阿添伯	院民、自救會委員，現 住組合屋	20090210、 20090520
阿梅姨	院民、樂生聖望教會長 老，現住澤生舍	20090416
阿英姨	院民、現住澡堂	20090331
金伯伯	院民、榮惠、曾任少校 參謀、樂生佛教會會 長，現住福壽舍	20090328
楊伯伯	院民、榮惠，現住玉山 舍	20090317、 20090318
鄭伯伯	院民、榮惠，現住處高 舍	20090315
燦桐伯	日據時代入院之樂生院 民，現住組合屋	20080321
藍阿姨	院民、自救會委員，現 住怡園	20090325
林志錚	學生，2004/2~2004/10 (在樂生時間)	20090118
胡清雅	學生，2006/7~	20090328
張馨文	學生，2004/2~	20090107
蔡宗芳	學生，2004/2~2005/5	20090215

## 二、研究者位置

筆者於2005年三月開始參與樂生保存運動，2006年1月加入青年樂生聯盟。

2006年暑假在新莊地區進行訪調與樂生厝邊市集，2007年暑假開始舉辦給迴龍居民參與的樂生社區學校，與在地居民接觸頻繁，建立了一些人際網絡，因此尋找關鍵受訪者的過程對筆者而言並非難事。但這樣的身分事實上也為研究帶來了挑戰，首先同時身為樂生社區學校的老師與研究者，雖容易能進入學生家長家中進行訪調，但問到關鍵問題諸如對於樂生的看法時，可以感覺到部分受訪者言詞閃爍、避重就輕，但卻明顯感受到受訪者是很有想法的。此外，而從事樂生運動的身分，在當地是敏感的，也讓一些民眾，不易接受訪談。在詢問是否能訪談一位居民的過程，她僅留下「樂生有什麼好問的」轉身就走。但訪談即便遭遇挫敗，也是有意義的。Briggs (1970) 與田野對象 (愛斯基摩人) 關係的破裂，被趕出田野為例，他卻化悲憤為力量，將失敗的田野經驗轉化成掌握其社群關係糾結。先前我的田野中受訪者中第一代是拒絕訪問的，先前我的思考都是，「該如何突破第一代的心房，讓他們能接受訪談」，但我反而忽略了社群中世代差異 (對於樂生不同的反應)，為什麼「第一代拒絕、第二代猶疑 (要不要跟我說)、第三代卻是主動問我有沒有到過樂生、哪裡很美」，我認為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受女性主義思潮影響，質性研究強調藉由不斷反省受訪者與研究者間的權力關係，不斷更新研究方法，以破除兩者間不對等的關係。對我而言，研究者與受訪者的關係由於涉及「誰決定問題」、「誰紀錄、詮釋、分析訪談內容」，因此兩者間必定存在著不對等的關係，因此雖然我打定主意要採取質性研究，但這道反身性手續過去對我來說只是作業標準程序。透過受壓迫者劇場的學習，我發現研究方法的選取，就好像是一場遊戲試驗，而我，就是這場遊戲的帶領者，決定著要採取什麼樣的位置與方法；我可以依循次領域中前輩留下的準則，也可以在其中開創另類的方法。在受壓迫者劇場中，帶領者若採取權威者的姿態，往往將

阻礙他人對活動參與的意願，許多透過反覆討論而出現的創新點子也將不可能發生。如果我認為學術實踐的目的之一，是為基進行動提供論述，讓更多人進一步認識所揭露的社會議題，再回頭反省我原先研究目的—「揭示二分對立語境背後複雜的關係」，如果只是尋找答案，那麼受訪者將只是資料提供對象，而原先我所認知的學術實踐目的將只存在於那些會讀我論文的人。但如果說知識是研究者與受訪者彼此激盪的產出，而那些受訪者又是最希望能因為我的研究而改變的人，那麼我就必須要花時間進入受訪者的日常生活。對於樂生院民來說，我是一位老朋友，因此需要突破的是進入新莊人的社區網絡，而非一次性蜻蜓點水式的訪談。因此我積極參與社區活動，透過參與迴龍社區中秋節聯歡烤肉、迴龍村社區教室、參與龜山鄉運動會、擔任迴龍醫院志工等方式，在迴龍社區積極拓展人際網絡。

然而樂生議題在新莊當地已為敏感話題，直接表明論文欲處理樂生與新莊的關係，或直接揭露參與於樂生保存運動的身分，都可能讓受訪者直接連結對樂生派的刻板印象，而在訪談中有所保留，甚至像林叔母親一般不願接受訪談。因此在對既有網絡以外的地方居民（不知道我參與樂生保留運動者）在進行訪談時，整個過程不主動揭露自身參與運動的身分，而是以台大地理所研究生的身分進行訪談，告知對方自己研究與迴龍歷史有關，寫作動機為有鑑於迴龍地區欠缺歷史資料的記錄，在訪談大綱中穿插許多迴龍歷史題目，而在訪談到樂生相關題目時，向對方強調希望能書寫記錄在地的聲音。

### 第三節 田野簡介

由於新莊幅員廣闊，因此將範圍設定在兩個區域，一為樂生所在地迴龍地區

位，迴龍區橫跨新莊、樹林、桃園縣龜山鄉交界，過去被視為三不管地帶。迴龍並未有實質行政區劃定，一般北以中正路746巷、南以三福街、東以中山路、西以龍興街為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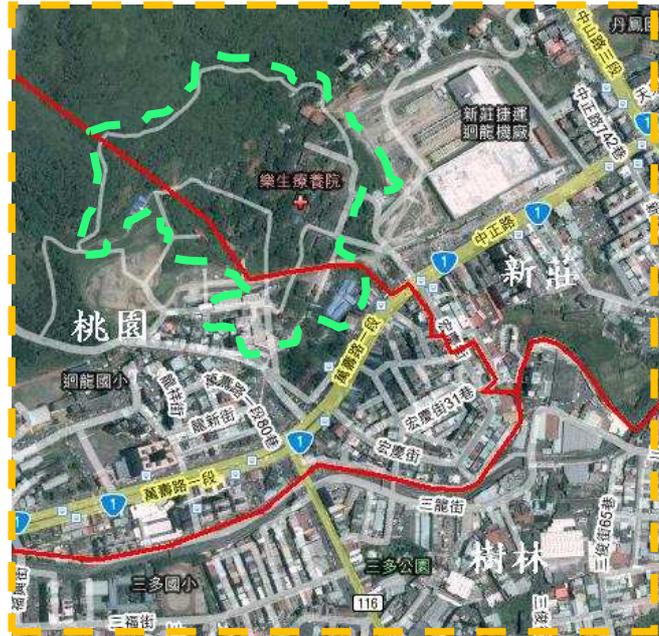


圖3-3-1 研究區圖

(綠線-樂生療養院、橘線-迴龍田野範圍、紅線-行政區界)

## 第四章 國家漢生病治理<sup>16</sup>

回顧台灣漢生病醫療史，諸多文獻溯及清乾隆元年（1736 年）興建的彰化養濟院（賴尚和，1952；陳威彬，2000）。養濟院為官設救卹慈善設施，專收流離顛沛於社會之貧病無依窮人，而彰化養濟院則為現有紀錄之最早臺灣癩病之專收機構，為當時彰化知縣秦士望所設，連橫《台灣通史》有以下記載：「秦士望，江蘇宿州人，以拔貢生出仕。雍正十二年，調彰化知縣。……前時臺灣瘴癘盛、水土惡，鄉僻之人每患癩疾，無藥可治，父母棄之，里黨絕之，流離道路，號為天刑。士望見而憫之，慮其感染，建養濟院於八卦山麓以居之，旁及廢疾之人，養之醫之，民稱善政。（1992：941）」為官方最早也是唯一視「癩病」為獨立於「鰥寡孤獨及篤疾之人」、急迫需處理的疾病，其餘養濟院則「於缺乏資料，無法確定在這些收容的人數中，究竟有多少人感染癩病，只能說，在這些收容的人中有癩病患者的存在。（陳威彬，2000：9）」因此清代癩病收容仍止乎於（秦氏）個人慈善行為（善政），構不上「國家治理」。而臺灣的養濟院也於 1895 年日殖初期先後遭總督府關閉，癩患自此流落街頭，直到 1930 年總督府樂生院的設立，而清末對癩病的處理方式也並未影響到日殖時期對癩病的處理。

本章首先指出漢生病與國家治理之間的關係，以日殖時期、光復初期國家癩病政策作為分析。作為殖民政府，日本總督府如何施行國家治理以鞏固政權正當性(legitimacy)？為何台灣總督府在關閉養濟院三十五年後，毅然決然進行癩病隔離政策？殖民政府使用什麼樣的治理理性、策略、技術、論述來達成？許多癩病史研究指出，光復初期國民政府癩病政策延續日本總督府政策（陳威彬，

<sup>16</sup> 清朝、日殖時期日本人稱漢生病為「癩疾」或「癩病」，而國民政府時期則稱為「癩瘋病」。因此為符合各時期脈絡，以下將以「癩病」與「癩瘋病」作為漢生病統稱。

2000；劉集成，2004)，那麼。國民政府為何決定延續殖民政府政策？本章節以1901年青木大勇呼籲設立癩病療養院之文，至1961年省政府廢除癩病強制隔離政策為時距，指出一甲子年間國家治理知識、修辭語彙、技術、計劃與想像雖有所轉變，但因本質思想雷同而產生相似的社會面貌。此外，本文以1961年至今為另一個時距，指出這個階段由於癩病根治藥物的出現，使得治理轉而採取新衛生知識、計劃與治理技術。其次，我將探討治理政策在日常生活的影響，我主要從劃界工作(boundary work)層面探討，從樂生院民與迴龍居民訪談分析，覺察國家癩病治理術在日常生活尺度刻劃出「有菌/無菌」、「有病/健康」的端倪。

### 第一節 風土馴化：臺灣監控網絡的設立 (1985-)

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後，日軍近衛師團旋即進行「征臺之役」，據《征臺衛生彙報》統計，自1895年5月至11月期間，總計戰死者164人，負傷者515人，因病死亡人數卻多達4,624人（病死者為戰死者28倍），而患病數更高達26,094人，為初抵臺灣的殖民者，無疑的投下了震撼彈（1896: 477-479）。日後對臺灣傳染病防治貢獻良多的堀內次雄<sup>17</sup>，在回憶那段擔任隨行軍醫的日子，反映了19世紀以來殖民者對於殖民地「風土熱病」的恐懼與不知所措：「臺北到處可見到熱病、霍亂、腳氣病，然卻不知從何著手處理。何謂熱病？臺灣有哪些地方病及傳染病？向來沒有人調查過，也沒有任何報告。又沒有學校及醫院，好比突然闖進黑暗中一般。（堀內次郎，1942，轉引自范燕秋，1996: 140）」

<sup>17</sup> 堀內次雄，1896年擔任臺北病院內科醫師，並開始進行傳染病研究，先後發現鼠疫、登革熱、副傷寒、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及甲狀腺腫等病例，對傳染病防治貢獻頗大。1915年出任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三任校長，至1936年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為止，擔任校長長達21年，對於臺灣醫學教育貢獻極大。對於醫學校學生參與反殖民運動也極表理解，贏得學生尊敬與感念。戰後，繼續留在臺大醫院服務，至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返回日本。（引自臺灣歷史辭典，范燕秋）[2009.05.28]

「風土病」(endemic) 研究為 19 世紀殖民醫學中重要的研究議題，德國醫學則以風土馴化 (Akklimation, 即英文的 acclimatization) 為之命名<sup>18</sup>。「風土病」意指對在地居民不具威脅、對不具免疫力的外來人口造成嚴重死傷的疾病，因此「風土馴化」在殖民擴張時期特別重要，為維護軍隊、官員、商人、傳教士的健康，使治理任務能順利執行，「以人為力量改變居住的品質，使之儘量符合母國的生活條件，並增強殖民者的免疫力(守屋亦堂譯，1899: 32-40，轉引自劉士永，2001: 62)」即為當時重要的措施。在征戰中重挫的日人，給予臺灣「鬼介之島」或「瘴厲之島」的稱號 (井出季和太，1937: 29)，以「瘧疾」為例，在台日人每年死亡人數約為 300 人以上(范燕秋，1996: 159-160)，甚至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夫婦在上任期間雙雙罹患瘧疾，乃木希典之母更因瘧疾引發宿疾而病逝臺北(楊玉齡，2002: 38)，而島內四起的抗日活動與風土病對日人所造成的威脅，1897 年在日本國內引發了「臺灣賣卻論」之爭<sup>19</sup>，輿論認為占領臺灣非但未蒙其利反受其害，主張仿照帝俄將阿拉斯加賣給美國之例，把臺灣賣給其他列強。

1898 年銜命來臺的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部長後藤新平總督府，背負著不成功便成仁的使命，為日本殖民統治奠定基礎。當今史學研究認為後藤新平是臺灣的衛生制度改善奠基的關鍵人物(范燕秋，1998；Liu, 2000)，他將德國細民衛生(sozialhygiene，或譯作社會衛生)理論落實於臺灣。sozialhygiene 一詞乃源自於德國，強調國家介入醫療衛生事務的必要性，並將國家與社會的發展目標混合，即以國家富強為社會健康之表徵，強調社會醫學家主張之社會救濟有害

---

<sup>18</sup> 英國醫學界將風土病研究議題稱為熱帶醫學(tropical medicine)，但本文為強調日本醫學師法於德國，因此以「風土馴化」稱之。

<sup>19</sup> 日本統治臺灣的初期由於島內抗日活動極為活躍，為鎮壓抗日活動，維持軍政起見，耗費極大財政開支，由於總督府每年約 1,000 萬圓的預算中，由日本本國補助者約 700 萬圓，因而引發日本國內不滿，認為占領臺灣非但未蒙其利反受其害，為緩和此一輿論壓力，日本帝國議會乃通過削減年補助金為 400 萬圓。(呂紹理，臺灣歷史辭典)[2009.05.29]

於種族體質的汰弱存強，而維持種族體質的強健，是國家無法推諉的天職，(Weindling, 1986: 277-301，轉引自劉士永，1997: 105-106)。後藤新平為了區隔 *sozialhygiene* 與英美系醫學中的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為 *sozialhygiene* 創造了「細民衛生」一詞以示不同(中野操，31-32，轉引自劉士永，1997)。「細民」在日語中意指「賤民」，暗示著 *sozialhygiene* 強調著社會達爾文式的風土馴化思想：以溫帶殖民者觀點，將熱帶風土(或人種)定義為「不健康」、「需要被改造」、「陳腐」，也暗示著「透過控制人的生活方式與社會行為，特別是那些被看作偏差的行為，來達成目標(Liu, 2000)」。後藤新平上任後，旋即斷定臺灣的衛生醫學問題，是社會議題，需要藉由政治來處理，因此提出以國家力量進行科學調查方法、衛生警察—醫療—保甲制度與建立醫學系統。本文認為，日人通過醫學與公共衛生達成殖民治理目的，主要是透過後藤新平的政策，以下詳細敘述。

### 1. 治理策略一：科學調查方法

在談策略之前，還必須提到後藤新平著名的概念「生物學原則」(*seibutsugaku genri*)<sup>20</sup>。在他 1889 年知名的翻譯著作《國家衛生原理》<sup>21</sup>以及 1890 年《衛生制度論》中指出生物學原則是建立現代社會與健康種族的不二法門，治理臺灣最佳的對策為採生物學原則的統治(Liu, 2000: 14)。首先後藤強調衛生治理的科學特質：「衛生是廣泛有關醫學、生物學、化學、工藝學、統計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行政學等的一大學科」(國家衛生原理，轉引自范燕秋，1998:56)。

<sup>20</sup>事實上，「生物學原則」並非後藤的發明，對於明治時期的知識份子而言，生物學原則意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物決定論。十九世紀，生物學被普遍應用於社會、政治哲學中，形成「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不同種族位於生物界發展的不同階段，有文明與野蠻之別，「優勝劣敗」正符合自然之道(范燕秋，1998: 54)。

<sup>21</sup> 《國家衛生原理》乃翻譯自德國參事官兼醫生醫官 Louis Pappenheim 《衛生警察學》

強調凡事必經科學的調查之後，而採取適應當地環境需要的策略(范燕秋，1996:142)。他以比目魚與鯛魚的譬喻來說明生物學原則：「不能將比目魚的眼睛當作鯛魚的眼睛，鯛魚的眼睛在頭的兩側，而比目魚的眼睛卻在頭的同一側，雖然奇怪但是要像鯛魚的眼睛放在兩側是不可能的；比目魚的一側有兩個眼睛，在生物學上有其必要性，若要將所有的魚的眼睛都置於頭的兩側是行不通的。.....社會的習慣或制度其來有自，長時間下有必要產生，在道理未明之前，若要將文明國家的制度強行在未開化國家中，可謂文明的暴政，所以治理台灣時，首先要把台灣的舊慣制度以科學方法詳細調查，順應民情施治。...貿然將日本的法律制度移到台灣實施，就像想把比目魚的眼睛換成鯛魚的眼睛是一樣的。(小熊英二，2005:139)」，因此後藤上任後即進行地籍調查、舊慣調查和臨時戶口調查，依據調查結果設計治理台灣的措施，並於 1899 年總督府設立「台灣傳染病與地方疾病調查委員會」，進行大規模的臺灣風土疾病調查。

## 2. 治理策略二：衛生警察—醫療—保甲制度

其次，他以生物學原則建立國家理論概念，他認為「國家實是至高的人體，至尊的有機體 (後藤新平，1889:6，轉引自范燕秋，1998:52)。」他以生物競爭原則說明，人類屬群聚動物，因個人為生的機能為弱，因此團結合作組成社會，並且擁戴「主權者」形成「國家」，國家「即人類組成的衛生團體(後藤新平，1889:1-6)」，也就是說「衛生已不限於身體、生理層次，而擴及所有人事現象，衛生制度不只在防治傳染疾病，而須兼顧與國家發展有關的社會政治事物。(58)」在此衛生制度包含國家總體機能，也就是在國家有機體概念之下，他強調國家由主權者領導(中央集權)的重要，國家既然為有機體，彼此行政就必須相互關聯，因此強調建立統合的衛生制度、專業技術的監督、地方自治。因此提出衛生警察—

保甲制度，由國家權力介入個人衛生的必要。

1896年初他以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的身分，來台規劃衛生制度，頒布《傳染病防治條例》，以鼠疫、天花、霍亂、傷寒、腸傷寒、痢疾、白喉、猩紅熱等為法定傳染病，並明訂防疫措施，如設檢疫站、隔離患者、阻斷交通路徑、屍體處理，及醫師彙報疫情等義務（臺灣總督府，1897: 243，轉引自劉士永，2001: 57）。但「惡疫瘴癘」並未根除，1899年起，後藤將編治保甲制度，並結合上層日人警察系統。1901年，為求有效掌控衛生行政工作，統一中央與地方聯繫單位，決定增設強勢單位，以接管原由總務及民政部負責之傳染病及地方病預防工作，以及其他公共衛生事務，於是衛生事務單位由民政單位轉由警察單位負責。在地方之衛生工作依然由各州警務部之衛生課，各廳警務課之衛生系負責。總督府將衛生課歸屬於警察本署之下後，建立衛生與警察密不可分之關係。至此確立以總督府之警察本署衛生課為中心，聯繫地方警務衛生課系，強制管理各家戶衛生事務。1920年（大正九年）地方制度改革，依據「臺灣總督府地方制」州廳以下之衛生機關即為市役所內設警察課，掌管衛生與保安，市設警察分署，署下及街、庄置警察官吏派出所，以指揮、監督街庄之郡守兼有警察權。因此警察權力大為擴展，並全面地干涉一般行政事務（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86: 1-43，轉引自丁文惠，2008: 77）。於是後藤首先以衛生行政系統以總督府警察本署衛生課為領導中心，連繫地方廳警務課，由具備醫學知識的警察為主要執行者，再經保甲制度貫徹到社會基層，形成統整、嚴密的警察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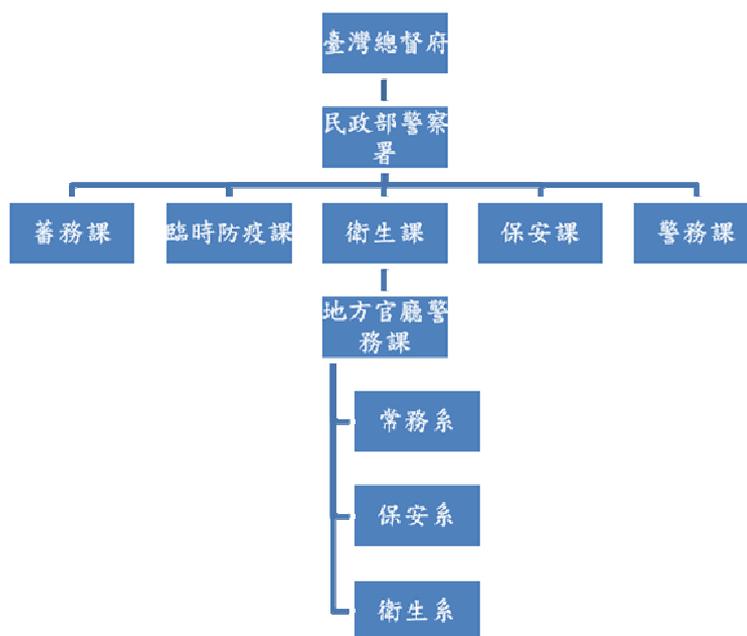


圖 4-1-2-1 臺灣總督府衛生行政體系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1986)

### 3. 治理策略三：醫療知識生產網絡

最後，後藤強調日本近代公共衛生的建構與國家發展有重大關係，公共衛生是鞏固國家機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醫學則成為一種操控機制(范燕秋，1998:77)。1898年後藤新平生物學原則的統治下，殖民政府成立醫學研究機構，包括台灣總督府傳染病地方調查委員、總督府研究所，以至中央研究所衛生部、熱帶醫學研究所，由國家支持來累積研究成果(155)。范燕秋 (1995) 認為，日本政府透過在台建立衛生與醫療監控系統，展現日本殖民行政之具體成效，亦代表殖民政府官方控制方向之形成。1903年10月，後藤以台灣總督府民政官的身分在臺灣醫學會第一次大會上進行演講：

我來本島赴任之際，欲將新領土的經營，置於生物學的基礎上，諸君亦有所知。蓋此方針幾乎是世界所公認。(既是如此)即不能不以生物

進化的真理作為標準，特別是對現今進化達頂點的人類，最需要審慎研究。而最適合擔當此研究位置的就是醫學者。雙肩擔當本島經營的，是立志移往遙遠他鄉的母國人。.....而研究戰勝風土的影響，增強人類抵抗力的方法，必求助於醫學。(臺灣醫師會第一回大會に於にる，1979: 23，轉引自范燕秋，1998: 50)

除了上述「臺灣傳染病與地方並調查委員會」的成立，總督府並設立專門研究所，以科學疾病調查為主，並加強熱帶醫學衛生之研究。1907年，總督府研究所設立，1909年成立衛生部，1921年成立中央研究所，主要進行鼠疫、霍亂、和瘧疾等細菌學研究外，也將這一套理論應用於一般性的衛生檢驗工作中，並透過各種衛生行政規範，將日本醫學標準逐漸內化臺人日常生活(劉士永：1997:117)，如入學身體檢查(臺北縣史料彙抄，1936)，日人對於家屋清潔、飲食物、以至於隨地便溺均可以加以干涉(陳君愷，1993: 116)。

## 第二節 樂生療養院與國家癩病治理

誠如前言所示，日殖時期基本上是透過醫學與公共衛生知識，作為治理思想，並且通過各種策略，例如人口病理統計、警察衛生制度的建立，將臺灣改造成為一個受殖民監控的國家社會網絡，並藉由權力之眼檢查、分類被殖民者的身體，並且使用各種論述合理化治理技術。回到國家治理的角度，在「鼠疫」、「瘧疾」防治中，日殖政府已建立了殖民網絡，那麼癩病防治在國家治理中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致使總督府必須花費三十三萬日圓打造癩病隔離院—樂生療養院？或以陳威彬(2000: 7)的提問：此時距日人領台已經過35年的時間，為何這麼久後才設立樂生院呢？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使得總督府開始認為，台灣有需要設立癩病的專門療養院—樂生院—呢？這中間究竟隱含著什麼樣的殖民

者利益與？以下以醫療權威的統計圖表、國族主義的權力地圖、健康/不健康的空間區隔、皇民化實驗室作為分析架構，從中指出國族想像如何通過各種理性數字、圖像、語彙與實體空間治理術。

### 1. 醫療權威的統計圖表

癩病是相當古老的疾病，許多文獻顯示癩病中世紀的歐洲已斷然絕跡。Gussow(1970:432)指出，19 世紀中葉發生了三個事件，讓癩病重回國際醫學討論焦點：首先，1860 年夏威夷爆發大規模癩病感染；其二，挪威的 Hansen 醫生於 1874 年發現癩病桿菌；最後，1889 年自願到夏威夷傳教的 Damien 神父死於癩病，因而強化了許多西方人對癩瘋病患的排斥，也引起醫界與一般民眾對於癩瘋病在歐洲重新流行的疑慮(李尚仁，2003: 469)。1889 年，種種事件促使英國於成立國家癩病基金會(National Leprosy Fund)以紀念 Damien 神父之死，1891 年基金會於印度進行癩病調查報告，報告中指出癩病並非遺傳性疾病，癩病的科學分類必須被歸於傳染病，並且建議採取全面或部分強制隔離措施，以避免癩病的大規模傳染。1895 年，Hansen 與 Looft 醫師，在醫學報告中承認無法摧毀癩病桿菌。因此 1897 年於柏林召開的第一屆世界癩瘋病會議(International Leprosy Congress)，會中認為「隔離是最好防止疾病傳播的方法...建議各國建立義務通報、觀察與隔離系統」、「癩病為無法治癒之疾」(Gussow,1970:436)。

當時日本政府派著名的細菌學家北理柴三郎與土肥慶藏醫師出席，會中確定將患者強制隔離以防止疾病擴散的作法。於是 1900 年日本內務省進行國內癩患統計，同年臺灣政府以警察系統進行普查，當時的臺灣，仍以掃蕩「土匪」、以及「瘧疾」、「鼠疫」風土馴化為主要政策，並未針對癩病進行防治措施。直到兩篇醫學研究報告的出現，才喚醒在台日人對於癩病的重視，一篇是台北醫院醫

生青木大勇所撰寫的〈癩院設置の必要を論ず〉，為總督府醫院系統首次提出的癩病報告(范燕秋，2000、2005)；另一篇是由台北醫院皮膚科醫生、同時也是臺北醫專的宮原敦教授所撰寫的〈臺灣ノ癩人〉。

1901年台北醫院醫生青木大勇在《臺灣醫事雜誌》發表〈癩院設置の必要を論ず〉一文，呼籲台灣總督府應當立即正視台灣癩病議題。他強調：「為防範癩病蔓延至東洋，須設癩病院，以收容可憐患者，施予教養與治療。隔離患者既可防止傳染，又可斷其子孫，以防不良遺傳。...其間，隔離患者可作為癩病預防與病理研究的素材，藉以根除此一可怕疾病。...為人民安全與幸福故，有將無法痊癒者永久隔離之必要。癩病院亦當符合人情風俗，在組織上需有官吏、醫官、事務官等配置。除尋常功能外，癩病院需備有遊戲場與娛樂場，並設置警衛與監獄，得再提供快樂之於，給予必要之刑罰。(轉引自王文基，王珮瑩，2009: 62)」青木的文章，他推估台灣癩患為 28,800 人，較日本本國患病率高出達八倍強。范燕秋歸納青木研究重要處有二：其一指出台灣癩病類型為「結節癩」，具高傳染力，將可能危害在台日人健康，因此建言設置隔離病院之必要。其二，癩菌生活能力薄弱，癩菌因癩細胞才得以生育，癩細胞為遺傳，因此他認為癩病與遺傳有關(2000: 175)。而青木的報告更透過統計數據指出臺人罹患率較日本母國高，他並引用東大教授土肥博士的論點，指出：結節癩多的地方癩病傳染的機會大，患者百分比可能更多；而且結節癩多的地方意味著癩流行初期，神經癩多的地方病毒較為微弱。他認為兼顧學理與實際，應該承認傳染說，又參考遺傳因素。據此最好的方法事隔離患者、阻絕傳染，其次是斷絕其生育。

1919年台北醫院皮膚科醫生、同時也是臺北醫專教授的宮原敦，在《臺灣醫學會雜誌》發表，首先他以西方熱帶醫學研究記載世界三大癩病地之一在廣

東、福建一帶，而臺灣本島皆近兩地，並且他引用青木的研究報告，指出臺灣必然為癩病蔓延的重地。其二，他以台灣醫院處理癩患為實例作分析，具體的分析自明治四十一年(1908)至大正六年(1917)間，臺北醫院皮膚科門診癩病診療人數變化(以性別、內地新患者人數、內地癩人人數、本島新患者人數、本島癩人人數為計算指標)，最後統計出，以統計數據、圖表來顯示日人癩患逐年增加，而且成倍數的劇增，如下表所示：

表 4-2-1-1 1919 年宮原敦癩病人數調查表  
資料來源：宮原敦(1919: 795)

	昭和 31-35 年 (1898-1902)	昭和 36-40 年 (1903-1907)	昭和 41-大正元年 (1908-1912)	大正 2-6 年 (1913-1917)
內地人癩人 千分率	0.462	0.417	0.952	1.084
台北人口	13,000	19,200	29,400	37,800
內地人癩人 (人數)	6	8	28	41
本島人癩人 (人數)	31	32	45	51

接著作者比較日本主要都市與台北之癩病比例，顯使臺北高於日本數倍，尤以臺北日人癩病女子高於日本都市(請見表)。

表 4-2-1-2 日本各都市癩患人數比較  
資料來源：宮原敦(1919: 740)

	癩人千分率	市街人口	十年間癩人數
東京	0.088	2,000,000	175
京都	0.505	495,000	250
福岡	0.674	95,000	64
臺北	1.621	95,000	154
臺北(內地人)	1.833	30,000	55
臺北(本島人)	1.523	65,000	99

表 4-2-1-3 日本本島與在台日人女性癩患比

資料來源：宮原敦(1919: 742)

	母國平均 <sup>22</sup>	臺灣平均
患者中男性百分率	80.7	56.2
患者中女性百分率	19	44.1
女子對男子比值	4.3	1.2

宮原指出台灣女性患病比例為母國女性患病比例之 3 倍。而在癩患類型方面，他以結節癩、混合癩與斑紋麻痺癩的比例<sup>23</sup>作為指標，指出斑紋麻痺癩、結節癩、混合癩(兩者之混合)。世界癩病分部，寒冷地帶像是挪威多為結節型癩病，

<sup>22</sup> 母國平均乃由多位不同醫師在東京、九州、大阪、京都所製作之平均統計數據。

<sup>23</sup> 結節癩對斑紋麻痺癩，數字較少者，代表結節癩比率較高。混合癩對斑紋麻痺癩，數字較少者，代表混合癩比率較高。混合癩與結節癩對斑紋麻痺癩代表混合癩與結節癩與斑紋麻痺癩的比數。

熱帶、溫帶地區則多麻痺型癩病；溫暖濕度地區(攝氏 21-24 度)結節型癩病也多，乾燥地則麻痺型較多。依據宮原敦的分析，臺灣由於地處熱帶，又因溫度濕度較日本高，因此結節型癩病較多。然而日本本島癩病發病型態多為麻痺型，但在台日人發病卻多為結節型，且為日本本島之兩倍，因此宮原推測多數在台日人皆為來台後遭到感染。

表 4-2-1-4 癩病類型比較  
資料來源：宮原敦(1919: 746-747)

	母國平均數	臺北內地人	臺北本島人
斑紋麻痺癩人數 /結節癩人數	11	5.1	4.6
男	10.9	4.5	5.6
女	12.3	6.3	2
斑紋麻痺癩人數 /對混合癩人數	10.3	11.6	6.4
男	10.6	9	8
女	9.2	19	2.7
斑紋麻痺癩人數 /對混合癩與結 節癩人數	5	3.5	2.7
男	5.7	3	3.3
女	5.3	4.8	1.1

圖中顯示，具有傳染性、最危險的結節癩與混合癩，以臺人最多，在台日人為其次，最後是日人。他在文章中指出，臺人麻痺神經癩多於結節癩，但因為濕度高，因此結節型多於日本，接著，宮原以在台日癩人、本島癩人的職業統計，推估在

台日人傳染途徑<sup>24</sup>。

表 4-2-1-5 癩患職業統計  
資料來源：宮原敦(1919: 752-753)

職業 \ 人數	內地人			本島人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官公吏	18	12	6	2	2	0
商業	11	7	4	28	21	7
生徒	8	4	4	7	7	0
事務員	5	4	1	1	1	0
職人	5	4	1	5	4	1
車夫	0	0	0	1	1	0
雇女	2	0	2	0	0	0
娼妓	1	0	1	0	0	0
苦力	0	0	0	8	6	2
農業	1	1	0	17	16	1

報告中，依據患者職業和性別比例、地區分佈、癩患類型、感染時間等，論證是日人渡臺之後，受到土著癩患者傳染的結果。就日癩患者職業分析，發現患者以官公吏及其所屬雇傭人員最多，其次是商人、店員，再次是學生。顯示日人患者比例與台人接觸頻率為正比。總結宮原研究，他藉由日人女子患者數偏高來、在台日人癩病類型與臺人較為接近，在台日人擔任較可能與臺人接觸的職業，來論證日人來台受台人癩患感染。並在結語中寫到，伴隨殖民地繁榮，日人來台人口增加，接觸臺人機會增加，癩人也將增加，若放任不管，將發現更多由台灣感染返國的病例，因此他呼籲官方設立「癩院」，採取強制隔離措施。

為了削弱台人對日人政權的威脅，日人將醫生塑造為至高無上的權威，是

<sup>24</sup> 數字難以辨識則以#代替。除上述職業外，還包括了漁夫、小使、無業、不明。

臺灣最熱門的職業，讓最聰明的人來唸，企圖將人民對於殖民政權的質問，轉移至公共衛生的關懷。因此當最有名望的醫生階級將漢生病化為人種問題(台灣人)，並以各種理性分析(統計學)與醫療知識(隔離)，來證明台灣人的疾病以危害了我群(在台日人)的生存，很快的引起在台日人的重視，聯名表示支持(范燕秋，2005: 189-190)。

## 2. 國族主義的權力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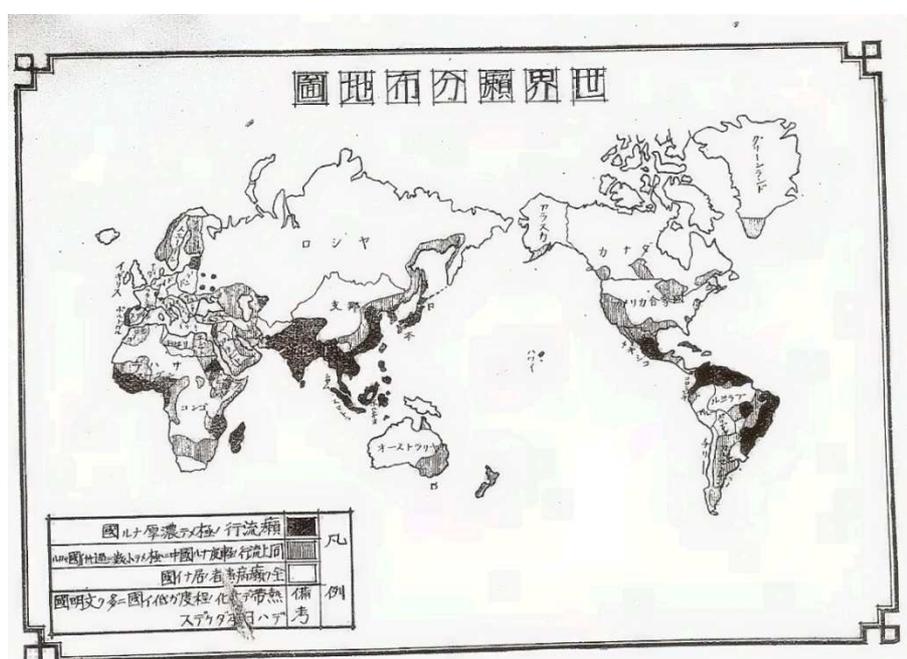


圖 4-2-2-1 世界癩分布地圖

資料來源：社會事業の友(1931:1)

1930 年總督府樂生療養院正式啟用，並且開始擔負臺灣癩病預防之重責大任，在臺灣總督府宣傳癩病之際，在 1930 年 24 期、1931 年 27 期《社會事業の友》雜誌<sup>25</sup>中製作了「癩問題特集」，為癩病防治理與總督府樂生療養院的啟用念

<sup>25</sup> 《社會事業の友》雜誌由臺灣社會事業協會所發行，於 1928 年創辦，內容包含新知介紹與宣傳理念之橋樑(林萬億，2006: 130)。社會事業即為英國的慈善組織，臺灣社會事業協會底下窮人救濟、醫療救濟、兒童保護、職業介紹、出獄感化...等 174 個團體。

作為宣傳。其中 27 期封面為一張世界地圖，以面量圖<sup>26</sup>的表示手法，標示世界各國癩病流行程度。Gussow(1970)指出：「描繪疾病的地理分布的技術(也就是當時醫療地理學的範疇)，自十八世紀中葉以來相當重要，特別是它位在熱帶醫學(或稱為風土馴化)脈絡之下，熱帶醫學事實上處理那些在熱帶殖民地盛行的疾病，對於殖民權力而言具有極度的興趣。」從上圖可明顯看出，癩病流行區域集中於圖的中間地帶，也就是熱帶地區，其中尤以東亞、東南亞、南亞地區最為嚴重，唯一位於東北亞卻同時為嚴重疫區的國家即為日本，繪圖者特別在地圖範例中，標註了「在熱帶地區，文化程度低的國家較多，在文明國僅有日本而已。」

這張圖另一處有趣的是，地圖乃麥卡托投影所繪製的，麥卡托投影法為 16 世紀殖民帝國時代的發明，特色是圖上兩點直線角度不變，因此常用於繪製航海圖，當時的麥卡托投影圖以大西洋為中心，歐洲、美洲在圖上的面積較大，亞洲則位於圖的邊緣且面積較小，因此麥卡托投影又被視為歐美中心觀點的殖民者地圖(Wood and Fels, 1992)，而本圖則是以太平洋為中心，充分顯露日本欲在新殖民時代成為東洋盟主的決心，那麼，因癩病盛行所塗繪的黑色，就為日本文明國的想像蒙上了陰影。

1930 年總督府樂生療養院正式啟用，並且開始擔負臺灣癩病預防之重責大任，擔任第一任院長的上川豐，於 1932 年《臺灣時報》<sup>27</sup>上發表〈樂生院の使命〉一文，他首先指出癩病於 10 世紀全歐洲流行，並於 15 世紀達到流行的巔峰，當時歐洲各國無不廣設癩病隔離所，遂於 16 世紀漸次減少，17 世紀絕滅，儘管十九世紀末挪威、俄國出現新病例，但也僅十二位患者，而歐洲諸國也在國內癩病

<sup>26</sup> 黑色為嚴重國家，斜線為輕度流行國家，白色為無感染國家。

<sup>27</sup> 《臺灣時報》，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所發行的日語機關雜誌，內容包含臺灣的政治、政事、時事、農事、工事、商事、學術、技藝、統計等之報導與評論，尤其關注臺灣的統治與南洋地區情勢，刊登於此可知這篇文章具有政令宣導之用。

根絕後，紛紛轉向殖民地從事人道的癩病救濟事業。接著文鋒一轉：

到了明治時期，我國的文化有長足的進步。在教育、軍事、政治上百分之百的進展。我國數次在戰爭中獲勝，在世界列強中嶄露頭角，成為世界五大強國之一，更可說是三大強國之一，果真是輝煌的文化成就。至今，我國應該是處於領導世界的地位。但就在我們看著我們的強勢時，其中在四百四種病症中非文化病之一的癩病，仍肆虐將近十萬之多的悲慘癩瘋病患，……三大強國、或五大強國的其他國家，沒有一個有此種非文化病的。國恥！絕對不能有如此的國恥存在。(上川豐，1932: 3)

指出日本國勢與歐洲列強相當，可謂世界三大強國之一，但在境內卻有著其他列強境內早已根絕的疾病，而日本卻仍擁有列強殖民地才有的疾病，因此在細民衛生思想中，癩病患者的存在成為社會問題、成為國恥，是 Mary Douglass 筆下象徵著失序的汙物(dirt)，衝擊著日本文化國的神話，因此總督府樂生療養院的使命在於將國恥病徹底根絕，讓日本成為真正的文化國。在文末上川引用英國癩病研究專家的研究數據，論證日本是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癩病國，與歐美國家極少的癩患數相比，日本作為東洋盟主以及文化國的事實就無法伸張。並且指出，日本成為癩病國是因為自古以來認為癩病是遺傳，因此放任患者、不講究任何預防方法。相對，歐洲各國講究傳染預防法，廣設癩隔離院，因此控制其流行。再將脈絡帶回到圖 4-1-2-2-1，事實上地圖本身是一種的看得見的政治(politics of visibility)的作用。

1931 年 27 期《社會事業の友》雜誌，提出另一個概念：臺灣癩病於 58 年即可根絕疾病。上川推估臺灣癩病患約 5,220 人，癩病患者主要包含神經癩與高

傳染性的結節癩兩種，兩者的比例為三比一，因此以高傳染性癩病收容，樂生院需容納 2,350 人，根據統計，癩病患者在 20 年間的死亡率為 87.87%，加上最長壽的病患於發病 48 年後死亡，並估計因此半世紀後當可將癩病從臺灣清除完畢。若以患者減少率、死亡率與十年後收容人數達 2,100 人計算，即可根絕臺灣癩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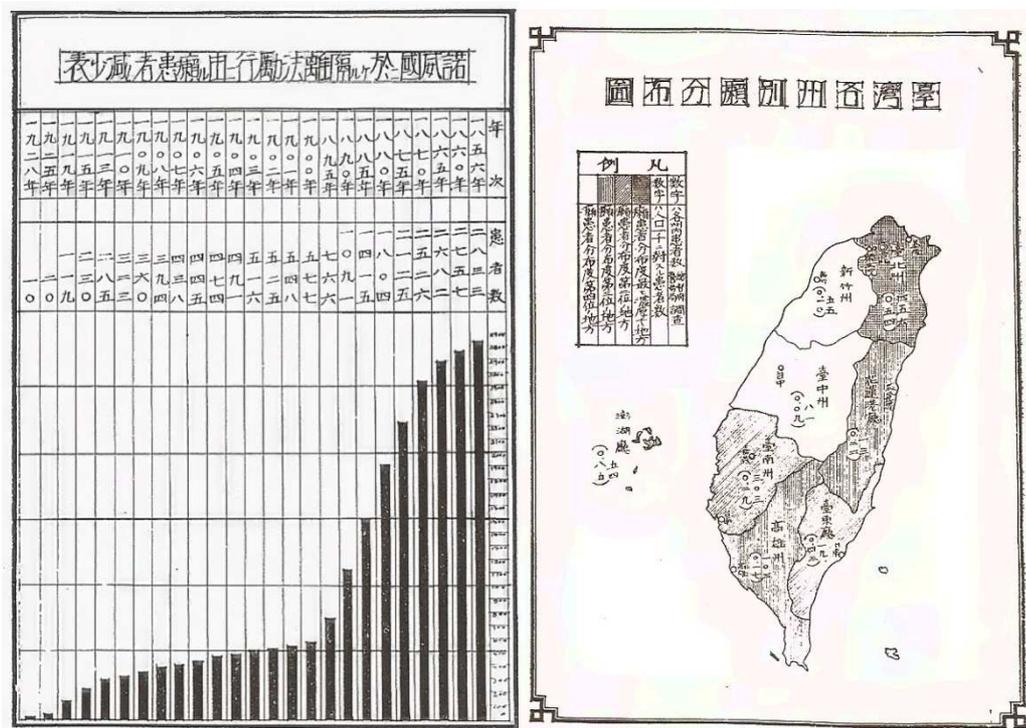


圖 4-2-2-2 左 挪威於隔離法勵行後癩患者減少表

右 臺灣各州別癩分布圖<sup>28</sup>

資料來源：社會事業の友(1931:116)

上川並且以挪威長條圖表說明挪威自 1856 年強制隔離政策施行以來，癩病人口數量人口數量驟減的趨勢，藉以挪威的例子證明強制隔離政策必然有效，癩病根絕不是美夢。然而，文章卻未詳細申論挪威癩病人數驟降的可能原因，諸如國內

<sup>28</sup> 癩患者分布最濃厚地：臺北州(456, 0.54)、癩患者分布第二位地方：台南州(303, 0.29)、臺東廳(19, 0.43)、癩患者分布第三位地：花蓮港廳(13, 0.22)、高雄州(103, 0.17)、癩患者分布第四位地方：新竹州(55, 0.10)、台中州(81, 0.09)。

衛生環境改善、醫療品質提高。此外從圖表上我們可讀到在 1890 年出現了轉折點，1890 年前人數驟降快、年後驟降趨於緩慢，但上川也並未給予解釋。

### 3. 有菌/無菌的空間區隔

日本政府將各地癩瘋病患集中於普遍設置在地處邊陲、人煙罕至的新莊與桃園交界，地址為「臺北州新莊郡新莊街頂坡角」。在空間配置上，為與外界隔離，採退縮式建築配置自縱貫公路退縮 135 公尺，並設計迂迴曲折的隱蔽性入口門道，佐以茂密植栽使其隱匿，並透過鐵欄、鐵絲網等在實質空間上與外界隔離。樂生療養院則依據細菌學的概念，被區分為有菌、無菌兩大區域。而院內又分為隔離區(患者住處)與非隔離區(醫護行政人員)，兩區之間注入了消毒水(石炭酸)，醫護人員進出病患都要消毒，病患用過的東西，如果別人用也要消毒。患者被規定不能越過隔離區，兩區交界還有專門看守的警察。樂生院與外界以有形的界線區隔，院內有菌區與無菌區也以有形的界線區隔，劃界本身是種分類，暗示了誰可以出現、誰不可以，穿越界線進入異界也有一套規範，規定誰可以穿越(健康者)、如何才能穿越(穿防護衣、過消毒水)。除了有形的空間界線，在空間上還有無形的規訓，每天要點名兩次，早晨一次，睡前一次，病患若未經准許外出，被抓到要罰禁閉三天。

### 4. 愛與犧牲的修辭與皇民化實驗室

樂生院若欲達成其使命，也就是從臺灣的土地根絕此悲慘的疾病，其方法極為簡單明瞭，即是將臺灣全部癩患隔離在療養院，終生斷絕他們與一般健康者的接觸。....將臺灣現存許多悲慘的患者收容隔離，不僅醫療其身體、也救濟其精神，使療養院成為唯一安住地，讓她們在

那裏安心地快樂度過一生.....才能將本島從此一病魔徹底解救。(上川豐，1932: 3)

「刑務所並非圍繞水泥高牆，以及冰冷鐵板的監獄，而是愛的刑務所，是由世人許多關愛建成，由溫暖所包圍、充滿著情與愛的刑務所....患者應該將這狹隘的療養所當成自己的社會，以及安住的天地，建設此處成為充滿美好的人類愛、癩患者更生的和平樂土—理想鄉。(上川豐，1933: 18-19)」

強調(患者)如同兄弟姊妹、同家族一般的生活，並覺悟共同為清除人類此悲慘的疾病而犧牲奉獻。(上川豐，1931: 143，轉引自范燕秋，2005: 215)

上川豐在〈癩預防根絕事業と社會性運動〉一文章中指出：「臺灣本島人因文化落後，對於癩病的觀念頗為閒散、毫無防範心理，比如：與癩患同座、一起吃飯或分吃食物，以及癩患自由出入市集、買賣雜物，或從事其他各種職業，這些可能有傳染的危險(1931: 112-121)」。因此他提出「癩預防的社會性運動」，一方面以科學性知識強調癩病並非遺傳病、而是傳染病，「將隱藏在各家庭的患者全部收容於療養院；此事、則有賴民眾認知癩病，特別是自覺家庭內傳染的可怕，以及儘早將患者送出、隔離於療養所」(上川豐，1933: 61-73，轉引自范燕秋，2005: 207)；另一方面藉由動員社會資源，充實療養院內設施，給予患者安慰、使其忘掉病痛之苦，並且防止患者逃跑。但有趣的是1907年人類學家伊能嘉矩針對漢人癩病的迷信研究指出，因為「迷信」，使得衛生觀念

低的漢人減少癩病病毒感染的危害(147-148)<sup>29</sup>。兩種論述皆為論證臺人的落後、無知與迷信，諷刺的是最後卻得到截然不同的結論（癩病在台人之間不容易感染），而上川為生產出支持強制隔離政策的知識，在理性統治思考下，必然作出如此判斷。

樂生院長是國家行使漢生病治理的代理人，官方論述中揭示日本政府將漢生病視為非文明的表徵、國家現代性的威脅，治理的目標是要讓癩病從島上消失，因此一方面透過知識灌輸社會大眾「癩病的傳染性」，同時將樂生院打造成充滿「愛」的「理想鄉」，正當化癩病防治政策，在鞭與飴的政策操作下，吸引癩病患者入住。針對個人治理，官方論述要求癩病患者應該有自我犧牲的自覺，期待患者能抱持著神風特攻隊般的精神，以換取國族進化，但期待患者之間應當如同家庭成員一般相互扶持，強調「救癩事業的原動力是洋溢著愛的癩病觀（上川豐，1934）」。

事實上，從樂生院從整建到啟用，日本皇室扮演重要的角色<sup>30</sup>。在 1931 年 27 期《社會事業の友》雜誌內頁第二頁，就放了光明皇后<sup>31</sup>癩施療圖，並且記錄著日本從奈良朝時期即存有的就癩事業，在最後寫到「皇室對於救癩事業的仁慈，歌頌皇太后的仁德廣大無邊，患者為感謝皇室的恩寵、而抱定將自己從社會隔離

<sup>29</sup> 他以澎湖為例，指出患者被隔離於小島，由家族每日送食物，直到患者死亡為止。又以新竹為例，若有癩患者死亡，家家折榕樹、插在門兩側，家中熄火、不炊煮、不吸煙。

<sup>30</sup> 日據時代，本院（樂生院）係受皇太后之命而設立，且以紀念之者，本院院長與總督同有帷幄上奏之權。（臺灣省立樂生療養院二十五週年特刊，1955: 7）

<sup>31</sup> 光明皇后為日本奈良時代的皇族，曾廣設澡堂，以便百姓洗浴和改善衛生習慣，並發願為一千位不方便沐浴的人民服務。第一千位是一位老人，而且全身潰爛惡臭，頭髮鬍鬚也都掉光了，這位老人對光明皇后開口說：「我的病已經很多年了，不論如何醫治都絲毫不見起色，而曾有一位醫生告訴我，只要有一位高貴良善的人願意為我吸出身上的膿血，就可以痊癒了」皇后聞言，便問：「這是真的嗎？你的病只要這樣做就可以痊癒嗎？」老人回答：「是的，如此一來我就能脫離病痛的折磨。」於是皇后便跪下，開始替這位老人吸出身腳上的膿血。相傳這名老人是藥師如來所化身的癩病患者。（wikipedia）[2009.05.31]

的使命感，並完成日本皇國徹底從癩病淨化的神聖使命（作者不詳，1931:1）。」樂生院的啟用典禮選在當時貞明皇太后壽誕當天。在空間上，以皇太后御歌碑以及各種御下賜品（楓樹、治療室、運動場），御歌碑上刻著皇太后所賜和歌：「我不能分身前去，諸位要代我安慰這些不幸的人們，要做他們的朋友。」種種論述與空間刻劃了當時皇太后仁慈與恩寵，將樂生院與皇太后作連結，反映一種與殖民母親情感依戀的想像。

Anderson (1998)研究殖民時期美屬菲律賓 Culion 癩病院。他認為，要理解美國的殖民計畫，必須先研究 Culion。為避免傳染擴張，Culion 院民被要求與過去的階級、社群切斷往來，同時患者除了接受醫學治療，被重新訓練公民責任，並透過簽署個人治療協定，院民被要求勤奮的工作、整理花園、玩銅管樂團、參與籃球隊、進行民主投票、管理自我，癩病本身被轉換成現代性、公民意識、公共利益的語彙，Culion 成為美國殖民政府的「公民權實驗室」，而院民成為規訓的殖民主體。因此機構計畫象徵整個菲律賓殖民地的前景，院民比院外被殖民者更早被招募進此一大型現代性計畫之中。如前所述，癩病被視為日本國族恥辱，因此，患者的身體除了被期待自然死亡外，成為日本「皇民」<sup>32</sup>則是樂生院民另一個使命，上川豐會在每月 25 日一大早帶著樂生院全體職員與患者，集合於「恩賜紀念運動場」，朝向東京皇居的方向、舉行遙拜式（上川豐，1939: 2-6）。1937 年在樂生院內建立「樂生神社」，並且成立樂生學園進行日式教育，以及成立樂生青年團，同年 12 月日軍順利占領南京，樂生院內舉行歡慶儀式。整套樂生療養院的設計，事實上是殖民權力藉由疾病人口的控制與規訓，不僅是對於身體生命的控制，同時藉由患者生活的改造，完成日帝國的慾望。但同時又必須

<sup>32</sup>日本在臺灣的皇民化運動開始於 1936 年 9 月，新任總督小林躋造（こばやし せいぞう）上任後，發表統治台灣三原則：「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

以愛、家庭、親族的語彙加以粉飾。

## 二、 國民政府與癩瘋病防治 (1945-1961)

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在衛生機構體制上作調整。首先將日殖時期的衛生行政權從警察署分離，重新歸屬於民政單位，衛生課改組為衛生局，隸屬於公署民政處，為全省最高衛生主管機關。儘管衛生與警察系統自此分屬於兩單位，兩系統仍相互緊密合作，依據「各縣市市容及環境衛生整理辦法」暨「各縣市衛生機關與警察機關辦理環境衛生工作聯繫辦法」中規定，環境衛生業務凡屬規劃及技術事務，由市衛生院所辦理；屬於督導執行及取締的事務，則由警察局所辦理。因此即便經歷改朝換代，警察系統仍為衛生政策的主要執行者。

同年12月10日臺灣省衛生局接收總督府樂生療養院，將其易名為臺灣省立樂生療養院。政權交替之時，爆發大規模流行疾病傳染<sup>33</sup>，省政府尚無心力整頓樂生療養院院務，《臺灣省立樂生療養院二十五週年特刊》中記載了當時樂生院景況：「迨四十二年底，院長一職，五易其人。此一時期，值兵燹之餘，經費支絀，物資奇缺，間以主官吏迭頻仍，院務漸趨廢弛。患者滋事，幾於無日無之(1955: 2)。」於此期間，癩瘋病治理處於空窗，院民脫逃者眾，1945年患者人數為442人，但至1947年卻僅剩255人。因此省政府於1948年要求衛生院進行癩瘋病患者調查，並於同年7月動用大批警力移送患者，「大規模移送癩瘋病患者的舉動較日本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為政府的癩瘋病防治工作留下了不良的印象。(劉集成，2004: 86)」。1949年，國民政府時期頒布《台灣省癩瘋病防制規則》，廢止總督府《癩豫防法》，但事實上，1949年政策上延續日殖時期癩病治理策略。新

---

<sup>33</sup> 爆發了肺結核、天花、鼠疫、霍亂等疫情。以霍亂為例，1946年共造成3809人感染，死亡2210人，死亡率達58.02% (: 57)。  
為

法中規定「醫師」、「鄰里長」、「警察」發現痲瘋病患者或痲風病嫌疑者時，必須通報「衛生主管機構」並進行強制收容，實乃日殖時期衛生警察—醫療—保甲制度之延續。

在治理思想上，可以看到 1952 年樂生院出版的文宣品指出：「此病之頑疲不易治療也，為免傳染危害人類健康起見，只有將所有痲瘋病人隔離起來（省立樂生療養院，1952）。」而在臺灣省立樂生療養院二十五週年特刊中提到：「國家設立本院之旨，消極在使患者得以收容，積極更在根絕此病，故我人工作，亦正向三大目標邁進，一、增進醫療效果，以期病患痊癒率之提高。二、加強患者輔導，以期其德性之不墜而謀生之有方。三、擴大研究與宣傳，並廣事搜求患者，以期預防根絕之成功。凡此三者，近之保人民之健康，遠之則謀民族之幸福，亦莫大於茲焉...。（臺灣省立樂生療養院二十五週年特刊，1955：43）」因此以民族幸福、個人健康為治理目標的國民政府時期，依舊通過強制隔離被視為頑疲之患的癩病患者，在身體上進行醫療、在德性上重新改造。

### 第三節 小結

在日本統治之下，臺灣很可能稱得上是全世界被調查的最詳細最完整的殖民地。每年有大量的統計數據、特殊的數字調查不斷地被編纂。....一直查到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再加進原先的知識之中。(Barclay, 1954:x)

Barclay 於 1954 年所出版的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in Taiwan* 書中指出日本殖民者無微不至、無所不包的調查工作。日殖時期科學調查幫助統治者輕鬆得掌握治理對象，如姚人多(2001)指出，這些地圖、人口統

計資料，幫助日本殖民者能以最小代價行使權力，殖民者只需要一支鉛筆、一張地圖，就能夠得到自己需要的資料，殖民者看著殖民地猶如看著自己手心一樣簡單，他並且下結論：「如果把個體建構成知識的客體是一個規訓權力的最佳象徵，那麼，無疑地日本人在臺灣所作得大大小小的科學調查，那一個面對知識威權無處可躲的臺灣人，絕對能符合一個規訓權力所具備的條件（姚人多，2001: 127)」。科學調查方法、警察—醫療—保甲制度的建立、醫療知識網絡的建立，幫助殖民威權能快速掌握並且深入臺灣社會的各個角落，評判受殖者為需要改造的細民。日殖時期以來癩病治理，一方面將權力具像化(embody)為可見(visible)中性化工具(例如統計數字與地圖)，同時又將權力有形的刻劃於實體空間、無形的以語彙與儀式刻蝕於患者的身體，這些治理術延續於光復時期，改變的由皇民化語彙轉變為國族富強語彙。

值得一提的是，總督府力期樂生院「使患者忘卻自己是病人，如同該院名稱一般，成為真正的遊樂園。(李維湘，1931，轉引自范燕秋，2005: 200)」，因此以設有收音機、留聲機及中國式撲克牌(麻將)、放映電影，另有養雞、養豬、耕作等休閒。但整個日殖時期，樂生院患者跨界事件頻仍。根據1940年《樂生院年報》統計，1930年底至1940年間，共收容1,189人，死亡占人數異動最大比例(305人，佔26%)，而逃走者則為第二順位(131人，佔11.02%)。透過院方保管的患者身分帳，我們更可從中得出端倪(王文基與王珮瑩，2009: 79-80)：

許○○，本島人(福建省籍)，男性。1937年5月12日入院(樂字62號)，時年21歲。原籍台南北門。...逃走的部分，1940年3次、1943年2次、1944年1945年各一次，共計6次之多....由最初1940年逃走時間近三日，期間減食三分之一....1944年更因逃走被判監近二十

日，減食三分之一七日。....最後於 1945 年 3 月 17 日逃走，之後下落不明。

陳葉氏〇〇，本島人(福建籍)，女性。1942 年 11 月 30 日入院(樂字 136 號)，時年 49 歲。原籍臺北下埤頭，夫為鍊瓦工廠搬運夫。陳葉本身未受過教育，生活並不寬裕。自入院以來，「一時歸鄉」7 次(1943 年 2 次、1944 年 2 次、1945 年 2 次、1948 年 1 次)，以及逃跑 3 次(1943 年 2 次、1944 年 1 次)，並曾因逃跑被處罰減食三分之一兩日與監禁二十日，減食三分之一七日等。陳葉氏最後於 1952 年因癩性衰竭死亡。

患者身分帳好似閻王生死簿，從患病日起至出院日止，期間發生了什麼事，就記上一筆；然則同時也反應了，外界的治理策略與計劃，雖然順利而緊密的運作，但在院內的治理上，卻不斷地出現裂縫，這部分將於第六章詳細探討。

## 第五章 城市治理術：發展的狂想曲

隨著 1980 年代新自由主義的崛起，以城市做為鎂光燈焦點所引發之相關辯論蓬勃發展，包含了生產、消費與治理等面向。其中，「都市治理 (urban governance)」文獻探討國家、區域與城市政府與市場之間的調節關係，是存在於不同尺度的政府、不同的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s)與市民團體的治理過程。為理解新莊城市治理結盟與治理術運作，首先，我回到城市的歷史脈絡，釐清造就「城市」的歷史情境以及背後各種治理力量，同時指出企業城市策略帶來何種新的治理思想，而城市的身分又如何影響都市政策的運用，特別臺北縣作為欲想成為全球城市 (Wannabe World City)，新莊市作為欲轉型的工業城市，是如何運用都市計畫、修辭、論述來行銷城市，以期在都市位階達成移動(mobility)。同時繼續梳理清楚地方政府與地方政治聯盟之間又呈現何種關聯，為此，我將焦點放在 1994 年捷運機廠選址爭議，以及 2007 年 3 月樂生保留面積爭議作為分析。

### 第一節 邊陲城市的歷史身分

#### 一、 邊陲台北的歷史

位於台北盆地外圍的台北縣，長期以來扮演著台北市腹地的角色。光復初期，台北市由於被作為戰時首都，在大量美援的建設基金下，開始興建道路、下水道等基層設施，並透過實施都市計畫將都市納入管理，逐漸奠定其都會核心的位置。當時的台北縣被當作首都防空疏散的腹地，在 1954 年省府頒布《台灣省防空疏散實施辦法》，1956 年開闢中興大橋，連接市區與三重，並透過軍眷村，向外安置外省移民。

1950 年代前後，國家的經濟政策推行進口替代政策，將重點放在扶植內需

為中心的民生與紡織工業，新設的工廠沿著當時的主要省道縱貫公路（也就是新莊中正路）、與台三線分布，集中於三重、板橋、新莊、樹林等地。紡織廠的設立，也同時帶動了當地機械製造業的發展。1950年代末由於國內市場狹小出現生產過剩，以及美援即將中止，亟需吸收外資，於是先是1959年制定《外國人投資條例》，又於次年通過《獎勵投資條例》，提供農地轉用、減稅的誘因發展本地工業，1962年又制定《技術合作條例》，鼓勵外資來台設廠，國家的經濟政策，正式由進口替代，轉向出口擴張與國際市場導向的經濟。這個時期台北縣以其豐沛的勞動力、既有的技術能力、與優良的區位條件，迅速成為當時台灣製造業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台北市外圍的新店、三重、板橋、中和一帶。1960年代起，製造業逐漸開始吸引大批中南部青壯的城鄉移民北上就業，並在1960年代中達到最高潮，形成台北縣社會組成的一大特徵。

1960年代台北市的實質建設更趨完備，在1967年升格為院轄市直屬於中央後，在行政層級、人事組織、與財政預算上，均明顯的凌駕於只是省級政府管轄下的台北縣，因而強化了台北市作為大台北都會區的核心地位。台北市與台北縣於都會區中的角色分工日趨明顯，台北縣主要作為製造業的中心，與廉價的城鄉移民住宅區；台北市則作為行政管理、消費、批發的中心。在台北市都市快速發展，一些不適用於都市中心的設施，陸續移至外圍的台北縣，凸顯出不具主體性的台北縣的邊緣性格，包括如土城看守所、新店明德監獄、土城彈藥庫等。雖然台北縣與台北市的關係卻日趨緊密，這種不對稱的行政層級，使得同屬於都會區的台北縣民的實質需求受到忽略。而台北縣層級較低的地方政府角色，導致台北縣的都市計劃、都市建設、都市管理、與社會福利，遠落後應被照顧的層次，造成本階段末都會區強烈的兩極化發展關係。

此外這個時期，為因應不穩定的國際市場需求，以彈性而有效的外包系統，

將整個生產流程，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中組成，遂成為台北縣製造業的生產特性，在地景上行伸出各類型工廠與非正式生產關係下的家庭代工或違章工廠。在違章工廠部分，原是集中在三重、板橋一帶，1969年三重與永和公告都市計劃禁建，大批的工廠外移至新莊、樹林一帶，1973年新莊、泰山都市計劃的發佈禁建，工廠又再外移至迴龍、鶯歌等地。經濟迅速發展下的台北縣生產單位，不僅流竄於都市計劃公告的工業區、住宅區，並在核心鄉鎮成長以後，向更外圍的鄉鎮蔓延。這些被認為是違章的工廠，一方面造就了台北縣混亂的都市景觀，與惡劣的居住環境，一方面也暴露了在都市經營方面，都市計劃形式化的管理方式，在台北縣較低的地方政府層級中，無法有效的控制都市成長，導致主要發展地區，實際居住人口遠超過計劃人口。

1980年代起，國家的經濟自由化政策，與新台幣的升值，大量的國內、外游資集結於都市地區尋求高利潤，使得具有投機性質的房地產交易更形活絡，經由交換過程獲取高利潤的資本積累方式，取代過去以製造生產為主的獲利途徑。同時產業內部面臨東南亞市場的興起、美國保護主義抬頭；台灣地區環保、勞工意識的高漲，加速製造業的資本轉向土地投機炒作。台北縣大型的製造業在此一轉變下，以遷廠或關廠的方式，將原工廠改建做高層工業廠房，或尋求變更為住宅區或商業區謀利；而新建的工業區，也在產業轉型的實質需求中，轉變為辦公、倉儲使用。另一方面，台北市實施嚴格的容積率管制，使得投機的房地產資本轉向尚未實施容積率的台北縣，導致土城、汐止、淡水一帶新建築大量的增加，過多的都市人口與活動，導致原已不足的都市服務更形不足。隨著公共建設的陸續完工，以往都會區的外圍地區（例如汐止、淡水等地）的成長趨勢則在近幾年明顯升高，這些連接台北縣市交通動線經過之處（例如：北二高、捷運系統）是近期重大公共建設設置的地區，在發展預期心理下，促使這些地區在近幾年內迅速

地開發起來，大量推出的房地產投資改變了原有的地景形貌，土地炒作問題以及都市服務設施不足的現象也逐漸顯現。隨著重大公共建設興建的影響，都會區人口分佈之空間結構因此產生了改變，而都會區整體影響範圍也隨之進一步向外擴大。這部分也將於下一小節詳細說明。

## 二、翻轉沒落：台北縣的重劃區與形象重塑工程

1980年代以降，由於其他低工資國家的競爭，工業城市面臨城市產業外移的命運，都市結構必須重組之命運，企圖擺脫邊陲特性，讓北縣翻轉頹圯之勢，其中以企業手法重新治理臺北縣的能手，莫過於2006年上任的台北縣長周錫瑋。臺北縣城鄉發展局於2009年5月提出「2030年未來城市計劃」文案中，首先以一張世界地圖，標示出39個世界級城市的分布，指出有6城市同時為排名前30名之貨櫃港，有18個為港口城市，有2個是鄰近外港的城市，強調著港口城市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優勢，並且指認台北縣的身分為「北台最大的港灣城市」。接著，他對比了雪梨、香港、紐約、東京等四個全球城市，指出臺北與其他城市的血緣臨近性，並強調「台北國際港灣=與世界接軌能力=城市競爭力」，於是，整個圖像再現中，呈現許多被化約的等式：雪梨+達令港=香港+維多利亞港=紐約+紐約港=東京+東京港=大台北都會+臺北港灣都心+IFR<sup>34</sup>。



34 I.F.R 為家庭綜合式休憩娛樂園區(Integrated Family Resort)，為適合家庭參與之博弈事業。

圖 5-1-2-1 臺北縣發展潛力與其他城市形象連結示意

資料來源：《臺北縣願景圖 2030city》簡報

周縣長以板橋都心、新莊副都心與臺北港灣都心等為 3 大都心，形成北縣中心軸線，以港口作為連結東亞經濟圈之節點，以臺北港灣都心地區、三鶯水岸地區、大新莊都心地區、大新板都心地區、大新店地區、坪林地區、金九地區作為七項策略地區，依其地區特性訂定發展重點<sup>35</sup>。這些都市大型旗艦開發計畫，成為近年來地方政府所端出之振興經濟的土地開發政策，透過論述行銷、形象鏡射，生產出猶如高級商場百貨般的旗艦計畫(flagship development)，成為象徵經濟在城市空間的極致表現，形構一幅幅都市奇觀(urban spectacular)景象。



圖 5-1-2-2 臺北縣七大策略地區

資料來源：《臺北縣願景圖 2030city》簡報

在開發模式方面，縣府以「超級浩市達 (SUPER HOPSCA) 計畫」的模式

<sup>35</sup> 七大策略地區定位如下：

- ◎ 臺北港灣都心地區—著重兼具遊憩、生活、產業功能之港灣設施之整備
- ◎ 三鶯水岸地區—著重歷史文化觀光之水文城市建設
- ◎ 大新莊都心地區—著重產業機能、親山親水遊憩機能
- ◎ 大新板都心地區—著重市區更新、藝文園區、行政中樞等機能
- ◎ 大新店地區—著重在觀光遊憩、交通運輸、城鄉發展之營造
- ◎ 坪林地區—低碳樂活村、生態河廊之鄉，打造北臺灣生態及鄉村旅遊基地
- ◎ 金九地區—形塑優質的深度文化旅遊城市又兼具河岸及海岸遊憩功能

資料來源：28 期城鄉發展月報

進行新莊副都心與新板特區行銷：「HOPSCA」各代表「H」：Hotel（國際飯店）加 High-density Transportation Systems（高運量運輸系統）；「O」：Office（金融商務中心）加 Odeum（音樂劇院）；「P」：Parking（停車空間）加 Park（市民公園）；「S」：Shopping（購物中心）加 Skywalk（空中通廊）加 Super Dome（巨蛋體育館）；「C」：Conference（國際展覽中心）加 Convention（國際會議中心）；「A」：Apartment（景觀住宅）加 Administration Center（行政管理中心），北縣努力朝向一級都市建設，並於2008年七月辦理國際招商說明會，吸引包括美國拉斯維加斯米高梅（MGM）、威尼斯人（The Venetian）、金沙集團來台參與。

2008年6月，周錫璋在接受理財周刊專刊報導中，喊出「台北縣將跳過台北市，直接躍居為國際級的大都會（2008: 26）」的口號，這樣的想像事實上以台北市做為競爭對手進行比較，顯示在國際舞台較高下的意味。同時他也指出「臺北縣土地成本約只有台北市的一半，因此房價相對便宜，加上現在交通比過去便利許多，越來越多人選則在台北縣購屋(27)」此語意謂在國內住房市場也與台北市競逐，企圖翻轉北縣為北市「藩屬」的形像。以特定城市為擬像的全球城市想像已經成為城市景觀塑造的重要論述形構，以新板特區為例，喊出台北縣曼哈頓的口號，並認為新板特區近十年的發展比信義計畫區過去30年更快，未來將超越信義計畫區；而淡海國際水岸都市將結合台北商港經貿中心與博弈事業的發展，以亞太拉斯維加斯作為想像；而新莊市中港大排計畫，則以南韓清溪川做為目標。以下我將以新莊副都心作為說明，指出城市的身分如何影響都市政策的運用。

### 三、新莊副都心：夢遊仙境(wonderland)般的全球城市擬像

新莊副都心區著重產業機能、親山親水遊憩機能，副都心意義為新莊副都

市中心地區，是台北縣僅次於板橋市新板橋火車站特定區的重要都市開發計畫，與板橋市相輔相成，形成跨越大漢溪兩岸的雙子城都市規劃。新莊副都心計畫區東至新莊思源路、南至中原路、北至中山路、西與新莊塭仔圳相銜接，占地 84 公頃，開發經費約 72 億元。新莊副都心的開發，為前縣長林豐正時期提出，主要為降低北縣民眾對於台北市中心商業區服務機能的依賴。新莊副都會中心市地重劃暨區段徵收開發區從民國 74 年就開始規劃，但期間由於 92 年前縣長尤清任內通盤檢討此案，因此副都心開發停滯。蘇貞昌在縣長任內則是提出「台北縣雙十旗艦」十年計畫，計畫將副都心打造成為台北縣的「曼哈頓」，並且與大漢溪對岸板橋新都心成為跨越大漢溪兩岸的「雙子城」，使新莊、泰山、五股形成共同生活圈所需的都市機能，降低對台北市的依賴，塑造成自主性都市機能的都會衛星城市<sup>36</sup>，但結至 2005 年底卸任，副都心仍未有任何動靜。不斷延宕的都市政策容易引起社會大眾的疑慮，台北縣長周錫瑋上任後，提出一套發展的論述 (discourses of development) 來正當化都市政策並為民眾的信心回溫，進而增強這個地區的房地產開發條件。理財週刊《周錫瑋要打造的六星級城市：中港大排+新莊副都心增溫房市》報導中：

周錫瑋說：未來的新莊，將會是 New Town、Natural Theme、Next Taipei，在我的計畫裡，New Town 就是以重要建設啟動整體開發新城鎮，而 Natural Theme 是以自然生態，形塑事宜居住的新都會，Next Taipei 的定義就更為簡單明確，我要以完善規劃打造國際等級新臺北。」在周錫瑋的規劃裡，是要透過新莊副都心的完整規劃帶動整個新莊地區舊工業型態的復甦，實現他打造新莊地區成為新臺北的六星級城市理想目標。

<sup>36</sup> [2003-10-31/聯合報/B1 版/北縣焦點]

作為國內二級城市的新莊，透過國內一級城市(新臺北)與國際城市(曼哈頓、韓國)的想像連帶作為行銷城市形象發想源頭。周錫瑋以「都會核心」的功能置換過往「工業區」功能，以英文詞彙(New Town、Natural Theme、Next Taipei) 作為新莊市的身份定位，強調與國際接軌的新認同。

大型旗艦計畫(flagship development)則是台北縣政府的另一施政重點。2006年6月15號台北縣城鄉局決定將與文建會合作設立「國家電影文化中心」<sup>37</sup>，2007年4月3號行政院決定將中央合署辦公室遷往副都心，藉由行政與文化機關的遷入帶動地產的開發。為了炒熱標售氣氛，縣府積極形塑優質新都心的意象，引進地標型建物創造新都心景觀，以巴比倫空中花園的概念來設計5.7公頃地標建築，規畫結合商辦、金融、休閒、會議展場等複合性功能的指標大樓，標舉整座城市特色主景。周圍環境則進行綠美化工程包括中港大排河廊改造工程儘速施工，台北縣長周錫瑋<sup>38</sup>欲將新莊中港大排整治為臺灣的「清溪川」，積極推動水質污染整治與水岸親水空間，並「以生命泉源再造為概念，將兩岸污水截流，引進乾淨水源，以復原生態空間，加以都市水岸營造、提供生物多樣性棲息，讓中港大排不只是水在流動，也是一條文化流動的溪，更期望在地居民及外地旅客都能感受到生活文化傳承。」並且北縣城鄉局長張邦熙<sup>39</sup>表示，新莊副都心與新板特區呈犄角相望，擁有「一高、二快、三捷運」的便捷交通是大利多。

大型開發計劃強調例如綠地、捷運、水岸、文化機構等地景元素，常成為房地產商所關注的話題，並且興建能引人目光的後現代建築，希望作為經濟的吸

<sup>37</sup>以「國家電影文化中心」為觸媒，整合新莊副都心商業區及新莊都市計畫北側農業區，整體規畫成為北台灣媒體及知識產業園區。【2006-05-26/聯合報/C2版/北縣要聞】

<sup>38</sup> [2008/12/14 中央社]

<sup>39</sup> [2008/10/10 聯合報]

鐵，以指標型建築物帶動心都會區的未來發展，牽引區域房地產價值，吸引人流與工作機會，同時拓展都市經濟，促使城市命運、形象與認同轉換。縣政府於 2008 年 10 月在新莊各公家機關放置《大河之縣、宜居之城/發展最快的縣轄市，在新莊》臺北縣政府「廣告單」寫著：「副都心整地已近尾聲，未來坐擁 1 高(中山高速公路)、2 快(中山高快速道路、特二號道路)、3 捷運(機廠線、環狀線、新莊線)，是潛力無窮的指標性地域。」

就空間的規劃與設計的特色來看，新莊副都心是新莊市最擬似西方城市中心商業區機能的區域，迥異於新莊老街綜橫交錯的小路、商店與廟宇，以及福營、新樹地區大街廓的鐵皮違建/工廠，它是新莊市被賦予全球化想像的區域。《大河之縣、宜居之城/發展最快的縣轄市，在新莊》文宣上，可以清楚看到全球城市空間想像：

〈新莊副都心：大臺北閃亮的巨星、六星級的國際城市〉

即便身處在四處矗立著高樓的新莊副都心，玻璃帷幕反射的日光因為林蔭而調皮地跳動，不可思議地是竟能聽到不遠處傳來的潺潺流水聲，捷運引來的人潮沒有造成塵囂，愉悅地快步健走是這地區工作或生活的人們的特色，轉角的 coffee shop，人來人往間滿是英雄與機會。

以玻璃帷幕摩天樓描繪全球城市形象，交錯著高品質居住元素不可或缺的林蔭綠地與親水空間，咖啡店象徵著一種雅痞的生活，而捷運象徵著速度與人群，於是城市的極致表徵與回歸自然的寓意，指設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與生活風格，行銷一種新的都市生活與美好的未來。透過文字的行銷，「新莊副都心」一詞映射出一個進步城市的想像，成為妝點過後的閃亮的巨星，從工業城市搖身一變成為六星級的國際城市。有趣的是，這段以往只出現於地產行銷廣告，

而今卻出現在台北縣政府政策宣傳摺頁上，台北縣政府不僅扮演著企業實體，以企業論述(discourse)行銷企業形象(images)以執行企業策略(strategy) (Jessop and Sum, 2000: 2289)，同時在地產行銷中扮演銷售員(salespeople)的角色，自個兒印製宣傳單推銷著手中的建案(城市)，並且，以都會華麗區(urban glamour zone)作為城市沙龍照，在《臺北縣願景圖 2030city》中(見圖 5-1-2-3)，以色彩斑斕的燈火點綴而成的燦爛夜景、以 LED 燈妝點的高聳參天摩天樓(skyscrapers)呈現新莊都心景觀，是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中洛杉磯式的未來城市鏡像，複製了我們想像中現代都市該有的外貌；而臺北縣城鄉發展局作為地產行銷商，為觀者(受治者)提供了從高空俯視而下的角度窺探新莊都心的未來，為受治者行銷一個可掌握、更美好的城市，使之在視界上成為能恣意掠奪夢遊仙境(wonderland)企業家，並且灌注關於發展的知識體、信念與看法。如果說日殖政府無微不至、無所不包的科學調查是為何幫助殖民治理者輕鬆掌握受治者，那麼 80 年代後企業城市主義下的都市治理術則是圖像化城市的美好讓市民們看似能夠掌握城市的未來，並以公共利益、營造市民新都市生活的符碼包裝都市旗艦計畫，企圖使市民成為渴望發展的新自由主義主體，使得地方政府成為有民意基礎而取得治理正當性。但最諷刺的莫過於目前副都心仍是一片荒蕪，縱使周錫瑋上任後在副都心地塊周邊圍籬漆上「新莊副都心 96.12 點石成金」標語，環繞新莊副都心重劃區周邊的圍籬，展現縣政府開發的決心以挑動民眾預期心理，但隨著開發時程一拖再拖，日期也被路過的民眾以新的噴漆塗蓋。

## 打造國際新都會—新莊副都心



圖 5-1-2-3 新莊副都心未來地景

資料來源：《臺北縣願景圖 2030city》簡報

### 第二節 1994 年捷運機廠選址

#### 一、前奏：地方派系的動員

捷運系統的點石成金早已經眾所周知，由各處房地產廣告，即使是在數公里之外，亦要強說捷運系統經過，這主要是由於上班族早已經將每天趕上下班視為畏途，這種意見傾向，自然影響和房地產商同樣敏感的民意代表，將爭取捷運系統視為爭取民眾支持的重要政見<sup>40</sup>。

1986 年 3 月，行政院核定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初期路網，包括紅、藍、桔、棕四線路段<sup>41</sup>，至於後續興建路網，行政院表示俟運輸走廊研究完成，籌建時機近於成熟時，另行擬定財務計畫實施。1988 年 8 月，台北市捷運局公佈信義線、南松山線、三重線為捷運後續興建路網<sup>42</sup>，於十一年後(1999 年)開工，消

<sup>40</sup> [1988-10-27/中國時報/第 30 版]

<sup>41</sup>紅線自新店到淡水，藍線自松山至板橋，桔線自中和至羅斯福路紅線段，棕線自木柵動物園至松山機廠 [1986-03-28/中央日報]。

<sup>42</sup> 信義線：由中正紀念堂經信義路至信義計畫區。南松山線：由西門站經塔城街，南京西、東路至南松山。三重線：由羅斯福路經松江路、民權東、西路以連通三重、新莊走廊[1988-08-26/

息一出，立刻引起台北縣民意代表針對時程、捷運選址表達強烈不滿。同年10月台北市捷運工程局邀集台北縣各級民意代表舉行座談，候選人無不「基於自身利益，所發言之內容無不代表選區為主<sup>43</sup>」，在場十六位與會代表針對開工日期、路線規劃大表不滿，洋洋灑灑提出十三項訴求，並表示將在近日內聯袂到行政院請願<sup>44</sup>。這場座談會為捷運爭奪戰揭開序幕，且愈演愈熾，並且引發「長期路網是否會演成有求必應的『大家樂』、亦或權力、利益妥協的『作地分贓』」的討論<sup>45</sup>。1988年10月22號中央日報指出：「『交通為建設之母』，大眾捷運系統更能『點石成金』，所經地區，房地產價格上漲，工商業更加繁榮，因此成為選舉時各候選人話題，目前台北市捷運局規畫台北縣都會區遠期路網時，引起中央至地方各級民意代表之高度「關切」，企圖成為自己選舉政治資源，使劃定路網政治意義提高不少。」文中並指出「部分民意代表為求自己土地增值，企圖以假民意求捷運」。

上述媒體報導，指出了「捷運」與「地方派系」間的關係，也可見捷運新莊線從後期路網制定之初即雀屏中選，然而新莊捷運線面臨多次停建。首先，1992年9月，臺北市捷運局表示由於新莊、蘆洲線捷運路線，與民間投資之機廠捷運路線重疊，且機廠捷運路線仍在交通部審議中，使得新莊、蘆洲線的規劃作業難

---

經濟日報/10版/貿易運輸交通]。經過民意代表抗議，將原先路線擴展至木柵、土城、蘆洲、內湖，並增加台北縣環狀線。[1988-10-19/經濟日報/10版/貿易運輸交通]

<sup>43</sup> [1988-10-22/中央日報/7版/大臺北都會]

<sup>44</sup> 十三項建議：(1)捷運局應隸屬行政院交通部。(2)地方負擔百分之四十經費，台北縣有困難。(3)捷運終點站，應超越人口稠密地區。(4)三重、新莊地連台北市，應列為初期工程計畫。(5)各條捷運路線，應同時開工，並縮短工程期。(6)整個工程經費，如地方政府無力負擔者，應該發行公債辦理。(7)外環連接系統，應計畫早日興建。(8)各終點站附近，應設置公立大型停車場，以便換車者停車。(9)工程用地及地上物補償，希望特別從優，減少阻力，以利工程進行。(10)松山到板橋線應延長至土城鄉。(11)三重、新莊線應延長至蘆洲、林口，並列入第二期計畫施工。(12)第一期工程南港至動物園段，應延長到深坑(僅兩公里)。(13)新莊再延長支線至三鶯地區。[1988-10-14/聯合報/13版/大台北新聞]

<sup>45</sup> [1988-10-27/中國時報/30版]

以推動<sup>46</sup>。同月，新莊地方民代針對新莊捷運線引發激烈討論，立委蔡勝邦、鄭余鎮等人抨擊捷運局規畫的路網「縮水」，北縣黃林玲玲議員針對新莊捷運線的問題提出質疑，她表示，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後續網路、包括三重、新莊、蘆洲等規劃遲未定案，甚至被懷疑已從路網圖中「消失」。同年11月，捷運局重新評估認為，「到了西元2021年，大台北都會區西部三重、新莊一帶，每日上午尖峰時間湧向市中心區的人潮，將高達每小時三萬六千人次，屆時對於大眾運輸工具的要求將甚為殷切。」因此將提前規劃興建捷運新莊線，並指出三重新莊線「由羅斯福路、杭州南路的中和線古亭站開始，沿杭州南路、金山南路、新生南路、松江路，在行天宮附近左轉民權西路上台北橋，穿越淡水河床到三重市，沿重新路、中正路至新莊輔仁大學止。」

隔年，新莊線由於諸多問題產生停滯。首先，是捷運機廠選址問題，在1993年6月公布的《新莊線及蘆洲支線走廊研究規劃報告書》中，臺北市捷運工程局原先將新莊機廠設在新莊輔仁大學旁，三和路與三泰路間的農業用地。但臺北縣政府認為「將該筆土地變更為機廠用地過於可惜，因此打算將這片土地變更為住宅用地，以增加土地利用價值<sup>47</sup>」。而輔仁大學校長李振英以及各學院院長，並以校方未來發展需要為由，反對捷運機廠在校區東側設置<sup>48</sup>。最後捷運局長賴世聲考量，塹仔圳農業區內非法違章工廠過多，已使未來用地取得和工廠補償問題複雜化，因此放棄原先輔大校區的捷運機廠<sup>49</sup>。其次，是經費停滯問題，新莊線被喻為全球最貴的捷運線，「將來經過三重新莊線的民眾，腳上踩的眼裡看得捷

---

<sup>46</sup> [1992-09-06/中國時報/14版]

<sup>47</sup> [1993-07-15/中國時報/14版/北市綜合新聞]

<sup>48</sup> [1993-08-31/中國時報/13版/台北縣焦點]

<sup>49</sup> 賴世聲表示，他沒想到北縣政竟容許那麼多違建工廠在農業區內違反土地分區使用，可見新莊違建工廠之嚴重。事實上，臺北市捷運工程局於《新莊線及蘆洲支線走廊研究規劃報告書》中即指出，新莊機廠「目前大部分為違章之一、二樓工業廠房，並有部份較大之違建興建中(1993: 173)」

運，每一公尺是用 800 萬元造成的，如果用黃金來換算，每一公尺造價約為黃金六百七十兩。」

然而，1994 年 3 月，新莊市長蔡家福發現行政院並未依承諾<sup>50</sup>，於 84 年度總預算草編中編列新莊捷運線，於是與三重市長陳景峻共同組成「捷運促進委員會」，凝聚兩地民眾及民代共識，邀縣長尤清、兩地市代以上民意代表、里長聯誼會會長，再採行動提出陳情。省議員簡盛義在會中表示，北縣板橋、新店、永和等捷運線均已相繼動工，而大漢溪以南的捷運線卻付之闕如，況且新莊、三重地區人口約一百萬，絕對需要有捷運線。三重市長陳景峻並且在會場大力鼓吹「超越黨派」、「匯集民氣」逐步向行政院、交通部等相關單位施壓，直到三重、新莊捷運線納入下年度預算為止。縣議員葉正森、許炳崑、新莊里長聯誼會主席陳金獅等人亦相繼發言鼓吹地方民眾團結。新莊市代表會副主席陳振宗則表示，以往新莊地區民眾對於應有的權益爭取，手段都太溫和，造成政府官員愛理不理。所以這次行動絕對不能太溫和，一定要有具體表現才可以回家，以免浪費大家的心力和體力。縣議員葉正森則表示這次抗爭行動人數不能太少，至少兩里要有一部遊覽車人數，如果不夠要鼓勵大家都參加<sup>51</sup>。同年 3 月 24 號，新莊三重地區共動員了 2000 人至立法院請願，北縣選出的十六位立委有十一位到場聲援，媒體以「國民黨、民進黨立委『大團結』」來形容此次的請願活動<sup>52</sup>。面對台北縣地方民眾及民意代表強烈要求，1994 年 4 月交通部與行政院及台北市捷運局協商後決定，三重新莊線捷運工程將提前到明年七月底以前正式動工<sup>53</sup>。

<sup>50</sup>交通部及台北市捷運局於 1993 年允諾八十四年度將新莊、三重捷運線編入預算，並於八十三年底動工興建。

<sup>51</sup> [1994-03-09/中國時報/14 版/台北縣新聞]、[1994-03-24/中時晚報]、[1994-03-24/中國時報]

<sup>52</sup> [1994-03-26/中國時報]

<sup>53</sup> [1994-04-02/中國時報]

自上述報導，可以看到「土地」、「交通」與「治理政策」之間緊密的關聯。首先，看見「交通建設」會使「土地價值發生改變」，以捷運為例，沿線經過地方將使地價上漲；而捷運機廠屬於鄰避地，卻會使得地價下跌；「大學」則是另一房地產利基，而「省立樂生療養院」在地權上屬於公營機關，為患者個人利益，且為癩病患者個人利益，也因此當面臨捷運，屬乎公共利益建設，在「少數服從多數的思維中」，社會少數即被犧牲。而地方派系如同房地產商對於地價甚為敏感<sup>54</sup>，以客觀數字(新莊三重地區人口數)作為依據，以公共利益作為糖衣包裹，利用行政機器進行地方動員，並且從中訴諸「新莊團結」，以捍衛自身政治利益。

## 二、捷運機廠選址的結盟與鬥爭

### 1. 工程理性的選址過程(Technical rationality)

1993年8月捷運局與輔大協調，新莊市長蔡家福建議「新莊捷運線暨已延伸至二省道和龍安路口，不妨將機廠遷至省立樂生療養院現址」。在評估後，捷運局決定將機廠搬遷於此：

捷運局也認為這塊土地廣達二十九公頃多，人口少，取得簡單，是新建新莊機廠的好地點，交通部也表示本案實行度很高，只是目前所遭遇到最大的困擾是五百多位麻瘋病患該如何安置的問題<sup>55</sup>。(底線為作者標註)

從捷運局觀點中呈現著公共建設選址要點在於「簡單」，透過「工作效率」決定

---

<sup>54</sup> 甚至本身即為房地產商，蔡家福1980年創立家福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家欣建設」、「元福建設」。

<sup>55</sup> [1994-04-24/中時晚報]

選址。因此位於輔仁大學旁私有土地，經評估後「時間」（徵收時間）、「成本」（賠償費用）不符合效益，則將線路延伸至面積大、同時屬於公有地的省立樂生療養院即雀屏中選。在報導中，患者不具有發聲權力，被視為決策定案後需被處理的後續「問題」，「非人化」的處理使其連「權益關係人」（stakeholder）的資格都不是。

捷運工程局第一處處長毛淞鶴表示，選擇該地區是基於幾點考慮，第一、為避免都市計劃變更，土地取得不易，利用省府公有地是達到快速動工的要件，第二、新莊後港地區的人口愈來愈多，需要捷運再延長至後港區，第三、新莊的斷層帶仍在研究當中，捷運機廠建在地面上，並利用彈性耐震設計可以克服技術上的困難，第四、樂生療養院有改建計劃，捷運局可以配合其改建施工，第五，目前計劃只用到樂生療養院二十公頃，另留十一公頃的部分，樂生療養院還可充分利用。連續兩任擔任市長秘書的尤俊德表示：「新莊人口最稠密並不在老街一帶，而是在福營一帶(佔新莊人口 2/3)，因此計畫將捷運機廠設在樂生院(本來在輔大，但尤說輔大應配合發展成新莊文教區，不是合設捷運機廠)，希望捷運連接迴龍、新莊市、樹林鎮、龜山鄉，以後捷運將從三重、新莊一路通往桃園中正機廠，帶動整條商圈<sup>56</sup>。」

## 2. 捷運局與省衛生處、樂生療養院的結盟：利益交換

1993年4月22號，省衛生處承辦官員對於樂生療養院作為捷運機廠表示：「如果捷運局真的要把機廠在此地，最好的規劃就是全部收購樂生療養院土地，讓院方有搬遷重新興建的機會。<sup>57</sup>」「省衛生處原則同意出讓，唯條件是捷運局

<sup>56</sup> 樂生新莊田野小組田野筆記

<sup>57</sup> [1994-04-22/中時晚報]

務必要以市價全部辦理征收<sup>58</sup>」而院方人員指出，「樂生療養院因位處黃金地帶，地方要求遷移之聲四起，給省府主管人員帶來極大壓力。院方也因鑑於此，有提出遷移計劃，地點則選擇台中玉里。但因療養院所收容的五百多位病患都是痲瘋病患，只要一提興建療養院，當地民眾都會提出強烈反對意見，使得遷移計劃一再延遲，迄今還沒有得到任何結論。」

事實上，這並非樂生療養院第一次遭逢在地居民反彈抗爭，1986年7月衛生署選定樂生療養院作為收容慢性休養期間「愛死」病患場所，立委謝美惠希望有關單位終止此一計畫，而在地民眾及民意代表聞悉後，莫不感到恐慌：「以往為了痲瘋病院設在新莊，已給市民帶來內心許多不愉快，曾譏諷過去的市長為痲瘋市長，如今又多了愛死病院，民眾希望徐六郎市長不要作「AIDS」市長」<sup>59</sup>。1989年9月22日，新莊市民代表呂金棟率領市民一百餘人到樂生療養院抗議，遞送抗議書<sup>60</sup>。1992年11月，省衛生處計畫將慢性病防治中心遷至新莊樂生療養院現址，卻遇到在地民眾反彈，雙鳳里里長表示里民不歡迎慢性病防治中心，建立將樂生院現址設立為醫院或老人安養中心等社福機構，對地方百姓才有幫助<sup>61</sup>。因此療養院的態度是希望原地重建，捷運運用其中20公頃，而剩下的11公頃由樂生療養院使用。5月19日省政府衛生處仍堅持，捷運局若欲購買樂生療養院原址，就要三十一公頃全數購買，不要只劃分捷運要用的二十公頃，不採購其餘十一公頃的山坡地。因此，捷運局估計若要全數採購，需增加九億的經費，但是對於價格問題，省府衛生處已由堅持市價收購，轉而贊同公告現值收購<sup>62</sup>。

---

<sup>58</sup> [1994-04-24/中時晚報]

<sup>59</sup> [1987-2-4/中央日報]

<sup>60</sup> [1989-09-22/中國時報]

<sup>61</sup> [1992-11-28/中國時報/13版/台北縣焦點]

<sup>62</sup> [1994-05-19/中時時報]

同年7月，捷運局與樂生療養院達成共識，由捷運局在機廠北側興建新房舍，則院區土地將無償撥作捷運使用，但究竟是先取得用地進行工程，還是建好新院再拆遷則仍未有共識<sup>63</sup>。10月22日，省衛生處和捷運局有「默契」，若該院無償提供部分土地，那麼捷運局可為其興建一現代化醫療大樓，雙方並朝此目標努力<sup>64</sup>。從上述事件發展時間軸可覺察出「政權」結盟的端倪，捷運局與省衛生處從利益相異至利益相同而結盟的過程。

### 3. 發展與癩瘋病的恐懼 (development& fear of leper)：

將機廠遷至省立樂生療養院的規劃，受到多方的認可，原先「尤縣長在研議把新莊機廠設在塭仔圳都市計畫變更區域內土地受挫之後，也堅決支持把機廠改設於此，完全符合新莊地方民眾的期望<sup>65</sup>。」當機廠確定定址於樂生療養院後，引發另一波地方民意代表要求樂生搬遷的聲浪。1994年10月1號，新莊市長蔡家福在市政簡報中，明列十五項地方急迫需要建設的重大方案，其中包括「省府為配合捷運機廠的興建應遷走樂生療養院」<sup>66</sup>。1994年10月20號，為協調捷運新莊線機廠用地徵收事宜，捷運局、機廠預定地內的樂生療養院與居民等相關人員進行協調會，與會者相當激動，表示有「機廠」，就沒有「癩瘋病院」，最後將代表樂生出席的秘書楊劍石趕走<sup>67</sup>，並與新莊市富國、裕民、合鳳、龍鳳、丹鳳及樹林鎮三多、三興、三福、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等九個村里民代表組成「促進發展會」，反對樂生療養院留在迴龍地區的行動，並將抗爭第一站選在樂生療養院址。發起串連的新莊雙鳳里里長陳專森指出<sup>68</sup>：

<sup>63</sup> [1994-07-20/中時時報]、[1994-08-23/中時時報]

<sup>64</sup> [1994-10-22/中國時報]

<sup>65</sup> [1994-04-24/中時晚報]

<sup>66</sup> [1994-10-01/中時晚報]

<sup>67</sup> [1994-10-21/中國時報]

<sup>68</sup> [1994-10-22/中時晚報]

新莊、樹林、桃園龜山三地交界地帶之所以無法快速發展，完全是深受樂生療養院不遷移的影響，地方居民在忍受近二、三十年後，決定以行動來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樂生療養院之所以不受民眾歡迎，主要原因是，它專收容患有傳染性的癲瘋病患。一般民眾，只要知道這項消息，都不願搬到此地居住。...近來捷運系統新莊線規劃路線，經地方各界長時間爭取，終於可以延伸到此地區，但樂生療養院卻硬是不搬走。地方居民擔心，如此一來，院方對病患管理一旦有所疏忽，讓病患任意搭車亂跑，豈不容易讓疫情擴大蔓延，萬一消息傳出，丹鳳捷運站變成癲瘋，不僅對社會大眾都不好，連地方居民也都會受連累。\_(底線為作者標註)

里長是治理體系中民眾的代言人，其發言位置往往代表並且影響地方民意。上述語境反映了廢除隔離三十年後，民眾對於癲瘋病的恐懼心理仍根深蒂固，也讓里長得以用對於癲瘋病的恐懼與對於發展的欲望來策動樂生搬遷。另一個現象是，在決策過程中隱形(invisible)的樂生院民，卻於抗爭衝突時有機會現形(visible)，10月20號中國時報報導指出：

院民們表示，如果要強逼療養院遷移，他們絕對會抗爭到底.....若政府決定強逼他們走，也要誓死抗爭到底。<sup>69</sup>

而媒體輿論上也開始支持院民，甚至回過頭批評村里長政治動員的暴力，10月27號中國時報《衡情論理》專欄寫到：

為了捷運，為了地方建設發展，桃園縣、台北縣三鄉鎮市九村里民共

---

<sup>69</sup> [1994-10-24/中時晚報]

同逼迫療養院遷讓土地，不答應則將圍院抗爭。台灣社會人情澆薄，於茲可證。而癩瘋病人見人怕，遷院談何容易，毀了樂生，何處是患者的淨土？<sup>70</sup>（底線為作者標註）

在捷運機廠選址樂生療養院過程，從未徵詢樂生院民對此方案的看法，他們的聲音在媒體報導中也從未被再現，暗示著院民在決策過程中被評斷連作為利害關係人都不夠格(unqualified)。諷刺的是，院民的第一次現形，卻是在被形塑為他者之後，才在人道主義的同情下，具有發言的空間。但媒體一方面以道德者的姿態呼籲社區民眾，卻是複製了癩瘋病恐懼形象，且未報導院民真正的續住需求。更有趣的是，樂生療養院院方與省衛生處對於抗爭事件的回應：

院方一位高級官員今天上午卻明確表示，院民反映情緒愈來愈激烈，未來一旦里民們採取激烈抗議行動，院民們是否會堅持反制，集體走上街頭，爭取自己應有權益，而院方是否還能繼續阻止，實在沒有絕對的把握。但為求和諧，希望山下里民不要給予太多激烈，以免演變到無可收拾的地步<sup>71</sup>。（底線為作者標註）

省衛生處強調，如果三地的村里民眾，一直逼迫樂生，使病患恐慌，院方也不能保證病患會不會激憤下山去找民眾理論，到時真有「傳染」的情況發生，將是一大憾事。<sup>72</sup>（底線為作者標註）

作為漢生病醫療主管機關的省政府衛生處，在面對地方人士強烈的發展欲望時，巧妙的回收癩瘋病的恐懼 (recycle the fear of leper)，反過頭將癩病拉至傳染的

<sup>70</sup> [1994-10-27/中國時報]

<sup>71</sup> [1994-10-24/中時晚報]

<sup>72</sup> [1994-10-25/中國時報]

語境，企圖以反醫學論述(anti-medical discourse)說服附近居民停止抗爭，透過這種回收再利用的方式行使治理。樂生療養院院方儘是漢生病患者管理者，而非為其發聲者，而院民則是火爆無法控制的人。整場地方民代抗爭，在市長的指示下結束<sup>73</sup>：

市長蔡家福表示，...如果強迫樂生的癲瘋病患遷移，一定會引起大力的反抗，反抗後要協調，明年七月開出的捷運新莊線動工支票，將可預見會延期，反而對地方的進步是一個阻礙，因此，市方研擬同意興建醫藥大樓，收容這些慢性病患。（底線為作者標註）

整場事件的開始與落幕皆由蔡市長所發起，然而對於樂生院的判斷卻仍是以地方發展作為考量。國家治理時期癲病隔離措施，在社會、心理距離上所分化的二元疆界，40年後被收編(incorporate)進入城市治理術，教導著市民樂生療養院等同於不乾淨、不進步的符號成為阻礙發展的元凶，深化附近居民對疾病(癲瘋病)、空間(樂生院)、病體(樂生院民)的認識。

### 三、保存運動後：地方再結盟

我將以2007年1月至2007年5月樂生保存爭議新聞事件為例，從中指出不同治理單位在面對樂生保留爭議時採取的策略、協商與政治結盟，如何在保留運動催逼下促使原初的治理術進行轉型。樂生保存方案最早溯及2002年7月，立委羅文嘉針對樂生保存問題，召開「樂生療養院保存緊急協調會」，捷運局、台北縣政府隨後開會研商，決議以拆遷重組、異地保存的方式保留較具價值的七星舍、行政大樓，規畫做為文獻資料館，文建會回函表示「尊重本府(指縣府)之

---

<sup>73</sup> [1994-11-15/中國時報]

決定」<sup>74</sup>。2005年11月1日新版文化資產保存法頒布，行政院文建會於2005年12月13日將樂生療養院訂為暫定古蹟。立委蔡家福、前新莊市長黃林玲玲、現任市長許炳崑抨擊文建會越俎代庖，無視三重、新莊、蘆洲百萬市民權益，串連不分黨派的新莊籍立委、縣議員及市代會、調解會、里長聯誼會主席共組「新莊捷運自救會」，並於24日率70餘人要求台北縣長周錫瑋重視捷運延宕實情<sup>75</sup>，蔡家福表示：「樂生院所在地為捷運重要設施，想要變更設計幾乎是不可能，而新莊捷運線幾乎已經快要完工，卻因此導致工程勢必延宕完工日遙遙無期<sup>76</sup>。而2005年12月29日，臺北市捷運工程局也以罕見大動作發出新聞稿，捷運局長常岐德於文中痛斥「行政院文建會沒有魄力、也無擔當，新莊機廠在13年前，便由行政院公告定案在樂生療養院現址，現在中央一遇到文化人士抗議就退縮拖延，坐視200萬大台北民眾行的權益遭延誤。<sup>77</sup>」。地方民意代表的策動下，促使台北縣政府與台北市捷運局共同研擬保留院區40%之方案，形成地方民代—地方政府—技術官署達成「三角結盟」，2006年，3月23日，北縣府召開樂生保留協調會，會中邀及樂生保留團體與新莊地方民代，周錫瑋在決議中表示：「生米已經快要煮成熟飯了，想要全區保留樂生是不可能的；他沒辦法滿足所有的人，所以樂生(保留團體)必須妥協。」。「錯失先機」、「生米煮成熟飯」為這個時期三角結盟的共通論述，旨在指責保留團體遲至工程進行後才開始為保留奔走，並將捷運延宕的過錯藉由指認敵人(naming the enemy)的手法過繼給保留運動團體。

由於40%方案施工期間院民必須要搬到新大樓直至101年底(五年後)才能

<sup>74</sup> [2005-12-24/中國時報/C2版/北縣新聞]、[2005-12-16/聯合報/C1版/北縣·文教]

<sup>75</sup> [2005-12-24/聯合報/C2版/北縣要聞]

<sup>76</sup> [2005-12-15/中國時報/C2版/北縣新聞]

<sup>77</sup> [2005-12-29/聯合報/C5版/大台北]

回到原居住空間，因而樂生保留團體認為此方案形同迫遷而無法認同。2006年8月，文建會簽約委託「欣陸工程顧問公司」評估全區保留的方案，積極尋求「以工程解套」方式解決樂生爭議。2007年1月，文建會召開「新莊樂生療養院保存方案工程技術評估審查暨說明會」，決議將建議行政院保留90%以上的樂生院區與20棟建物，並明確表示樂生院90%保留方案的工程技術可行，可大幅增加樂生院區建物保存，且僅需延長工期4個月與增加2.9億的工程費用。同年3月3號，行政院回文否決提案並指定依據台北縣提出的40%方案而未加以說明解釋，於是保留團體展開一連串行動抗爭。3月8號，青年樂生聯盟與樂生保留自救會於當時行政院長蘇貞昌官邸前靜坐，蘇貞昌以「重大建設必有犧牲」作為回應，而樂生療養院聖威廉天主堂谷寒松神父於3月14日提出看法：「本人知道院內、外的人士，整體而言覺得少部分的院民缺乏感恩的心靈，自從建立樂生以來政府和院方是如此的照顧他們，但他們卻沒有心存感謝。希望抗爭的院民不僅想到自己的自由與權益，也應關懷大眾的權益，不要只看到自己的權利，也要重視大眾的權利」。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意識在官方論述中一覽無遺，有趣的是基督教信仰在日殖時期一直扮演國家癩病治理重要思想與執行單位，而今天主教中的「感恩」、「犧牲」意識也成為治理所灌輸的核心思想。

從都市政治層級檢示此時期都市治理目標，無疑的是以「捷運興建」優先，「興建」涉及了「取得土地」與「清除地上物」，也因此削弱保留運動正當性則成為此時期首要都市治理技術。圖 5-3-1 為台北縣政府於蘋果日報所刊登之《兼顧情理法 創造三贏》廣告，並在文末「籲請大家讓政府依法行政」。文中重點有幾項重點：(1)強調創造三贏：以40%方案證明北縣府已達成「樂生院保留」、以醫療大樓證明北縣府已達成「院民照顧」、以五年來車禍死亡人數證明新莊需

要捷運，因此縱使廣告主標題為「兼顧情理法 創造三贏」，北縣的用意事實上為小標「推動新莊捷運 台北縣政府立場堅定」(2) 強調時機以過：新莊捷運已經推動 16 年，捷運開工才搶救樂生時機已經過了，指出資本主義不容許延遲的特性，更暗示 Harvey 所言進行「破壞」才可能有所「創造」(3)強調舊院舍的破敗：文章以四幅圖像作對比，強調現代醫療空間，以新式大樓、人工草坪、步道池塘造景強調整齊明亮的現代建築，對比拍攝角度無法清楚看見建築外觀的舊院舍，且取景鏡頭皆以堆放物品的空間作為殘破失修、採光不佳的例證，強化「破壞」的正當性。



圖 5-3-1 台北縣政府《兼顧情理法 創造三贏》廣告  
資料來源：[2007-03-17/蘋果日報]

此外，2007年3月31日新莊「拼捷運求生存」遊行的現場，新莊市長許炳崑喊著：

拼捷運（群眾：求生存）拼捷運（群眾：求生存）

縣長（群眾：加油）縣長（群眾：加油）

捷運局（群眾：加油）捷運局（群眾：加油）

新莊人（加油）新莊人（加油）

今天要選縣長的所有候選人，請妳們聽聽我們新莊人的心聲，我們會好好照顧我們的樂生院民對不對（群眾：對）。但是我們也希望讓捷運不要再拖延了對不對（群眾：對）。我們可以同時把這兩件事情做好，我們要有信心對不對（群眾：對）。我們必須要顧到全盤，我們不能只看一點，我們今天，不分任何黨派，所有的立委尬爛市長、三重新莊的市長和鄉親都站出來，我們不是做抗議，我們是來拜託，來跪求大家，來救新莊人一條生路好嗎？（群眾：好）

自1994年起，幾場拼捷運的政治動員，不約而同以「新莊團結」作為訴求，企圖以地域認同凝聚個人，並且認同地域等同於認同地域「發展」（或作「地方發展」），又將發展等同於成長機器式的房地產發展，教導市民「我需要捷運才能生存，新莊才會發展」。而樂生院民阿添伯對331遊行的看法，一針見血的搓破了企業城市治理的邏輯：「聽你在唬爛啦！沒有捷運就不能生存嗎？以前也沒有捷運不也活下來了？<sup>78</sup>」

遊行當天，聽到不同新莊民意代表在宣傳車上吶喊：「四月十六號，不可能

---

<sup>78</sup> 20090331 田野筆記

再改變了。新莊市民，不能再等了，大家說對不對，因為全台北縣只有新莊三重蘆洲的捷運，是尚晚動工，總是新莊人尚可憐。」一如 Escobar 談「貧窮的發明」的概念，新莊被再現為可憐、貧窮、需要發展、需要捷運的主體，來合法化政權治理。另一位里長談到「等下若是遇到苔疣，見一個打一個好嗎？」符合了 Iris Young 所言「優勢文化定義一些群體為他者，藉由一些身體特徵定義他們，將他們的身體建構成醜陋、汙穢、淫猥、骯髒與病態」，並且藉由概括化他者的概念，抹除他者人性的部分來確立自我的社會位置（人/非人），因此新莊民代在語言(language)使用「苔疣」指稱而非視其為「樂生院民（人）」。

####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指出台北縣政府不僅扮演著企業實體，以企業論述(discourse)行銷企業形象(images)以執行企業策略(strategy) (Jessop and Sum, 2000: 2289)，同時在地產行銷中扮演銷售員(salespeople)的角色，自個兒印製宣傳單推銷著手中的建案(城市)，以城市意象重塑與大型旗艦計畫欲使新莊市從「工業城市」，脫胎成為「六星級城市」。在企業城市理論暗藏著國家已空洞化(hollow-out)的假設，然而「國家」在本文脈絡中仍以一種卓越而獨特的形式運作權力，本章指出 1994 年新莊捷運選址過程，地方民代通過疾病潔淨觀來操作居民希望樂生拆除、支持市政計畫，並將疾病恐懼再次收編，並且將迴龍地區指認為都市邊陲地區，這種混雜的恐懼乃城市治理與歷史洪流中流竄的現代性血液交融，以趕走「苔疣病院」做為此階段地方動員之號召，地方政府通過國家治理遺毒達成都市治理。以 2007 年 3 月樂生保留面積爭議為例中，新自由主義治理術不僅驅動發展的欲望(捷運與大型都市計畫)，並且在(臺北)縣(新莊)市政府行銷閃亮市政計畫的同時，以「新莊團結」作為訴求，企圖以地域認同凝聚個

人，並且認同地域等同於認同地域「發展」(或作「地方發展」)，來創造在地人的「社會輿論(共識)」，製造出新莊與樂生的二元對立。



## 第六章 治理術與日常生活實踐

上一章我梳理城市歷史，揭櫫在新自由主義洪流下處在城市體系邊陲的城市如何運用企業城市治理方法，以誇大浮華的詞藻推銷城市旗艦計劃。接續「新莊/迴龍市民反對樂生保存」的命題，本章將梳理治理與日常生活的關聯。為此，本章將分成四個部分：首先，我以樂生院民與迴龍居民訪談，探討國家癩病治理術如何在日常生活尺度中刻劃出「有病/健康」；接著，我以樂生院民、迴龍居民的跨界日常生活實踐指出治理術在某些情境下產生失靈(malfunction)；第三部分，我延續第五章的討論，指出新一波城市治理術運作下產生新自由主義主體(subjection)，在日常生活中產生「發展/落後」、「有用/無用」之二元分類。最後，我將文脈拉到保存運動，重新以治理、治理術理論重新書寫保存運動之新莊社區工作，並以反身性書寫重新理解這段經驗。

### 第一節 日常生活的劃界與跨界

#### 一、1962 年後的日常生活劃界

##### 1. 劃界運作(boundary works)

你說五十一年癩瘋就不可怕還是這樣在處理，醫院也是驚到要死，拿一個藥，院內拿藥碰(高聲調)一碰(高聲調)一，用鑷子夾藥單，我們給醫生開的藥單拿過去，他用鑷子夾阿，沒幾年前還是這樣呢。

(阿英姨，20090331)

本文第四章從國家治理角度剖析從日殖時期至國民政府時期癩病治理術的轉變，從思想、策略與技術等層次探討，本小節延續先前文脈並將焦點放在人民

日常生活，企圖理解治理術與日常生活的關聯。日殖時期，樂生療養院與迴龍地區以鐵絲網、木樁作為院內與院外的空間隔離，院內則區分為有菌與無菌區，在行政醫療大樓進出有菌、無菌區域必須換上隔離衣並且通過消毒水，在患者進入通道的有菌、無菌區域交界處則有日本警察從中進行監視，在樂生院大門則有另一站哨。國民政府時期由警察轉為憲兵站哨，有菌與無菌區的設置延伸至樂生院基督教堂的空間配置，1951年樂生院聖望教會落成，外面的人(包含迴龍居民與樂生院職員及職員後代)與證道牧師同坐在講台，從教會前門進出；臺上臺下之間以木柵欄相隔，後面坐樂生院患者，從教會後方的門進入，這不禁讓1964年(民國53年)入院的阿英姨回想起這樣的安排：「我們來的時候，還有分外口人作臺仔上，我們患者坐臺仔下，外口人很多人，我們來還好幾年，分臺上、臺下，中間就是木柴欄杆阿，阿一個門開阿，從臺仔上的門進去。外口人坐牧師身邊阿。」不禁感嘆「外口人比他們更接近上帝<sup>79</sup>」。

事實上在1952年特效藥出現後至廢除隔離的年代，分界雖然依舊但臨界的健康者不再需要全副整裝，而樂生/迴龍間的界線也從門口退縮移至院內，當時行政大樓前、院內哨站以下的空間已非正式地准許附近居民進入<sup>80</sup>，但患者房舍區域仍不開放民眾進入。根據迴龍褚先生的回憶：

(樂生院內空間)分兩個區，隔離區不能上去，地下是一般不會傳染的，設施完善，裡面有籃球場有些設施在裡面，一般人可以進去。院區和宿舍區中間有條路，社區的人就可以從那條路經過。...正門進去往宿舍有條路，一般民眾可以經過，院區裡有分隔區，不希望一般人上

---

<sup>79</sup> 20090331 金英阿姨訪談田野筆記

<sup>80</sup> 20090505 田野筆記

去 (褚先生, 20080426)<sup>81</sup>。

教會空間配置外是其中一例，另一例是院民育樂空間中山堂。民國40年左右，有位過去擔任歌仔戲花旦的院民住院，她看到樂生院沒什麼娛樂，因此找了幾位五官端正的院民共組歌仔戲，據院民與居民回憶，當年只要樂生公演，附近居民都會競相捧場，並指名一定要由那位花旦演出，當時「十幾個人在學，他們都在房間裡頭排練，戲服有兩三箱還有鑼鼓，那時候最紅的一齣叫唐僧取經(鄭伯伯, 20090315)」。當時作戲是在院內中山堂，看戲時舞臺中間會拉起一條線，樂生院民坐一側，迴龍居民與職員坐一邊，要不就是外面的人與職員坐樓上、院民坐樓下。有趣的是，《臺灣省立樂生療養院二十五週年特刊》附錄近十年來院務紀要中，記載著，民國四十三年七月二日，呈請省衛生處行文有關機關通飭各警察局所及鄉鎮公所，勸阻本院附近居民攜帶兒童入院觀戲，可見當時附近居民攜家帶眷、扶老攜幼至樂生院觀戲盛況空前的場景。但樂生歌仔戲團公演幾次，卻因當家花旦發瘋而停止演出，但戲班表演並未因此停止。由於1949年(民國38年)頒布台灣省癲瘋病防制規則，政策上延續日治時期強制隔離政策，使得樂生療養院人口逐年增加並成為新莊地區人口密集地之一，因而使得樂生療養院中山堂成為丹鳳、迴龍、新莊地區戲班爭相競演之地，「(樂生戲班停演後)就是我們外面的人去演他們看，那時候就是會拼戲，就是像我們外面十八分、丹鳳那邊，跟我們這邊(指迴龍地區)，看誰作比較久(江清萬, 20090328)」。

1962年政府頒布臺灣省癲病(癲瘋)防治規則正式廢除強制隔離，但社會排除並未改變，科學突破並未改變人們對與癲病患者的身體與心理距離。首先，院民雖能在院內活動，院內醫護人員「對癲瘋病仍然相當恐懼，護士規定要穿長

81

筒膠鞋，穿戴手套，整個臉都罩起來，只露出兩隻眼睛。(翁台生，1980: 55)」。

事實上直到 2001 年，樂生院醫護人員依舊穿著防護衣式的隔離裝，所有工作人員是從頭包到腳，就像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一樣，尤其照顧病患的時候(行政院衛生署，2008: 109)。院內醫護人員不敢碰觸患者碰觸過的物品(看診單)、門把、與長椅，彷彿院民碰觸過的物品即為「有菌」，彷彿痲瘋桿菌會隨著物品傳染：

(廢除隔離後)還是怕歐，到民國 90 幾年也還是怕歐，尤其是我們院內的輔導員。他們都這樣開門耶(手伸到門的最上方)，就是不要碰到門把，越下面病人會碰到阿。門打開後，也不敢關門，就讓門自己關起來，碰(高聲調)的一聲，你看我們是什麼樣的滋味。(阿梅姨，20090401)

他們(院內醫護人員)坐電椅，就是物理治療，整排(椅子)日本人建造的，都還要穿一個白衣服。他們也很驚歐，穿日本消毒衣，患者在坐，他們不敢坐，他們都穿一件白衣服。(阿英姨，20090331)

工友的媽媽〈一么 ㄍㄨ(台語，指佝僂)，幫患者清掃，看到患者走閃的要死，大家都說「你有〈一么 ㄍㄨ還怕患者」。(阿英姨，20090331)

廢除隔離政策後，院內醫護人員的隔離界線由實體空間轉移至個人衣著，這個時期界線看似已被抹除，有病/健康的界線似乎有逐漸模糊的趨勢，但事實上劃界的概念卻從空間交界面(有菌區與無菌區的交界)轉化(transform)成為健康者與患者之間身體與心理的分界，深刻地刻蝕在日常生活互動之中。其中，健康者延續細民衛生疾病觀，或延續過去防治方法透過科學人工物(隔離衣、鏢子)作為保護身體免於接觸污染物以作為身體的沿伸，或自己研發出獨特的接觸形式(例如開關門

方式)以求自保<sup>82</sup>，但在院民眼中隔離衣、鏢子與關門碰撞巨響皆為社會排除的表現形式，許多訪談者在訪談中都提到關門聲，金英姨以提高音量、憤怒的聲調說到「碰」字，阿梅姨則整個人起身，將手向上伸勾到高處模仿指導員不願碰觸門把的開門動作，向訪談者強調當時情境，她們記下這些細微的肢體動作與聲音，可見這些事件在她們生活中的反覆發生與深刻感受，而不約而同的憤怒透露了對於社會現況的不滿，或許令院民痛心的是，這些排除動作竟是來自於理應有醫學知識的樂生院工作人員。此外，同樣受疾病所苦的佝僂病患一樣複製外界對待癲瘋病患者的觀點，無法從自身疾病歧視發展出跨越疾病的認同，這也指出去汗名運動相異於階級運動、性別運動，因不同疾病的差異性高而無法產生廣泛性的認同力量。此外人們排懼的不僅是患者的接觸物，就連患者家屬的接觸物也不例外。老林(化名)的太太因患癲瘋而住進樂生，為就近照顧太太，他遠從金門搬到了迴龍，當時院內仍有許多工友不敢到患者住處附近執行工作，於是他順利的找到工友的差事，當時的工友不時唸著：「(老林)晚上來當班，平時晚上回去和他媽媽睡，當班再來這裡睡，怕那個眠床把他們傳染，還就驚耶，平平工友。<sup>83</sup>」

醫護人員直接連結治理政權並作為直接改造受治者(病患)的權力行使者，因此在此樂生院民與醫護人員關係中，作為治理關係末端的院民往往處於被決定的狀態。但劃界不僅是治理者策動，在治理術運作中受治者也運作著反身性自我組織(reflexive self-organisation)進行自我劃界，於是治理術排除作用下的空間、社會分類秩序內化成為受治者自我的一部分，成為無痕的控制。對於教會的空間劃分，阿梅姨與老陳都曾表示「其實這樣(空間安排)我也比較自在，就不用擔心會不會傳染給其他人」。楊伯伯也表示：「雖然我們嘴巴都說(癲病現今已)不會傳

<sup>82</sup> 2001年院內開始改變隔離取向式的互動，但卻引發樂生院職員家屬「院長你敢保證以後我老婆不會被傳染？」的質疑聲浪。

<sup>83</sup> 阿金姨訪談，20090331 田野筆記。

染，但我去小丫頭(楊伯伯的乾女兒)家吃飯，我會要她幫我安置一套條根、碗，都用衛生筷吃飯，.....雖然說不會傳染，但小孩子小，抵抗力不好，如果我傳染給小孩怎麼辦。(20090324)」

## 2. 劃界運作之治理機制探討

前面嘗試從訪談中梳理日常生活中的劃界運作，我接著將前述現象觀察重新匯入治理術脈絡之中，我想追問的是在 1962 年國家癩病治理看似停止運作之際，強迫隔離機制與政策(也就是治理策略與技術)看似全然解除，但這些劃界工作的運作機制究竟為何，治理術中持續問題化現實(problematicize the reality)的動力為何，維繫治理思想與治理標的(受治者)的策略與技術為何。

林先生，迴龍在地大姓林家的第三代居民，他的爺爺是日殖時期保正，精通日語與中醫術，相傳他是協助日本人購買樂生院現地的重要推手，也是重建迴龍寺的功臣，在迴龍當地極富盛名，並自日殖時期起在縱貫路上開設雜貨店、中藥鋪與碾米廠<sup>84</sup>，提及早期樂生院民至店裡購買所需時：

早期他們來我們這裡買東西，還是用鏢子夾起來放到消毒水洗過才可以使用的。這是老一輩的人交代，老一輩吩咐一定要做到。(林先生，20080517)

觀照樂生院民日常生活購買經驗，阿添伯表示當他去購買東西時，「(外口雜貨店、賣菜的攤子)他們都用那個夾子，泡在消毒水，阿要賺我們的錢，又要驚，又要傷我們的自尊心，又要傷害我們，我拿錢去跟你買，你不肯接我們的錢，就用一隻夾子，把那個錢，放在消毒水，你看，這個傷害有多大，來給我們侮辱。(20080520)」對院民而言，使用夾子是一種你與我、他們與我們的劃分與羞辱，然而對林先生

---

<sup>84</sup> 碾米廠民國 55 年左右就收起來摟，因為附近農家變少啦，而且那時候土地開始被汙染，上遊有農藥工廠、電鍍廠、蠟染場，影響水質。中藥鋪子則是民國 56 年左右收起來，

來說，使用鏢子是日常生活實踐，是老一輩傳承之面對疾病的方式，重要的是通過家庭之中長者的教導。

小張(化名)是迴龍在地大姓第四代居民，但自幼隨著家人到外縣市居住，過年時會回到迴龍與親族相聚，小時候同年的孩子會帶他到樂生院行政大樓前的升旗台玩著假裝升降旗的遊戲，奶奶生日時也曾經在樂生院內尋找拍攝全家福的場景。在他稍長時，有一次電視上播放著《臺灣頭條祕辛》，那一集的主題是癲瘋病院(樂生療養院)專訪，他很訝異父親能立即告訴他電視上的受訪者叫什麼名字，並且細數這些院民的故事，當時的他認為這些電視上的院民是他父親的好友。2004年保存運動開始在樂生院辦各種活動，小張於2005年暑假參與了院內刷油漆的工作坊：

我告訴他們(親戚)我到樂生刷油漆，他們就告訴我爸，我爸打來很生氣，要我趕快脫下衣服，把衣服燒掉。事後，我媽媽會一直打給我，問我有沒有去樂生，並跟我說這個病有多可怕多可怕。雖然說癩病已經幾乎不會傳染了，但如果比方說99%不會傳染，但如果我就剛好是那1%該怎麼辦。所以後來我一直不敢再踏入樂生，直到有一年社團要在蓬萊舍(樂生院舍)開會我才又到樂生，那時候小捲(樂青成員)要我坐在床舖上，當時我一直不敢坐，很怕被傳染，但後來一直站著實在太瘦了，我才坐在床沿，就是床的角角。但後來想想，如果真的會被傳染，那朝夕與院民相處的樂青們不早就被傳染嗎。(小張，20090205)

對比小張過往在樂生「無菌區」玩耍的經驗，「到樂生刷油漆」意味著觸碰院民的居住空間，於是「到樂生」的行為最後必須焚燒跨界者身體之沿伸衣物，對比

林先生在面對樂生院民的出界時所使用的鐮子，兩者事實上都延續了 1949 年癩瘋病預防規則中第七條：「對癩瘋病污染或污染嫌疑物件應予消毒限制，或禁止其買賣讓與，必要時並得予以焚燬。」的疾病觀。「到樂生」對小張的親人而言是「出軌」行為，藉由言語、知識教導來導正、以儀式(以火焚燒衣物)來淨化，通過種種規訓與懲罰讓小張知道癩瘋病的可怕。我透過樂生院友訪談得知，小張的父親及他的兄弟們自小就會到樂生院內與院友打籃球，再透過小張叔叔的訪談中也得知在他們與院友打籃球時總是脫去上衣，而小張的叔叔也表示「我們以前都脫上衣跟他們打球，身體跟身體都有碰觸阿，但都沒事(未被傳染)，....年輕的時候就是不懂事。」，或許家族們的極力反對來自於性別的差異。陳媽媽也是在地大姓後代，當我請她畫出小時候記憶迴龍時，她在樂生的位置劃了一個大長方形並寫上「禁區」兩個字，她說：這個地方是什麼呢(畫上長方形)，就是禁區(在圖上寫上「禁區」兩字)，你知道這個地方是哪裡吧！(我：樂生療養院)對！(我：為什麼是禁區呢?)我小時候家人都不准我去阿，但我知道我的哥哥們都會偷跑進去玩，可能我是家裡最小也是唯一的女生吧，家裡都很保護我，(我：為什麼哥哥可以去呢?)可能覺得男生比較沒關係吧！」樂生療養院在陳媽媽的日常生活是禁區、是危險地帶，只有家中男性能在禁忌中冒險<sup>85</sup>。

樂生院與禁區形象的扣連，在迴龍地區常常能耳聞。我在 2007 年 6 月為了宣傳樂生兒童營活動，我和幾位夥伴在社區內發活動單張，幾位小朋友看到單張上的熱舞教學資訊，興奮的直嚷著要報名參與，飛快地將傳單拿回家，但過了一會卻是將傳單原封不動地還給我：「我媽媽說樂生鬧鬼，說我不可以參加」吳媽媽是迴龍第二代居民，她的孩子參與了第二屆樂生兒童營，營隊第二天我們讓孩子們在樂生院拍照，並且將拍的影像帶回家給家長看，隔天吳媽媽告訴我當他瀏

---

<sup>85</sup> 其他關於跨界的討論，將在下兩段落中進一步處理。

覽孩子們的相片時，留意到「原來樂生院真的有根大煙囪」，她告訴我：

你知道嗎，我前幾天 XX 才問我，是不是樂生的煙囪是燒院民過身。還說孩子來這邊之後就感冒，是不是煞到。我媽(在我)小時候都跟我說不可以靠近樂生，裡頭有一根大煙囪，是用來燒小孩的，就這樣阿，我們都是從小被嚇大的。所以我們小時候都不敢靠近樂生，上學的途中或是去爬山，我們若遇到樂生都會繞路。(迴龍吳媽媽 20090326)

吳媽媽小時候住的社區臨近樂生療養院，如前一小節褚先生的訪談中指出，1960年(民國五十年)後樂生療養院與迴龍社區間出現許多小路，但鬼與煙囪的傳言，類似的都市傳說(urban legend)作用，夾則著現實與幻想，建構出晦暗的、恐怖的樂生(空間)意象，並且透過都市傳說傳遞著這樣的形象，阻止著社區與樂生的連結。褚小姐是迴龍在地大姓褚家第五代，同樣參與在樂生保留運動的她向我描述一段相似的經驗：

那天從樂生回家就發高燒阿，送到醫院住院打點滴，檢查不出來我到底生了什麼病，我孀孀和我媽媽說會不會是被樂生「煞到」，後來就帶我去收驚阿。(迴龍褚小姐 20090205)

「煞」在傳統信仰中代表著遇見不好的事(如鬼魂)而失了魂，是人們無從解釋病因時的解釋，而收驚則是傳統宗教中用以招聚魂魄的儀式，是人們無法醫治疾病時的處方。於是這些台灣傳統民間信仰成為治理術的思想，生病成為思想的明證，因此在解除強制隔離後依舊深化迴龍社區觀看樂生的眼光、並且承襲了過去維繫分界的力量。

## 二、跨界生產與再生產的邊陲共同體

迴龍舊名為塔寮坑、斬龍<sup>86</sup>，位於桃園縣、臺北縣新莊市、臺北縣樹林市交界，無論從上述哪座城市的空間發展歷程來檢視迴龍皆被歸為城市邊陲。行政界線將迴龍地區硬生生切割成三個不同的區域，隔了條小巷門牌、水費與電話號碼分屬不同單位管理，一位受訪者表示：「你看我們這裡很奇怪歐，我住的地方是在新莊，我工作的地方卻是在桃園，但其實兩個地方只隔了一條街，我繳水費卻要繳給樹林。我兒子有時候打電話給他同學，都還要播打 03 長途電話呢！（笑）」<sup>87</sup>同時處在三城市邊境交界並分屬三個管區，但迴龍居民戲稱本地為「三不管地帶」，三和教會王牧師表示：「過去如果他在這邊（發生刑事案件），派出所（指桃園迴龍派出所）在這裡他不管，一定要新莊那邊的管區來處理。（20090215）」

今年 90 歲的樂生院民金伯伯回憶起 1951 年（民國 40 年）他剛到樂生住院的情形，當時從台北橋到迴龍的路上人煙稀少，而迴龍附近人煙稀少：

我是民國四十年來住院，我來的時候，台大醫院一位日本醫生，跟我講我那個病要來樂生看病，我自己是到台北火車站，有公車到新莊。坐公車到新莊，下車步行，走了好久，沒有看到醫院，我就腿阿，沒有力氣了，人煙很少，沒有人，後來我就，剛剛那裡有公車，我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後，第二次，我又來就在台北坐車，坐在昨天回台北的位置，大概在輔仁大學再過去一點，就是營盤，營盤過去一點。後

---

<sup>86</sup> 日殖初期從今龍壽地區到迴龍地區皆名為「塔寮坑」，是與塔寮坑溪有關。爾後名為斬龍，是相傳日本人在開闢縱貫路（今中正路）時，每每開挖後路立即合起，日本人聘請人作法得知此地風水乃龍頭，最後以黑狗血作法才破除龍穴，順利開路，在地富名望曾任保正的林喜先生認為斬龍不好聽，因而將重新命名為「迴龍」。從訪談中可以歸納早期大家所認同的地名：山上，指的是樂生療養院；山腳，指的是今天 746 巷一帶，以王、潘、褚、陳家為在地大姓；而矮腳店仔，則指的是現在中正路與萬壽路交界，靠樂生院一側以林家、江家為主，對面一側則主要是劉家。此外，樂生療養院迴龍醫院旁社區為 60 年代形成，早年主要為江家土地，院民家屬為就近照顧患者在此購地蓋房，或有院民出院後在此定居，因而漸漸形成聚落，這個區域又有癲瘋村之別名。宏慶社區，過去為劉家、鍾家、陳家的田地，70 年代末因為鄰近工廠帶動的住房需求，開始開闢成為現在的宏慶住宅社區。

<sup>87</sup> 田野筆記 20070212

來我就坐車到營盤，營盤下來以後，又走了好久，還是沒有看到樂生，到了十八分(今丹鳳)，然後我又回台北。可是(回去後)身體不舒服，第三次又來，十八分離我們這裡(樂生)比較近，後來我看到樂生的位置，我看到樂生在這個山上，後來碰到一個，撿牛糞的人，他出來撿，他看到我，因為這裡沒有陌生人，應該說新莊到樂生，凡是來的人，都是外面人。來我就問他，我說，樂生院，在哪裡阿，他講得台灣話「苔疙耶」「在哪！」，他說，你怎麼去那裡阿，我說，我去看個朋友，他說，我陪你一塊去。因為他也住在樂生的下面。我那時候，這附近有六間房子，都是土角厝，沒有新厝。(金伯伯，20090329)

金伯伯說的是一個遠赴城市邊境求醫的過程，從訪談中透露著從新莊到迴龍路途的遙遠，卻是一路上沒有人，「凡是來的人，都是外面人」透露著因距離遙遠，使得到當地的人相當稀少，也指出在地人口少，所以能一眼認出是外地人。阿添伯指出：「那個時候(1952年)大盆地放眼一看都是稻田，都是綠油油的稻田。臺北這個大盆地啦，放眼一看，樹林板橋都是綠油油的稻田。縱貫路是一個塌的地方，路是在上面，兩三層高的深度，下面都是稻田。(20080520)」

早期迴龍一代主要以務農維生，住平地的人種田，住山坡地的就種菜，但附近居住人口少，該把這些過剩的農產品賣給誰以求維生，1940年左右迴龍人想到了當時在地人口曾高達上千人的樂生療養院，於是在那個聞癩瘋病喪膽的年代，這些人跨越疆界開始做起叫賣生意。有人擔著家種的蔬菜到樂生敲院民的房門叫賣，也有人以「跑單幫」式的從外地批魚、批肉進來賣：

像是說(將菜)挑到這裡(樂生)，阿添伯你要買菜嗎，去問湯伯伯，他就挑來，一家一家去賣就是了，.....那時候我們的菜錢一個月二十五塊半

啦，五斤的高麗菜一塊阿，大家就買高麗菜來煮阿，阿有的人就是大蒜啦，小白菜啦，什麼菜都挑上來，會長阿你要買菜嗎，什麼人你要買菜嗎，賣完了他就回去。(我：所以外面來的人認識大家嘛?)你開始來的時候有認識阿伯阿母嗎?不認識嘛!阿經常來的時候就認識阿伯阿母了，一方面聊天，一方面做生意阿。....有的人在丹鳳那裡賣魚的人，一個叫阿本阿(化名)，一個叫阿土阿(化名)，一個叫做阿陳阿(化名)，每天去外面補貨，補貨賣誰，來賣樂生院，因為樂生院有幾千人，大家都需要阿，都賣誰，都賣樂生院。(阿添伯，20090520)

於是在強制隔離的年代，迴龍居民跨越界進行商品交易，並在面對面式的叩門叫賣中與樂生院民建立「老朋友」的情誼；迴龍居民販賣的食物，為院民們補足院內伙食不足、營養不夠的問題，樂生院民的需求也成為在地人的經濟來源，形成互惠網絡：

你們賣菜，我們來跟你們買菜，我們可以有吃菜的營養，你們可以有這些錢其他的用途。....有的人就感念，阿早期也是因為樂生院...，我做生意，賺錢就是在樂生院裡面，你看這周邊都是，我是癲瘋病人你不是，但生活都是一體的。所以說今天的聊天，我才想到這連帶關係(恍然大悟的情緒)，只有幾家農家啦，豬肉殺了要賣給誰，菜種了要賣給誰，樂生院裡面，幾千人，都跟你有連帶關係。(阿添伯，20090520)(底線為作者所繪)

早期樂生院有外國傳教士，因此有許多美援物資，美援物資多，除了麵粉，還有二手衣物、煤炭配給與罐頭，院民會將吃不完的物資對外販售，傳言新莊著名錦絲麵早期設廠於樂生院旁癲瘋村，就是為了向樂生院民購買便宜的麵粉生產(迴龍

褚先生，20080426)。1962 年後，院內逐漸開放讓通過癲瘋檢定<sup>88</sup>且外貌完好的院民外出，一些院民合資從外面批貨品在樂生經營起小店舖，鄭伯伯是樂生榮惠，入伍前在福建經營牛肉舖：

我本來是殺牛，殺牛(樂生院民)吃的少，就轉殺豬了，後來患者人多了，以後漸漸不怕癲瘋的人多了，有些職員阿護士買了吃。我們殺的是沒有稅金，跑稅啦，你少了這稅金，就賣比較便宜，附近的人也會近來買。我給他抓了兩三到，他們(其他肉販競爭者)有一家看我生意好，就給我報告，因為沒稅金吃的多，頭一次抓到是請陳宗鏗院長，他跟法官講他們是這裡的患者，殺了是給患者的，所以他不拿稅，請他原諒，所以就不關不扣，讓我院裡養病。(20090315)

此外，不僅產生於院民飲食需求，例如國民政府初期由於公炊停滯，院方一個月配給一人六十斤木柴讓院民在院舍內自行炊煮，卻也在 40 年代產生了另一項需求，「我來的時候就自己買燒爐，煮那個煤炭，有時你院方發給你的是木柴，有的大的，有的小的，阿你請人家幫你挑上去也要錢，有的這麼大一箇，你要叫人家劈啦，也是要錢。(院方)也沒有劈好阿，到山上的時候，就一捆多少斤一捆多少斤，一個人六十斤啦，六十斤你搬得動嗎，我搬不動阿，一個人可以挑一百二十斤的大有人在，像是村長他老爸挑一百多斤的還不算什麼歐 (阿添伯，20090520)」。

樂生療養院運作本身也為附近居民提供許多工作機會，尤以光復初期，樂生院內醫療人員缺乏，加上外界對癲瘋病的恐懼，曾經有段時間只要你願意到樂生作護士，不需任何醫護知識背景，當時有軍醫直接透過申請轉任樂生院醫師，

<sup>88</sup> 癲瘋檢定為檢測患者是否為會傳染給他人的醫學檢測。

因而被戲稱為「總統牌」醫師 (林大哥, 20080423)。樂生院行政人員也往往來自迴龍在地大姓如褚家、藍家、林家、陳家、江家：

姓藍的允阿(化名)一家口都在樂生吃頭路，他阿嫂作護士，媳婦拿病例表，叔叔也在這裡作，親家、太太都在這裡作，洗衣服間的工友是外甥。褚先生作輔導員，他說，我們整家都在樂生院吃頭路，要對患者好一點，他兄哥還是小弟也是輔導員，女兒作工友，女兒結婚的先生作總務，兒子也是輔導員，阿嫂也是護士 (阿英姨)。

1962 年解除強制隔離後，樂生院民為了賺取生活津貼，會想辦法在院內養鳥、養雞、養狗、養兔子：

以前最早是養十姊妹阿，一對一對的鳥。後來有一陣子是養兔子，養那個安格拉斯兔，後來才養狗，養得很多歐，博美阿、雪納瑞、日本狗、北京狗... 那些雞很好賺歐，這邊只負責養小雞，都從彰化南投那邊進剛孵化的雞過來，養兩個禮拜就賣給養雞場或零售。歐，那個很好賺歐，一隻賣 5 塊 10 塊，你看幾千隻他可以賺多少。(阿添伯，20090210)

養大的小雞，通常交由五官完好的院民拿到社區販賣<sup>89</sup>，也曾到台北火車站天橋，甚至阿萬伯表示當時每天凌晨三點就要起來準備，摸黑騎著腳踏車到七堵、基隆一帶販售，因為一些迴龍附近居民仍會因為是樂生院民養的不敢買<sup>90</sup>。而院民養雞、養兔子所搭設的竹寮，也成為迴龍居民另一項收入來源「阿興阿(化名)就住在我們後面山，他都會擔竹子來賣，阿伯阿母有的

<sup>89</sup>褚先生表示：裡面的人有養雞和養鴨，會拿小雞和小鴨拿出來賣，他們也有做生意拿出賣，挑出來外面賣，小雞會賣給附近的人養，也有養狗，我媽媽有買，養大大部分是自己吃。(20080426)

<sup>90</sup>見下一小節，林先生的訪談，田野筆記 20080517

人要釘雞寮啦，有的人釘兔寮啦，都要竹子阿，他竹子都小小的阿，一把看多少，買來阿伯再鋸一鋸這雞房歐，看多大歐，都向他買。(阿添伯，20090520)」

三不管的迴龍結合樂生痲瘋病院帶來的鄰避效應，卻也使得各種地下經濟在此處蓬勃發展。院民利用警察不敢到樂生而在成立賭場，以玩排九、梭哈、四川麻將、骰子為主，其中以玩排九的人最多，榮患與民患各有個場子，據說榮患場是由竹聯幫維持，更是讓迴龍管區員警的人不敢抓。1986年(民國75年)左右，院內整併民患與榮患賭場，開設澳門賭場，澳門賭場聲名遠播，不僅院民、在地居民，也有遠從台北、林口、新竹來的賭客。

88歲的林奶奶是迴龍林家第二代媳婦，在第一次訪談中，我說明了我的研究是想了解「迴龍、樂生的歷史」，她以生氣的語氣留下「樂生有什麼好問的」「這我不知道」轉身調頭就走。這次的經驗對我來說是一次重擊，我當時認為「樂生院」對於許多迴龍居民來說是個排懼的話題。但第三次到林家訪談時，正巧奶奶也在場，當時我帶了富有樂生老照片的《悲歡樂生》一書，意外引發了林家人的熱烈討論，在許多話題中林先生手舞足蹈的告訴我他的記憶，包括著樂生院的魚池、小時候偷跑到行政大樓看院民換藥的經過，林奶奶在討論中不斷表示「這我不知道，我都不曾出門」「以前都在帶孩子，哪理知道這些事」。但談到樂生療養院賴醫師時，奶奶說「歐賴水木醫生，以前小孩子生病都帶到宿舍那裡去拜託他看病，以前他住在宿舍第二排交叉那間嘛。」聊到樂生院傳教士時，奶奶說「杜姑娘、韓姑娘都常來店裡買東西，韓姑娘很好禮，要走的時候(回國)還來店裡打招呼」奶奶最後還講了她目睹樂生淒美愛情故事<sup>91</sup>。這次訪談，一層反省是，

<sup>91</sup>「有個做老師的，他太太得了病，他就送太太到(樂生)大門，歐那種感覺，很捨不得，很可憐」(20090505)

「歷史」對於一般百姓來說是一種專門知識、是大敘事(grant narratives)，並非生活經驗，此外對比林先生與林奶奶的移動經驗，仍可以看到台灣婦女的被圍限的移動空間(店內、店內可觀見到的樂生大門、帶孩子看病)；另一方面讓我看到樂生療養院雖為漢生病患者專門療養所，但也為邊緣的迴龍地區提供了醫療資源，從醫療層面來看迴龍地區的再生產體系，事實上也與樂生療養院形成網絡式的關係。

另一位進入迴龍再生產網絡的是今年 79 歲的林葉阿姨，16 歲到樂生的是樂生佛教會成員，另一位佛教會成員張瑞祥的親戚生活窮困，1950 年代新莊工業開始起飛，在樂生佛教會會長金伯伯的建議下張瑞祥的親戚從南部北上到新莊討生活，家住樂生療養院旁，又在金伯伯的介紹下，林葉開始帶起他們的孩子，而後張家親友、鄰居陸續北上謀職，孩子也由林葉阿姨帶，最多的時候有十八個孩子，她說，「窮人，是沒有怕癲瘋的權力的！」(商業週刊，2007: 119)」

迴龍村村長江清萬，自幼隨母親擔菜到樂生，隨父親在樂生擔柴，樂生院的每家每戶都認識，因與母親同姓陳的關係，他稱阿添伯為「舅阿」：「像以前貓仔萬(村長外號)他媽媽，也打菜出來賣，因為打菜來賣我們都認識，他老爸，江阿球，因為以前阿伯阿母都擔柴，都配柴，他爸爸身體很壯，就幫阿伯阿母擔柴(阿添伯，20090520)」，「樂生對我真的很重要(20090328)」回憶起自幼成長的過程，小時後家裡窮，都在院民自行經營的磚窯廠撿煤渣回家生火，「像阿雙姨(化名)耶，那麼大態(病情那麼嚴重)，他煮的稀飯我吃了都沒苔疙。」

樂生院自日殖時期便設立籃球場作為院民娛樂空間，樂生院的球場也成為迴龍地區唯一的娛樂空間，「那時候(小時候)，我們沒什麼娛樂，我們都是從旁邊這條小路上去打籃球(林先生，20090505)」。楊伯伯是院內籃球好手，他說年

輕的時候，院內主要有三個籃球隊，一支叫作晨光，以山東人為班底，另一支叫青風，也是以榮患為主，最後一支以「老百姓」(榮患對於臺灣病患的習慣用語)為主，但組成時間不長。楊伯伯提到樂生院民組隊參與新莊比賽的過程：

那時候我們報了迴龍隊，代表迴龍去比賽阿，到新莊比賽，拿了第二名，只輸給新莊教師聯隊，都是體育老師阿。我們都是院民組成的阿，十四個人一隊，兩個教練，那時候還有身體檢查，就是怕有癲瘋來打，但檢查通過。....樂生院有三隊籃球隊，從三隊挑選看不出來(是病患)的，因為打球都要穿短褲阿，像手這樣就會被看出來阿你是麻瘋的。.....那時候新莊中學隊叫我泥鰍，因為我打前鋒，又很會閃。(20090317)

### 三、界線之運用

本小段以訪談資料企圖指出「排除者/被排除者(受害者)」的二元分類，事實上會因為情境的不同以及受治者的靈活運用下，產生相異的結果。

#### 1. 外貌「完整」與遮掩

燦桐伯，台南市濱燈人，1942年(民國31年)到樂生，那年他僅11歲，他說當時日本政府把癲瘋病宣傳得很可怕，所以當他臉紅紅的，就不敢再去學校，怕警察抓，因此騙學校說腳不能走，後來因為吃了中藥反而病況開始嚴重，所以自己來到樂生，他說剛進來時傻傻的，什麼都不懂，住在高雄舍天天都哭。剛來時，還真的會怕，看院民覺得長得怪怪的，看起來害怕，那時有個在院內負責燒院民遺體的院民要拿東西給他吃，他不敢吃。

燦桐伯回憶著小時英俊討喜的模樣，讓幾位護士對他特別好，有一天下班時間，護士們就偷偷帶他到當時台北市最熱鬧的延平北路看電影，當時守門的是

院內的指導員，但因為是護士帶著出關，指導員也就假裝沒看到，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他們出去了。到了台北才發現電影已經演完，護士們又帶燦桐返回樹林看小馬戲團表演。那時正值炎熱夏季，表演結束後，護士們帶著燦桐一同去吃冰，一大碗冰對年僅 11 歲的他分量太多，吃到一半吃不下了，護士看了覺得很可惜，就把另一半吃了，並要求阿伯不能說出去。

光復後，樂生院能承接日據時期的政策，將病患強制隔離於樂生，改變的只有站哨警察換成了憲兵。這個時期，樂生院院民會藉由非正式的方式偷跑出去。

有時候報備也不一定會給我們出去，所以我們都走小路再翻牆出去。

我都穿長袖出去，這樣就不會被發現。(老陳，20080321)

我們會偷跑出去看電影。就繞小路再經過磚窯廠翻牆出去。比較常去台北市延平北路第一戲院，那時候四塊可以看一場。車程大約 40 分鐘，可以坐公路局去，但大多與其他院民借腳踏車，因為看完電影就沒有公路局。電影院黑黑的，也沒有人會知道你是「癩哥病」。回去的時候，警察都會在公路局的牌子前等抓人，我們都會走在沒燈的地方，再偷偷翻牆回去。(燦桐伯，20080321)

儘管社會對於麻瘋病患者的排斥，但院民會運用各種身體策略喬裝，達成跨界。有一天，我與阿嬌姨(化名)一同到林口長庚探望院友，阿嬌姨進樂生時已有漢生病特效藥，因此手腳完好，五官外貌也未因得病而改變，唯有從扭曲的左手可看出得病的痕跡，長庚院內移動、在電梯裡，她總把左手插到褲子口袋內以外套遮住，她說：「以前是會怕讓人看到，現在是習慣了」。藍阿姨談到年輕時，到樹林、三重燙頭髮的經歷：

我去電頭髮時都用一件外套，給手蓋蓋住，若有人問要不要幫你把手

套吊起來，我就會說，不用，我怕冷。(藍阿姨，20090325)

## 2. 身體偽裝與冒充

樂生院舍涼亭是樂生院民、附近居民聊天泡茶的地點，每個天氣晴朗的午後，院民們午睡結束後至四點送便當前會聚在院內涼亭聊天，新生舍則是院內最有人氣的地點之一，院民們總喜歡在涼亭下泡茶聊天，冬天時搭了個小火爐大夥聚在一起烤火，夏天則把屋內的電風扇搬到戶外。傳統的茶具無法供應大量的人客，因此今年新生舍的文章伯換上了能快速沖茶的茶壺，招呼路過的院民、院內職員、迴龍居民、學生來「喫茶」、「吃餅」，若是「人客」太多則從屋內搬椅子出來。一天下午，我如往常地跑去泡茶聊天，當時在場有十位院民、一位自幼搬到迴龍的院民第二代，幾十年的老朋友聚在一起鬥嘴鼓(台語)聊到著附件居民對癲瘋病的歧視：

阿刀(化名)：幹你娘，尚怕的那個吃到裡面。.....

阿英姨：他們是在地人，在地人有的很怕，有的沒怕啦...。

阿刀：矮腳店仔有驚嗎，驚到最後也是要賣山上的人，山邊有驚嗎，也是要切菜進來賣，也是要進來買豬肉。山邊有驚嗎，那都這樣。那姓褚的，他兄嫂常常都剪草進來賣。阿吉(化名)也很驚，有沒有以前做護士，他都很驚。

文章伯：要錢不要，都用一個消毒水。

阿刀：那有甚麼驚，分局有驚嗎啦，我的手軀這樣，以前裡面與外口的分雙邊，你外口人，站那邊，你的人走那邊，站這樣。喂喂，意思說我是外口人阿，你不能回去啦。要裝這樣(手指彎曲)，你裡面(指樂

生院民)對嗎，他看我的手，說你裡面的人嗎，你和他走同一邊，站一站，他說你們這些可以先走。

文章伯：所以癲瘋村那場賭歐，賭五六十年，都靠我們患者的名，沒怎麼敢來抓嘛，只有我們山在開場，不敢來這裡抓阿，有時候抓去歐，[阿刀：費氣啦]，分局長會罵耶，阿你常常抓是做什麼(在場都笑了)。[阿英姨：還要消毒費氣啦]。你常常抓這些是要做什麼，有時候抓一兩遍，分局長會罵那警察，你抓這些是做啥沒。[阿英姨：驚苔疙啦(笑)]<sup>92</sup>

異於我進行個別訪談時，院民們在談及被當成「他者」經驗時的憤慨，樂生院區的房舍配置給了院民一個凝集的空間，在這裡，別人異樣眼中的「他者們」(others)，反過來嘲諷社區居民的恐懼，反被批評為「無知」與「說一套做一套」，於是「我群」與「他者」產生了根本性的反轉，而阿刀<sup>93</sup>更是偽裝成漢生病患者的身體，來愚弄無知的警察。江清萬也有相似的經驗：

以前樂生院有賭場阿，我也有去過。我們就說這個病會傳染會傳染，他們就怕，全分局就消毒。就是要整他們，讓他們放我們回來阿，不要抓去(20090328)。

1956年(民國45年)所修訂之臺灣省癲瘋病預防規則施行細則第六條第六款修正條文中規定：「病人住過之房間，由衛生機關負責消毒後方准使用」，至1980年代這則條例事實上已經廢除，但迴龍居民與院民利用著過去的治理技術，成為他們的惡作劇。鄭伯伯曾有因癲瘋病而免受罰則的經驗：

---

<sup>92</sup> 田野筆記 20090327

<sup>93</sup> 阿刀的父親於民國三十九年入院，因此舉家從三重搬到迴龍，居住56年的他是老在地

我有一次請假出去，有個請假條嘛，騎車出去闖紅燈被抓去，我就逃給他追，他說他要看身分證，我說我沒身分證，他說有什麼證件沒有，我就把請假條給他看，他說快回去，在中山北路第一戲院那理被抓到，那時候騎腳踏車出去的，(鄭伯伯，20090315)。

雖然這些日常生活的小故事並未讓癡瘋病去汙名、打破我群與他者的分界，但在這些情境下，癡瘋病跳脫了「骯髒的」與「受害」的極端，甚至成為平安符(碼)(blessing code)。

## 第二節 城市治理下的主體

本小節將延續第五章新莊城市治理脈絡，從訪談資料分析探討「治理術」、「身份」與「情感」之間的關係，藉此探究以「城市」為認同基底的市民，如何形成「反保留」之主體。Dean (1999: 32) 指出，特定治理實踐與計劃的治理運作總是試圖形塑個人與集體認同，並且藉由引發、推行、促進、培養特定行動者的各種能力、特質與地位，企圖成功的讓這些行動者經驗這些能力(理性決策)、特質(性傾向)與地位(積極的公民)。他提出幾個關鍵發問：首先，什麼樣的個人、自我與認同被不同的治理實踐預先假定？其次，受治者被先驗的認為該具備的條件？他們被預期有什麼樣的行為？他們有什麼責任與權力？這些能力與特質是如何被養成的？而哪些某些行為又是如何被問題化？以下將從「無用的恐懼」、「發展的慾望」兩個層面探討。

### 一、無用的恐懼

2007年7月為了持續宣傳樂生兒童營，我和社區學校夥伴到迴龍社區發傳單。那天，在公園廊道上看見兩位婦女聊天，我們上前說明將在樂生舉辦活動。

知曉我們是宣傳樂生的活動，一位太太馬上很生氣的說：「你是新莊人嗎？都是你們這群外地來的學生在亂」、「都是你們讓捷運不能通，讓這裡不能發展」，或許是聽見有些人在爭論，幾位婦女靠近圍觀不一會也開始加入戰局，「你知道政府這些年浪費多少錢嗎」、「學生就是要好好念書啦！」、「吃飽太閒啦！」、「有沒有孝順你家人，回家孝順父母比較要緊啦！」<sup>94</sup>圍繞著「地方要發展」、「你們浪費了政府的錢」、「學生應盡的本分」的議題，最後不歡而散。

Dean (1999: 210) 認為，新自由主義藉由問題化福利國家，並將市場理性擴展至各個領域、企業文化與負責任的自主權(autonomy)的建立等，目的是要讓個人行為形塑為具競爭力且有效。他引用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1987年的訪談，表達了新自由主義理性(neo-liberal rationality)：

我想我們已經經歷那個只要他們遇到問題，這是政府該去解決的工作，...「我是遊民，政府應給我住的地方」他們將自身問題歸咎於社會，但你知道嗎？沒有什麼所謂的社會，只有個別的男人、女人以及家庭，沒有政府能做任何事情，惟有透過人，人必須先看看自己，我們有責任先照顧自己，接著照顧我們的鄰居。(1987: 10)

畢生推行新自由主義不遺餘力的柴契爾夫人，重新界定「政府」與「個人」的關係，異於福利國家時期「政府」設立目的為照顧個人，新自由主義主體被期待作為一個無須政府補助的個人。因此被國家照顧一輩子的漢生病患者被視為不應當：「那些在上面的歐，都是最無理取鬧不走的，他們都是抗爭就有錢拿，阿有些很明理的，就覺得國家已經照顧我們了(陳先生，20090327)，就搬到大樓。」

von Rüstow 認為現今社會所有面向皆由企業精神(ethos of enterprise)所重

---

<sup>94</sup> 田野筆記 20080706

塑；芝加哥學派的學者認為個人行為是經由經濟理性指導與預測，自我變成企業家，所有天生與所需的技巧、才智與能力則構成了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轉引自 Gordon, 1991:43-44)。個人成為勞動力市場上代價而沽的商品，增進個人人力資本則成為新自由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Sennett 認為當代社會通過經濟價值判斷個人的哪些特質為「才能」(talent)，而其餘特質則為「無用」(uselessness)，人們將「無用」視為對於現代化、經濟發展的威脅，因此對於無用的恐懼成為了歷史的幽靈。於是借用 Sennett 的觀點，不事生產的老人/癡瘋患者與未出社會的學生，就成為無用中的無用：

有的人不要住，只剩下百分之二的人在這裡耶，剩下的都住在新厝那邊耶。那幾個人在這裡做蝦咪，讓新莊人的發展要怎樣執行啦。這裡的人就惡質的你知道嗎，那些囡仔吃飽知道蝦咪事情嗎？丟母？蝦耶囡仔吃飽知道蝦咪碗公嗎，伊知曉蝦咪，知嗎？你新莊人這條捷運沒通，看三年損失幾百億，讓妳們自己講就好我都不要講，這幾百億不只是捷運沒有，這路邊的生意人，這的路邊住的人，所有的生意都無做，阿這些人你是要叫他們做什麼。你看看，所以新莊人的包容做為給他看作傻去，不能這樣啦，說實在的，不能這樣啦。(新莊里長<sup>95</sup>)

## 二、發展的慾望

共存方案不要延後捷運通車太久，現在板橋捷運通了開始繁榮了，反而新莊更落寞。(飾品攤老闆，2006年8月新莊組老街訪調<sup>96</sup>)

<sup>95</sup> 「政府向人民嗆聲」大遊行影片 <http://tw.youtube.com/watch?v=jhUgeXkIxEU>

<sup>96</sup> 2006年8月新莊組老街訪調是針對新莊老街商家所作的訪調報告，當時是為了調查居民對樂生捷運共構方案的看法。成員為我、何欣潔、胡清雅、何建慶、王灝中、劉育育，最後訪調資料由胡清雅統整書寫。

已經拖了好久好幾年了，人家土城，他們(捷運工程)慢我們五年，他們已經通車啦，我們提早五年還要到一百多年才能通車。(新莊民代

97)

從飾品攤老闆的訪談與新莊民代的反應得知，許多新莊居民會將目前新莊的發展對比鄰近縣級城市像是板橋、土城。「捷運興建與否」是臺灣城市評比的重要指標，競爭評比價值也滲透進入居民意識形態。胡小帥是樹林三多國小<sup>98</sup>老師，當我詢問新莊/迴龍居民對於捷運看法時，胡小帥告訴我童書《失去龍穴的新莊》故事。在台北開發史中，新莊是台北最早的開發區，清朝康熙年間外地的船隻可直接溯淡水河而到新莊，新莊因地利之便成為要港。並於乾隆年間有「一府、二鹿、三新莊」的美稱。乾隆後由於河道淤積，新莊失去其河港功能而降為海港，貿易中心則逐漸下移到艋舺、甚至大稻埕，其重要性遂逐漸被艋舺、大稻埕取代，「一府、二鹿、三新莊」的美稱，也改為「一府、二鹿、三艋舺」。光緒十三年(西元 1888 年)六月，劉銘傳設立台北新竹段開工，十五年鐵路穿過新莊平原，十九年底達新竹，完成新莊線鐵路，從台北站出發，經淡水橋站、新莊海山口站、打類坑站(今丹鳳地區)、龜崙嶺站(今龜山地區)，最後抵達桃仔園站。但到了日治時期，經歷明治二十八年(西元 1885 年)，與明治三十年(西元 1887 年)兩次颱風，帶來洪水，將整座台北橋破壞了，海山口附近河岸陷落，鐵道流失，龜崙嶺的路堤崩潰，全縣停車。因此日本政府興建板橋線鐵路(板橋、樹林、鶯歌到桃園)，使得新莊人口減少、商業衰退，再加上幾次鼠疫病蔓延流行，新莊繁榮發展的景象，再次中輟而沒落。胡小帥表示過去由於鐵路、高鐵設站的期盼落空，因

<sup>97</sup> 3/31「要捷運拆樂生」遊行動員內幕影片 <http://tw.youtube.com/watch?v=AusIPDeMM1A>

<sup>98</sup> 雖位於樹林市，但同樣位於迴龍地區。胡小帥於 2002 年鄉土教材課帶學生進行「迴龍大搜查」活動，訪談了迴龍地區的村里長以及全校家長對於「地方發展」的看法，其中問卷提到「迴龍最美的地方」，問卷調查統整第一名為樂生療養院，因而促使胡小帥留意到樂生，並於 2004 年開始帶學生到樂生進行服務。

此讓新莊、迴龍民眾更期待捷運的開通：

因為以前鐵路曾經是要從迴龍經過，但因為龍壽路高度差很大，所以鐵路後來走樹林。高鐵也是本來從保安路經過要設站，但最後也只有板橋設站。所以會對捷運過度期待。(胡小帥，20080911)

對於捷運的過度期待，不僅因為新莊一直以來處在被其他城市取代的歷史位置，也同時包括了「發展期待」的落空。以 1985 年(民國 74 年)提出的新莊副都心計畫為例，每隔幾年就會看到政客，但至今只進入整地完成階段。政府打出許多的客體(object)吸引新莊市民的目光，然而過去二十年都失敗，僅捷運新莊線已經動工，因此當最有把握得到的市政建設又開始延宕，新莊居民又一次處於被取代的焦慮：

(迴龍)最大的改變大概是稻田不見了，取代的是捷運的施工，其實施工真的很久了，從我小六到現在(大約十年)，一直沒有完工，會讓附近居民很不安。所以當有人說捷運無法完工都是樂生院民害的，就會把矛頭指向他們。(義正，20080911)

此外，捷運被塑造成現代化的進步形象，在台灣捷運更成為一級城市的代名詞，捷運被視為形塑台北新意像、新文化。因此，新莊捷運的開通也意味著迴龍更靠近台北，小張表示：

(家人在得知要蓋捷運的反應?) 很高興阿，又一次我坐車回去(迴龍)的路上，跟我說我們這裡快要有捷運了，...他們會覺得迴龍因位在桃園發展比較差。我們家從小都會去新莊唸書，我爸爸都會跟朋友說他是新莊人，或是台北縣人，他會跟我說我們家雖然是在桃園，

但我們電話是 02，是臺北，我們離台北很近。(小張，20090205)

捷運的開通也關乎了新莊能否從過去工業城市形象，轉變為後工業甚至「六星級」城市：

對三重、蘆洲、新莊、樹林、迴龍民眾而言，台一線省道近 10 年的時間都在捷運施工狀態，尖峰時間交通壅塞，尤其對新莊市來說，新莊副都心發展計畫的交通動脈繫於新莊線，捷運工程延誤直接衝擊地產開發商利益。<sup>99</sup>

如第五章所言，當新莊捷運機廠選在樂生時，癲瘋病被視為一種汙染，癲瘋病院成為「污穢的空間」，並且擔心是否有感染的問題。因此在發展至上的思維中，「拆除(舊的、髒的)，蓋新的」就，特別透過明亮乾淨的捷運系統來淨化迴龍山坡上的苔疙院，自然在土地商品化過程中受到支持。而「古蹟保存」不會被歸類為一種發展，因為在里長治理邏輯內，古蹟保存，並不是一種建設，建設是拆除舊有興建新物。新莊市福營里廖皇源里長在接受《捷運報導》採訪時表示：

廖里長清楚了解，福營里的居民多為心地善良務農的本地人，他們對這片土地有充分的認同感、使命感，希望地方建設能帶動經濟繁榮，而捷運的興建帶來便利的交通，繁榮經濟自是無庸置疑的，因此廖里長在與民溝通協調時常灌輸民眾一種觀念：「有破壞，才有建設」，捷運施工雖有短暫過渡時期的不便，卻能給新莊地區帶來經濟繁榮的景象（捷運報導，2004）。

---

<sup>99</sup> [2008-12-03/中央社]

地方行銷因涉及創造性破壞，因此論述也包含「行銷(新)」、「排除(舊)」。新與舊的關係在新莊雙鳳里陳專森里長的一段話更為清晰：「在國家重大建設與古蹟保存相衝突時，權衡輕重後應以國家重大建設為優先考量，以樂生療養院為例，如後代子孫對該院有所認識與了解，目前的文獻留存亦可供參考，若因此延宕新莊機廠的工程進度，影響新莊線的通車時程，則實非新莊居民之福。」代表公共、日常生活空間的捷運，以及隱匿空間的樂生，樂生的保存便被認為阻礙國家建設。

### 三、迴龍居民之矛盾情感

從上一節訪談過程發現對於許多 40、50 年代後出生的迴龍男性居民來說，「到樂生玩」是他們的共同回憶：

以前機廠工地那邊都是稻田，小時候我媽都會騎摩托車帶我在稻田裡穿梭，手就會很閒(台語)，風吹過來，去拔人家的稻穗，小時候都覺得這裡是一個很神祕的地方，因為稻田有一條斜的路可以通到中山路，前面是民宅，中間是稻田，後面有幾家工廠。樂生不是有個斜坡嗎？我媽都會騎上去，從上面衝上去，很刺激很好玩。(義正，20080911)

褚先生是新莊雙鳳里里民，與里長是從小一同長大的好友，里長舉辦的大小活動都會參與。當我問到民國 1994 年 10 月 19 號新莊市雙鳳里里民因不滿地方發展長期受限抗爭的新聞，他有些生氣的對我說：

那是因為大家都覺得怪怪的，但大家都很同情他(指樂生院民)。怪怪的是因為怕傳染。以前政府也是希望他搬，也有找地，但是醫生不要，因為他(醫生)搬去那邊不方便。政府想把他搬到別人比較不會反對的

地方。(褚先生，20080426)

而當我詢問褚先生是否到過樂生時，他花了許多時間和我詳細描述童年吃的果實、以前樂生院未拆時的樣子：

我們會去拔東西吃，他有種水果叫做風鼓，中間是空的，我們就會吃他的皮，外型很像石榴，但比石榴小。顏色是綠色的，比較生會比較色，比較熟會比較淺。椰樹很多，我們都會去玩，那是一個坡道，上去以後左手邊是籃球場，籃球場的旁邊是一排房子，有兩層，住了很多病患，初級的病患，不會很嚴重的就住那裏。比較嚴重的就住在上面。其他還有圖書館，還有水池養魚，我們會去那裏釣魚。再上去的話有人會管理，有警衛但沒有憲兵，分兩個地方會有警衛，門口。裡面也有福利社，我們都會去福利社買冰吃，買東西。買泡麵。

我們小時候會騎腳踏車上去那邊玩，我們有的時候會跑去那邊釣魚啦，打籃球，打桌球。打桌球，有桌球，那是一個管理圖書館的伯伯，他在那邊跟院民打，我們上去的話，他也會跟我們玩，他也不會趕我們，他是說：如果你不怕的話，你就跟我玩，東西我們也會借你。他們跟外界也是有接觸，以前那些伯伯也是很和氣。

接著他陷入沉思，過了一陣子很深層的告訴我：

會對疾病有隱憂，因怕被傳染總是不希望這東西在這，對迴龍以前的發展有阻礙。樂生就好像是童年的遊戲場，如果真的拆了感覺很矛盾，很熟悉的東西，沒有了很奇怪，記憶好像會失落了某部分.....。佔了回憶中滿大部分，童年會影響人生，感覺遺失了某部份。我們每天早上都會

聽到三聲咚咚咚，是禮拜堂旁邊的鐘塔，提醒院民開飯。

跨界實踐(practice)不斷累積著情感(affect)與經驗並刻蝕成褚先生的內在記錄(visceral of registers)，在褚先生沉思，一如 Butler 所提到的展演中的頓點(gut)，透露了其中的矛盾。而 Ferguson 指認「發展是種情境知識，在特定的歷史、社會、論述情境中被生產，目標為促使權力得以運作」，在企業城市治理情境下，褚先生選擇壓抑童年的記憶、對於地方的情感，但也看到情感難以抹除的特性。類似矛盾的情緒也發生在林先生身上：

阿其實這種病會不會傳染，我在這裡住那麼久了，我跟你保證不會。

據我所知，這附近只有兩個人被傳染。我們小時候都到樂生的籃球場打籃球，都和樂生院的人一起打，我們都脫光上衣打赤膊，但還是都沒事。但說實在的，我們從小都是他們看長大的。住這邊關係都很好。但說實在的，坦白說，我到現在都不敢吃從上面(指樂生)種的食物。不知道的人還是照樣吃下去。

矛盾的情緒始於一種關係與權力建構的矛盾。透過殖民時期老一輩人所留傳的教導，以及各種去人性化的知識技能(用鏢子夾放入消毒水)，迴龍居民不斷被教導著後代疾病的可怕。但從小到大的記憶、經驗，卻又讓目前 40-60 歲一代的附近居民和樂生院民(人與人)、樂生院(人與地方)的關係，猶如自己的鄰居、自己的長輩、童年的遊樂場。從情感地理學論述來看，情感的依戀來自於與樂生院(民)發生的依附關係(與院民成為朋友、樂生成為童年遊戲地方)，而對於疾病的恐懼與發展的想像，則來自於另一層關係(村長的關係、家人的規訓)。當新一波城市治理教導市民何為「發展/落後」、「有用/無用」並企圖斬斷社區居民與樂生間的情感依戀時，處於多重關係下的居民產生了情感上的矛盾。

### 第三節 樂生保存運動的社區工作

#### 一、早期新莊工作 (2004-2005)：

2003年新莊文史工作會、北投生態文史工作室等社區團體開始進行「樂生療養院」的研究和活動：由新莊文史工作會、保護新莊老樹樂生聯盟、北投生態文史工作室、以及臺灣科技大學人文學院范燕秋教授組成的搶救樂生聯盟。2004年1月范燕秋找了城鄉所畢業、北投文史工作室的陳林頌舉辦樂生院區導覽，導覽結束後決定於2004年2月15日舉辦全國醫學生「青年樂生營」，由張馨文擔任營隊總召，蔡宗芳、莊海華、林志錚共同合辦。營隊籌備過程，保留運動開始與雙鳳里陳專森里長合作，由陳專森協助進行社區訪調，帶著學員調查捷運與樂生院對地方影響，營隊結束後成立青年樂生聯盟，底下並分成社區組、研討會組與資料蒐集組。早期社區工作多透過陳專森的幫忙，一方面透過他聯繫其他地方政治人物，「如果你要說民意支持的話，大家如果說有沒有民意支持，那就是(要找)民意代表」宗芳表示當時社區工作的想法很簡單，就是尋求代表地方民意的民意代表支持，2004年到2005年歲末的時，陳專森帶著他與馨文一場一場跑尾牙，並且告訴他們會有哪些議員、立委會來，哪些地方民代會願意簽，當時拜會新莊鐵三角---許炳崑、黃林玲玲與蔡家福<sup>100</sup>，以及2005年參選台北縣議員的候選人<sup>101</sup>都拜會。另一方面，在社區透過陳里長進行連署並且動員社區的民眾參與樂生

<sup>100</sup> 蔡宗芳訪談，20090215：「陳專森甚至我帶著連署，他帶著我一場跑尾牙，去找人給他們簽，他告訴我會有哪些議員哪些立委會來，哪些人會願意簽，許炳坤那時候是代表還是議員，我們當場不曉得哪一個里，應該是樂生院對面的里，他說『這怎麼能支持呢』。...我曾經拜訪吳秉叡的辦公室，那是經過陳專森安排，他是吳秉叡的樁腳，吳秉叡出席某個管理委員會，大廈什麼開會時哪種場合也堵過吳秉叡。... 吳秉叡就覺得那是不可能幹的事，因為那牽扯到他的老闆蘇貞昌，所以那是不可能。」「黃林玲玲是我們有院民去公所，正式拜訪，黃林玲玲就說他很關心這些老人家，對這事情就是完全沒有正面的事」

<sup>101</sup> 「我認為是2005年2.3月，隔年選立委，那時候我們還有發，把聯署書丟給每個立委，那時候蔡家福不曉得怎樣誤簽了，後來當然是打死不認。李鴻鈞、蔡家福、林淑芬都有簽，那時候應該快選舉了，我們真的去遊(舉辦新莊百人小遊行，地點在運動公園)，就逼她們簽名，蔡家福百

行動，蔡宗芳回憶過往運動與里長、里民之間的關係：

這中間一定是充滿矛盾的，我做過些事情，比如說跟陳專森走我們去哪個尾牙。他們尾牙，我去講說有方案，然後陳專森就跟你說歐，「現在有不用延遲很久的方案，這樣子阿，大家鼓掌一下這樣子之類的」，這陳專森阿，很挺阿，那種場合他能夠講成這樣。我記得有一次要出去(2004年10月行政院行動)啦，.....很妙的事情就是在那個小巴士上阿，回來的車上就會有人，而且是挺陳專森的，陳專森說去他們當然就去，那時候行政院回來是我跟行政院的車回來，有些人就閒聊起來，說我在幹嘛啦，也有人語重心長，請我好好思考到底這個保存路，走不走得下去阿，會不會延工，或是怎麼樣，就很妙，他明明就是動員去支持的，但他心中，也許是充滿了疑惑或者是不認同，然後在車上才跟我談，是非常好的人，他就跟陳專森去，就有這種事阿。(蔡宗芳，20090215)

由於運動發起時，遭逢政策大致抵定且已交由台北市政府捷運局辦理的困境，因此最早的社區工作想像是希望爭取政治人物支持，透過聯署取得聯繫方式，舉辦活動時邀請政治人物帶人參加，然而新莊在地政治人物對於樂生保留多處於觀望狀態(見註22、23)，因此2005年後運動主要直接訴諸當時具決策能力的中央政府(總統、行政院)、地方政府(台北縣政府、桃園縣政府)，並且以「國家重大文化資產」、「台灣重要人權指標」作為號召，在人力、時間有限的情形下，新莊工作也暫時擱置。

分之一百誤簽了，因為他不可能支持這個，他是地下縣長，他後來是周錫璋地下的縣長，他是前新莊市長，他不可能支持這個事，絕對不可能。李鴻鈞也有簽，李鴻鈞也來過樂生院，只會來一來，他的哥哥李鴻源是副縣長，他就說他是工程的啦，怎樣怎樣，講很多好話，林淑芬也有來，也帶了自己選區的里民來參觀。」

## 二、樂生社區學校 (2007-)

2006年暑假運動開始開展社區工作<sup>102</sup>，分別進行了新莊老街與迴龍田野調查，同年9月在迴龍的龍福公園舉行厝邊市集活動，藉由社區活動舉辦將保留樂生議題帶入社區。樂生夥伴胡清雅回想起當時發想活動的過程：「我們預設樂生與新莊由於隔離的關係，院民與居民彼此未有互動，因此一方面也希望舉辦這個活動能讓彼此有些互動(20090328)。」但在樂生保留自救會開會討論時<sup>103</sup>，院民普遍對於「在社區」辦活動不感興趣，自救會李會長表示「可以試試看，但不一定有用啦！」他聊到早期在迴龍社區購買物品還要將錢消毒的事。一天晚上，我與清雅在宣傳活動的過程，遇到迴龍社區發展協會會長，他收到單張後很生氣地要我們別在社區辦樂生的活動，他表示：「跟你說啦，你問我們這邊的人樂生有保留的價值嗎，百分之百的人會跟你說沒有，還古蹟勒。……樂生在這裡，讓我們這個地方汙名化很久了，我們這邊的房價都漲不起來。」接著他不斷的問我們是不是抗議的學生，當時為了順利辦活動，我們極力的撇清，而這種對樂生、學生、古蹟發展論述強烈而深刻的排斥(exclusion)令我感到震驚。最後，依舊市集照常舉行，但我們僅輕描淡寫帶過樂生議題，當時我非常擔心有人砸場，也非常害怕有人發現我和院民熟識、我就是抗爭學生的一分子，換句話說，抗爭學生不該出現在此(out of place)。當時，我在田野筆記上寫了幾行字：(1)幾位院民與居民的互動看來熟識，似乎是多年的朋友；(2)傍晚時，卯阿伯(樂生院民)不斷表示「這沒有用啦！沒有用啦！」，並且催促我們快收攤；(3)市集雖然簡陋，卻吸引許多小朋友參與，讓我引發「迴龍地區是否缺乏非學校體系的教育資源」的聯想；(4)保留運動要在社區辦活動是困難的。

<sup>102</sup> 暑假樂生社會行動營隊結束後，一群對社區工作有興趣的夥伴組成新莊組。

<sup>103</sup> 20060910 田野筆記

2007年母親節，我們舉辦了送卡片給樂生院民的活動，當時胡小帥帶了幾位三多國小的學生一同參與，因為康乃馨晚送來，一群孩子無聊就大的帶小的跑到樹叢裡拔芥草玩pk，一個孩子拔下來的葉子背後有蝴蝶的卵，我們要他放回去讓這些小生命能夠活下去，他後來也擔任監督者的角色，要其他小朋友不可以踩到，幾個小朋友跑來跑去，為樂生增添了些活力與生氣。當時新莊331大遊行剛結束，問老師帶學生來樂生家長是否會反對？胡小帥表示，迴龍地區家長大多在附近工廠工作，平時工作很累，所以假日都在家裡休息看電視，不太可能花時間陪小朋友出外走走，因此許多家長聽到老師要帶學生去樂生走走，多是贊同。(20070513)。

2007年暑假，我和一群夥伴開始舉辦樂生社區學校，由於樂生議題無法帶入社區，那麼就結合社區對於教育的需求，藉由課程設計讓家長與小朋友走入樂生。一方面透過課程設計，讓居民再一次重新認識樂生療養院，樂生療養院不再是治理術告訴他們的破舊房舍，而是具有歷史價值的日式三合院同時也是小朋友的課堂教室，另一方面，將「無用的大學生」之社會位置在此情境下轉變成為「社區老師」，「賴著不走的患者」轉成「樂生院的阿公阿嬤」。樂生不再只是抽象的古蹟，而是社區居民上課、勞動、休閒的地方，樂生成為居民的日常生活。一些人被勾起了過去在樂生的回憶與情感：智勝媽媽告訴我：「以前樂生還沒拆的時候好漂亮，現在拆了好大一片好可惜歐。」一旁的智勝接著說：「對呀，以前我們家去麥當勞都從樂生理頭的小路走過去，現在都要繞路。」第二屆社區學校在中山堂舉行小朋友才藝成果發表，一位爸爸站在中山堂門口看著樂生老照片流下了眼淚，他說小時候他都跑到中山堂看電影，「你們做得很好」。也有人是因為社區學校而初次進入樂生，產生新記憶與情感，也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產生身

體情感(affect)：第二屆兒童營結束後，一位小朋友跑來樂生玩，他問我「佛堂以後會不會被拆掉」，我說不會，他說「好險」原來他前幾天寫完暑假作業自己跑來樂生，在紙條上寫下願望，裝進空罐子裡，埋在佛堂前的大樹下，他說等到他20歲的時候，要回樂生把罐子拿出來看他的願望。碧琪每個晴朗的禮拜三下午都會帶著三個女兒到樂生打掃圖書室，擅長植物辨識的她，會告訴我今天她在樂生的哪裡又發現了什麼植物，或是又與哪位院民聊天。如果說，企業城市治理的目的是要斬斷樂生與新莊的情感依戀(attachment)、關係與認同，那麼社區學校的作用是促使居民與樂生再次產生膠結。

在聽聞12月樂生工程開始進行拆除六棟房舍並架上圍籬，2008年12月1號，社區學校家長們七嘴八舌的討論著我們該怎麼辦，最後大夥決定展開社區連署與陳情信活動。未料12月3號當天旋即施工，聽聞樂生被拆的訊息，在電話那端的家長心急如焚地問著我們：為什麼政府要這麼快拆這個地方？新聞都在亂報，明明就不是因為抗爭導致捷運延宕。吳媽媽的陳情信上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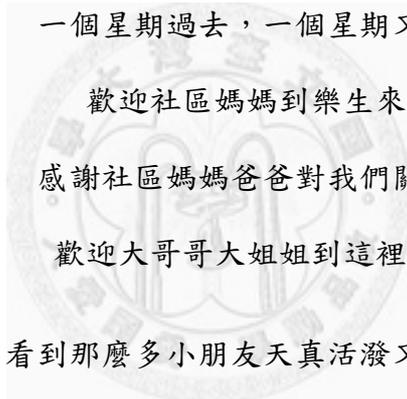
迎面望著上完電影課及繪畫課的孩子，滿臉的笑容，興奮地嘖嘖咕咕講不完上課時的新鮮事，經過開滿芝花的山坡，恰好遇見樂生的阿公阿嬤，孩子大聲的和阿公阿嬤問好，那問候聲迴盪在山谷間，看著阿公阿嬤及孩子們臉上開心的笑容，真的請求你(妳)：不要剝奪了這一切。

吳媽媽的信上寫了她對樂生的記憶圖像，一個開滿芝花、充滿孩子微笑的山谷，一位社區學校的孩子也在陳情信上寫著：

為什麼一定要拆樂生？明明可以不要拆，我們在哪裡很快樂，因為那

些在樂生的大哥哥大姐姐帶領我們認識樂生，我們才知道樂生裡的爺爺奶奶都很親切，我才知道以前人們的觀念是錯的，樂生其實像一個溫暖得大家庭，可是一聽見要拆掉樂生就等於把大家庭全都拆散了，這是很可悲的事，不能拆散我們的家庭。樂生的孩子XX敬上

他將樂生比喻成大家庭，以血緣比喻學生、院民與小朋友與樂生院之間深厚的情感依戀，並自我認同為「樂生的孩子」，也看到情感的力量能再次跨越企業城市治理的力量，在社區居民與樂生之間再次建立情感依戀。而原先排斥社區居民的院民，也在互動中產生情感依戀，富子阿姨寫了《社區學校》之歌：



一個星期過去，一個星期又來  
歡迎社區媽媽到樂生來  
感謝社區媽媽爸爸對我們關懷  
歡迎大哥哥大姐姐到這裡來  
看到那麼多小朋友天真活潑又可愛  
在這裡有許多學生老師愛心教你們畫圖、跳舞的  
還有教你們學唱歌，多麼好多麼棒  
還有教你們彈吉他、吹陶笛  
還有教你們英語、日語和韓語  
你們要好好把握，努力認真學習  
將來成功不要忘記，老師你辛苦了，謝謝你  
老師教我們朋友在一起互相勉勵  
更教我要孝順爸爸媽咪

爸爸媽咪一輩子辛苦，都是為了你  
將來我們長大成功出人頭地  
希望爺爺奶奶身體健康又如意  
我們一家三代住在一起，快樂融融無比  
爺爺奶奶我喜歡你，爸爸媽媽我愛你

第五章指出新莊民意代表為新莊在地為企業城市治理術的引動者，因此早期針對社區民意代表所做的新莊組織工作，引發許多困境。然而社區學校則是樂生院民與迴龍居民之間的平台，起先由社區學校學生、幾位院民擔任老師的工作，爾後透過圖書館志工培訓、樂生導覽培訓與小牛隊<sup>104</sup>的組成，使得社區居民、樂生院民與學生形塑跨越界線、如家庭般的主體，我認為是一種以樂生院(地方)為情感依戀之社群主體。



#### 第四節 小結

國家治理權力將有病(癩病)/健康(無癩病)的社會空間二分思想，植入人民日常生活，但劃界並非國家機構的專利，一如傅柯對於權力的闡釋，猶如毛細網絡而非僅由上而下，當治理術猶如注射般植入日常生活血液中，日常生活的人們則將思想複製於經濟與社會互動中，並且生產出各種有形的人工物(artefact)與無形的想像與傳說，複製著二分的分界。小張親族們通風報信的過程，讓我們再次看到親族是傳播癩瘋恐懼觀重要的管道，國家在治理網絡中退位後，承襲的驅動力來自於親族的長幼權力關係，指導的原則則來自一種男生、女生該適得其所(“A

<sup>104</sup> 小牛隊主要由社區學校小朋友組成，也有社區家長參與，每週六上午在院區進行院內清掃與院民撻背服務。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its place”)的想像。

從樂生院民與迴龍居民訪談中，一方面可見國家癩病治理術如何在日常生活尺度中刻劃出「有病/健康」，造成身體與心理上的界線(boundary)，企圖使院民與外界在空間與社會關係上完全隔離；另一方面，在樂生院民、迴龍居民的跨界日常生活實踐中，治理術在某些情境下的失靈，為了生產與再生產層面的運作，像是為了作生意而與院民建立情誼，貧困者為了帶小孩而托育給樂生院民，院民與居民重新啟動社會關係的連結，在關乎生產(經濟)、再生產(休閒、帶小孩)需求下，疾病治理術失靈(malfunction)，也使得癩病治理術所產生的分界逐漸成為次要，促使各種空間、社會、心理層面的跨界產生。

在新自由主義運作中，以躍升城市位階與促進地方發展為治理目標，無用的恐懼與發展的慾望作為技術，復合各種有利於資本主義使用(use)的價值，生產出欲求發展的主體。而運動則是利用在地教育需求讓居民再次產生跨界，重新建立社區居民與樂生院的情感連結，衍生出以樂生院(地方)為情感依戀之社群主體(communal subjectivity)。

## 第七章 結論

### 第一節 理論化與重思命題

回顧本文，我在第四章中以日殖、國民政府時期國家漢生病歷史資料指出，以癩患作為問題目標(target people)之國家治理，對於維繫日本殖民政府主權(sov​er​eignty)的重要，當時癩病治理術，一方面將權力具像化(embod​y)為可見(visible)中性化工具(例如統計數字與地圖)，另一方面將權力有形的刻劃於實體空間(有菌/無菌)，同時以無形的語彙與儀式刻蝕於患者的身體。延續於光復時期，這些治理術僅由皇民化語彙轉變為國族富強語彙。我在第五章從城市治理角度指出，台北縣作為城市體系屬於次級的城市，如何在城市競爭的治理理性思維之中，不斷推陳出新的大型旗艦計畫，以發展論述(discourse of development)行銷城市形象(images)，台北縣政府不僅扮演企業實體，同時在地產行銷中扮演銷售員(salespeople)的角色，自個兒印製宣傳單推銷著手中的建案(城市)；並且通過反省性自我組織(reflexive self-organisation)教導市民成為新自由主義的主體；而由新莊地方民代發起的政治動員，往往以「新莊團結」作為訴求的，企圖以地域認同凝聚個人，並且認同地域等同於認同地域「發展」(或作「地方發展」)，來創造在地人的「社輿論(共識)」，生產出新莊與樂生的二元對立語境，成為治理術的一部分並進行排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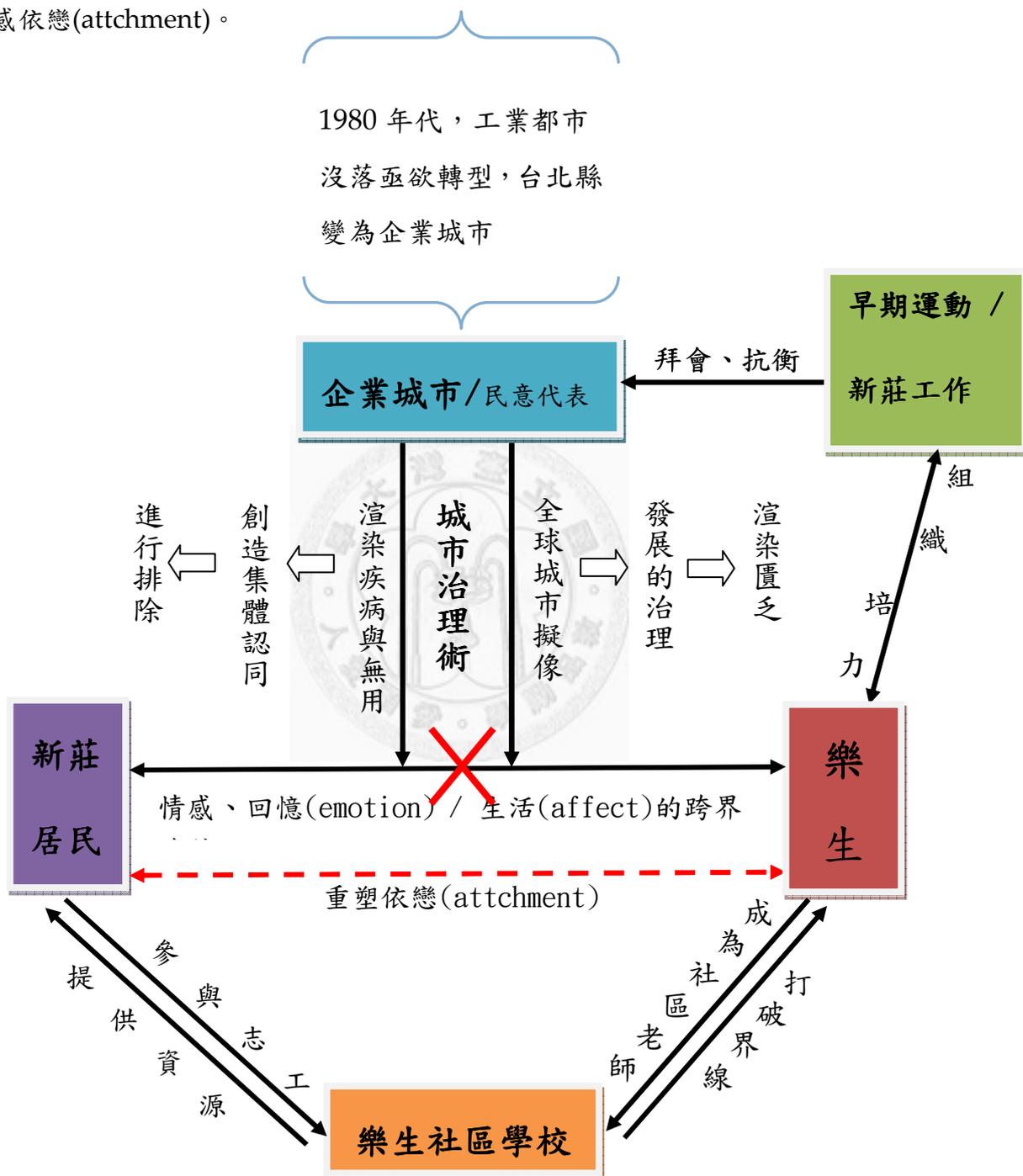
第六章，我則是從田野訪談中指出，國家治理權力將有病(癩病)/健康(無癩病)的社會空間二分與疾病預防觀，植入人民日常生活，而當國家機構在治理術中退位，家庭取代了國家成為治理術中的傳播，在日常生活中的人們則將思想複製於經濟與社會互動中，並且生產出各種有形的人工物(artefact)與無形的想像與

傳說。但在訪談中也發現，治理術在某些情境下的失靈，為了生產與再生產層面的運作，像是為了作生意而與院民建立情誼，貧困者為了帶小孩而托育給樂生院民，院民與居民重新啟動社會關係的連結，在關乎生產(經濟)、再生產(休閒、帶小孩)需求下，促使各種空間、社會、心理層面的跨界產生。而在新自由主義運作中，躍升城市位階與促進地方發展為治理目標，斬斷居民與樂生的情感依戀成為治理術的策略，以無用的恐懼與發展的慾望作為技術，復合各種有利於資本主義使用(use)的價值，生產出欲求發展的主體。而運動則是利用在地教育需求讓居民再次產生跨界，重新建立社區居民與樂生院的情感連結，衍生出以樂生院(地方)為情感依戀之社群主體 (communal subjectivity)。

當我們重新回應治理術理論 (見圖 7)，本文指出，1980 年代起新莊市企圖由工業城市轉型，歷任縣長提出不同計劃市政計畫，地方民代極力當時治理聯盟中重要的推手，主要透過兩條軸線治理技術進行治理術運作，讓發展成為市民共識同時合理化治理的正當性：(1)渲染疾病與無用：將國家漢生病治理時期遺留的癡瘋恐懼(疾病)、新自由主義對於「仰賴國家資源、不事生產」邏輯(無用)收編進入治理術，在新莊民代渲染下，以「有用」、「健康」的分類召喚新莊人的集體認同，同時對於「有病」、「無用」得他者進行排除；(2)發展的治理(government of development)：以夢遊仙境般的全球城市擬象進行行為導引(conduct of conduct)，一方面教導居民發展該具備哪些客體(object)，另一方面透過渲染匱乏(lack) (土城通了新莊卻沒有捷運、新莊人很可憐)，讓居民成為發展的主體，緊抓住閃亮的旗艦計劃。

本文也指出日常生活實踐情境可能使治理術產生失靈(malfunction)，無論是日殖時期還是光復時期將疾病渲染得多可怕，院民與居民仍因為其他生活需求

產生空間上的跨界，進而產生情感與社會關係的連帶，同時產生認知的情感(emotion)與日常生活實踐產生的情感(affect)，居民與樂生(人與地方)間產生了情感依戀(attachment)。



在此我想講述一段田野中的新莊與樂生運動，我密集地針對迴龍居民與院民對於漢生病的觀點，進行幾個禮拜密集的訪談工作，而未參與運動。一

天晚上我待在阿賓伯房間與他和金英姨聊天，談論著他們剛來樂生看到其他院民的模樣真的好怕，聊著聊著，阿賓伯拿了橘子請我吃，一如往常我不猶豫的吃了，金英姨問我「小姐，為什麼你們(指學生)都不會怕我們」，我想了一下，回答「阿，因為知道這種病不會傳染阿」，金英姨：「很多人都不敢吃我們給的食物」，我開始思考究竟為什麼。那陣子聽了許多關於樂生院的鬼故事、恐怖的傳說，附近居民被傳染的故事，林先生至今不敢吃樂生院的東西的故事，我開始覺得過去自己似乎從未留意「被傳染」這事。結束訪談後，我繼續參與運動，回樂生那天，我發現自己不敢上廁所，我猜想多少院民使用過廁所留下體液，漢生病會藉由體液傳染嗎？但回樂生「走動」幾次後，我又不再有先前的恐懼，樂生院民又成為我熟識的阿公阿嬤，樂生又再次成為我的小天堂。講述這段經驗無非想強調日常生活實踐的情感依戀確實能成為扭轉治理術滲透的力量，以阿英姨對於社區居民對樂生態度的詮釋：「在地人有的很怕，有的沒怕啦，有在「走動」的都不怕啦！(20090327)」

因此在新莊企業城市治理下，拆除樂生、捷運通行、新莊旗艦計畫得以落實，治理術以斬斷居民與樂生的情感依戀作為治理目標。早期樂生運動社區組織以地方民代拜會、樂生院民培力作為社區工作主軸，但地方民代為企業城市治理的發動者，因而無法與企業主義城市治理抗衡。社區學校則是樂生院民與迴龍居民之間的平台，結合居民教育需求，以樂生院作為地方使社區居民、樂生院民與學生跨越界線(cross-boundary)互動，再次建立居民與樂生之間的情感依戀，形塑新的社群主體 (communal subjectivity)。

因此「樂生/新莊對立語境」命題，基本上是偽命題，是治理術的一部分，用以召喚「反保留」的主體。若後續社會運動若遭逢相似處境，能從治理術層面

思考運動遭受在地居民反對的原因，並且藉由理解居民與地方間的情感關係，重塑情感依戀，作為社區工作的目標<sup>105</sup>。

## 第二節 研究反省與限制

在研究方法上，我以台大地理所研究生的身分、告知對方自己的研究與迴龍歷史有關，企圖以這些方式偽裝「新莊派」的身分，這樣的方法讓我避開無法進行訪談的困擾，田野訪調過程中有三位受訪者皆為劈頭尋問「你是不是抗議的學生，如果是，我就不接受採訪」。但這樣的研究方法本身卻也複製二元分類的預設，在訪談迴龍村村長江清萬的過程，我原先預設他對於樂生會相當有敵意，但當我們聊到他對於樂生的看法，他馬上要太太打電話給「舅阿」，希望他來村長辦公室和我聊聊樂生歷史，當時我才知道原來村長口中的「舅阿」是阿添伯，他從小就認識阿添伯。當下打給阿添伯的電話不通，村長馬上打到鄭伯伯家病熱絡的說「鄭XX，我貓仔萬啦，X添的電話是幾號？」最後村長打給了很照顧他的阿梅姨，很熱情的為我介紹阿梅姨，並要她到村長辦公室走一。這整段過程都令我冷汗直流，這幾位院民我事實上是熟識的，但我在訪談開始時和他說我未到過樂生。最後我趕緊打電話給阿梅姨希望與我一同演這場戲。

在研究限制上，由於老一輩的跨界者，多已過世，因此只能從第二代或樂生院民口中了解當時的情形，無法得知在 30-50 年代「聞瘋色變」究竟是如何跨界。由於訪查時間心力限制，雖本題目為「樂生/新莊對立語境」，但事實上受訪者為迴龍地區居民，雖迴龍有部分屬於新莊市，但新莊與迴龍的異同、上新莊(老街到副都心)與下新莊(福營到迴龍)的異同，則需再進一步訪調。在社區學校方面，我認為後續可繼續發問：「哪些家長參與社區學校活動(跨界)、哪些人在接

---

<sup>105</sup> 當然我指的是必須在運動情境允許下進行。

到傳單時即選擇不進入社區學校」、「家長是否意識治理術的存在，若有，又是如何進行抵抗、抵抗機制為何」。



## 引用文獻

### 中文部分

- 丁文惠 (2008) 臺灣日治時期瘧疾防治之推行，人文研究學報，42 (2): 75-90。
- 王文基與王珮瑩 (2009) 隔離與調查—樂生院與日治台灣的癩病醫學研究，新史學，20(1): 61-123.
- 李尙仁 (2003) 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3)： 445-506。
- 姚人多 (2001) 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2: 119-182。
- 范燕秋 (1995) 日治前期臺灣公共衛生之形成 (1895-1920)：一種制度面的觀察，思與言，33 (2): 211-258。
- 范燕秋 (1996) 醫學與殖民擴張—以日治時期臺灣瘧疾研究為例，新史學，7(3): 133-173。
- 范燕秋 (1998) 新醫學在臺灣的實踐(1898-1906)—從後藤新平《國家衛生原理》談起，新史學，9(3): 49-86。
- 范燕秋 (2000) 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台灣的人種衛生，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
- 范燕秋 (2005) 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臺灣醫學史，臺北：稻鄉出版社。
- 陳威彬 (2001) 近代臺灣的癩病與療養—以樂生療養院為主軸，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君愷 (1993) 光復之疫——臺灣光復初期衛生與文化問題的 視性觀察，思與言，31(1): 111-138。
- 郭俊沛，賴志彰 (2005) 行政院衛生署樂生療養院調查研究，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 楊玉齡 (2002) 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
- 臺北縣新莊市公所 (1998) 新莊市志，台北：台北縣新莊市公所。
- 臺灣省立樂生療養院 (1955) 臺灣省立樂生療養院二十五週年特刊，新莊：臺灣省立樂生療養院。
- 臺灣省立樂生療養院 (1940) 樂生院年報，新莊：臺灣省立樂生療養院。
- 劉集成 (2004) 台北縣機關志樂生療養院志，台北縣文化局。
- 劉士永 (1997) 一九三〇年代以前臺灣醫學的特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劉士永 (2001) 「清潔」到「衛生」—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臺灣史研究，8(1): 41-88。
- 鄭清文 (1993) 新莊——失去龍穴的城鎮，教育部兒童讀物出版資金管理委員會叢書名稱：中華兒童叢書。
- 賴尙和 (1952) 中國癩病史：中國癩病學之演進，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癩研究室。
- Sontag, S. (2005) *Illness as metaphor* (1977), 疾病的隱喻，刁筱華譯，台北：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Tuan, Y. F. (1979) *Landscapes of fear*, 恐懼，潘桂成、鄧伯寰、梁永安譯。

## 日文部分

- 上川豐 (1932) 樂生院的使命，台北；台灣時報。
- 台灣基督教青年會 (不詳) 我等と癩問題。
- 台灣癩豫防協會 (1936) 癩の傳説と實話。
- 社會事業の友 (1931) 癩問題特集，社會事業の友。

社會事業の友 (1937) 臺灣の癩救濟根絶計劃案，社會事業の友，27: 112-121。

近衛師團軍醫部 (1896) 征臺衛生彙報。

青木大勇 (1990) 癩院設置の必要を論ず，台灣醫事雜誌，3(6、7)。

宮原敦 (1919) 臺灣ノ癩人，臺灣醫學會雜誌，20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1986)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制，1：1-43。

## 英文部分

Anderson, K. and Smith, S. (2001) Editorial: emotional geographi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6: 7-10.

Anderson, B. and Harrison, P. (2006) Questioning affect and emotion (response to Deb Thien), *Area*, 38(3):333-335.

Anderson, W. (1998) Leprosy and citizenship, *Position*, 6(3): 707-730.

Barclay, G. (1954)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in Taiwa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rnhart, K. R. (1995) *The Barnhart concise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Bondi, L., Davidson, J. and Smith, M. (2005) *Emotional Geographies*, Aldershot: Ashgate.

Bondi, L. (2005) Making connections and thinking through emotions: between geography and psychotherapy' 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0, pp. 433-448.

Cloke, P. , Crang, P. and Goodwin, M.ed. (2005) *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 Hodder, London.

- Connolly, W. (1999) *Why I Am Not a Seculari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avidson, J. and Bondi, L. (2004) Spatialising affect; affecting space: an introduction,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1(3): 373-374.
- Davidson, J. and Milligan, C. (2004) Embodying Emotion Sensing Space: Introducing emotional geographies,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5(4):523-531.
- De vries, P. (2007) Don't compromise your desire for development! A Lacanian/Deleuzian rethinking of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Third World Quarterly*, 28(1): 25-43.
- Dean, M. (1999) *Governmentality: Power and Rule in Modern Society*. London: Sage.
- Escobar, A. (1995)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erguson, J. (1990)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bson-Graham, J.K. (2006) *A Capitalist Politic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ussow, Z. and George S. T. (1970) Stigma and the Leprosy Phenomen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Diseas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44: 425-449.
- Gussow, Z. (1989) *Leprosy, Racism, and Public Helth* , Westview Press, Boulder, San Francisco, & London.
- Hall, T. and Hubbard, P. (1996) The entrepreneurial city: new urban politics, new urban geograph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 (2): 153-174.

- Harvey, D. (1988) Voodoo Cities - Our Cities Are Going in for Glitzy Facelifts, *New Statesman & Society*, 17(1): 33-35.
- Kay, J. A. (2005) The Idea of Chinatown: The Power of Place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 in the Making of a Racial Category, *The Urban Geography Reader*, Eds. Nicholas R. F. and Judith T. K.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219-28.
- Klein, M. (1960) *Our Adult World and its Roots in infancy*, Tavistock Pamphlet, London.
- Kristeva , J. (1982) *Power of Horr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awson, V. (2007) *Making Development Geography*, New York: Hodder Arnold.
- Leitner, H. and Garner, M. (1993) The limits of local initiatives: a reassessment of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for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Geography*, 14(1):57-77.
- Liu, S. Y. (2000) Medical Reform in Colonial Taiwa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h.D. Dissertation.
- MacKian, S.( 2004) Mapping reflexive communities: visualizing the geographies of emotio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5(4):615-631.
- Martha C. N. (1998)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tless, D. (1997) The geographical self,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and geoaesthetics: work i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1996 ,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1(3):393-405.
- McCormack, D. (2006) 'For the love of pipes and cables: a response to Deborah Thien' in *Area*, 38(3), pp. 330-332.

- Miller, P. and Rose, N. (2008) *Governing the present: Administering economic, social and personal life*, UK: Polity Press.
- Nash, C. (2000) Proformativity in practice:some recent work in Cultural Geography,*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4(4):653-54.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Dictionary of English*.
- Parr, H. (2005) CH34 Emotional geography, Cloke, P. , Crang, P and Goodwin, L. ed. *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y*, Arnold:2005.
- Perin, C. (1988) *Belonging in Americ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Rod, E. (2006) *Leprosy and Empire: A Med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e, G. (1995) Geography and Gender,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305-320.
- Thien, D. (2005) After or beyond feeling? A consideration of affect and emotion in geography, *Area*, 37(4):450-456.
- Thrift, N. (2004) *Emotion and Society theory:corporeal reflections on (ir)rational*, Sage , London.
- Segrott J. and Doel, M. A. (2004) Disturbing Geography: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s spatial practice,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5(4):597-614.
- Sennett, R. (2007)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ibley, D. (1995)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New York: Routledge.
- Smith , M. (1980)*The City and Social Theory*, Basil Blackwell,Oxford 57-58.
- Solommon,R. C. (1993) *The Philosophy of Emotion*,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
- Young, I.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iddowfield, R. (2000) The place of emotions in academic research , *Area*, 32(2):199-208.

Wood, D. and Fels, J. (1992) The power of maps, New York : Guilford Press.

Wood, N. and Smith, J. S. (2004) Instrumental routes to emotional geographies,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5(4):533-547.

#### 附件一 臺灣省癩瘋病預防規則

(臺灣省政府公布令38.2.12 參 文府綜法字第9234 號)

第一條 臺灣省政府(以下見稱本府)為防止癩瘋病之傳染起見,特訂定本規則。

第二條 本省各縣市發現癩瘋病患者,或癩瘋病嫌疑者,應由其家屬或同居者報告當地衛生主管機關,經指定醫師檢驗確屬癩瘋病時,應強制收容於指定之隔離醫療院所,予以治療管理,以杜蔓延,其辦法另定之。

第三條 癩瘋病患者或其家屬不服前條指定醫師之診斷時,得申請本省衛生處另派醫師重新檢驗,但以一次為限,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第四條 醫師診治病人如認為癩瘋病時,應於二日內報告當地衛生主管機關,鄰里長或警察,如發現癩瘋病患者,癩瘋病嫌疑者亦同。

第五條 醫師檢驗死屍體如認為患癩瘋病死亡或鄰里長及警察發現因癩瘋病死亡者,須於 四小時內報告當地衛生主管機關為防止傳染之必要處理。

第六條 癩瘋病患者居住場所或癩瘋病污染場所,其家屬或同居者應服從該管衛生主管機關所為消毒及預防方法之指示。

第七條 各地衛生主管機關為防止癩瘋病之傳染,對癩瘋病患者或癩瘋病嫌疑

者，得禁止其從事職業，對痲瘋病污染或污染嫌疑物件應予消毒限制，或禁止其買賣讓與，必要時並得予以焚燬。

第八條 痲瘋病患者除由省衛生處指定之醫療院所予以收容治療外，其他任何醫療機構不得私自收容。

第九條 各縣市政府防止痲瘋病之傳染所需隔離收容醫療管理等費用，除另有規定外，由各縣市委籌撥付，必要時得呈請本府 予補助。

第十條 痲瘋病患經強制收容後，如其家屬確無生活能力經查屬實者，得由該管縣市政府 予救濟。

第十一條 痲瘋病患者經強制收容後，其醫療管理及生活等費由本府統籌撥付。

第十二條 違反本規則第二條及第四條至第八條之規定者，依行政執行法處罰之。

第十三條 本規則施行細則另定之。

第十四條 本規則自公布之日施行。

## 附件二 臺灣省癩病（痲瘋）防治規則

（臺灣省政府令 51.3.17 府衛字第 2276 號）

第一條 臺灣省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求癩病之合理防治，以期達到根絕起見，特定定本規則。

第二條 為防治本省癩病患者，應由本府衛生處癩病防治委員會設置癩病防治中心，舉行癩病 迴檢診及訓練癩病防治人員，推行防癩衛生教育與宣導。

第三條 本府為使癩病患者能隨地治療，除設置專門療養院外，並指定公立醫院及當地衛生主管機關，設立特別皮膚門診部，免費醫治。所需藥品器材，由本府衛生處統籌撥發。

第四條 凡開放性癩病患者，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應會商指定療養院住院治療。治

療後，如認為由地方皮膚特別門診部治療者，應即令其出院，轉入其所在地特別皮膚病門診部治療之。前項指定療養院，如無床位時，開放性癩病患者，得暫在家隔離，並接受所在地特別皮膚門診部治療。但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應需要，定期派員前往患家，指導隔離及消毒技術。

第五條 經臺灣省立樂生療養院證明確非開放性之癩病患者，其就學、就業應與一般人受同等待遇，如有變形、形或口殘留者，不得從事飲食業或其他與大眾衛生有直接影響之行業。

第六條 凡在指定療養院住院治療之癩病患者，其生活管理醫療費用，統由本府支給之。

本規則自公布之日施行。

